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38 ·

文化·教育·體育類

中國文化演進史觀

先秦文化史

唐代文化史研究

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

陳安仁著

孟世傑著

羅香林著

蔣星煜著

上海書店

陳安仁著

中國文化演進史觀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再版

中國文化演進史觀一冊

每部戰時售價國幣十八元

有 所 播 版

究 必 印 翻

著 者 陳 安 仁

發 行 人 郭 問 渠

印 刷 所 文 通 書 局

發 行 所 文 通 書 局

貴陽中華五十二號

貴陽西郊四家山七號

本行係在貴陽印刷一切材料均由山省外運來附帶郵費甚鉅而貴陽生活又復高漲成本因以特加現仍價目包括郵費在內本埠售價概不加成外埠函購照郵費酌加實價收

再版序

七年前予撰中國文化演進史觀一書。在廣州出版，抗戰前銷場已盛，但予亦所存遺紙一二冊，年來輾轉播遷，謀再版，未有機緣，茲聞鄧欽授世榮先生之介紹，由文通書局重版，此誠僥倖抗戰後方，舉世再見，付梓之始，謹誌數言。予維民族之獨立戰爭，武力與文化力，二者並重；有武力而未有文化力以相佐，則武力之發皇，有其限度焉。文化力，所以充實武力之內容，武力，所以表現文化力之效用。中國民族於過去數千年，已創造許多文化之成果，今後當更發揮而光大之，與世界先進國家之文化，並駕齊驅。而欲與世界先進國家之文化，並駕齊驅，則教育之普及，學術之提高，科學之深造，爲今日文化運動急不容緩之課題也。本書從總合之研究，以論中國文化演進之形態，與予近年來所著之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中國近世文化史分析比較之研討，方法有不同，一得之見，明達之士，其進而教之。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八日廖世承序。

中國文化演進史綱 再版序

自序

『有世界之進化，有國家之進化，有物質之進化，有物類之進化，有人類之進化，宇宙不論幾百幾億兆年，而進化之現象日益演，進化之動機無時息，進化之勢力，挾排山倒海之力量以奔赴，堂堂皇皇，誠浩浩蕩蕩，無能決其究矣。』此十六年前，予於人人類進化觀一書緒論開宗明義之旨也。自十八世紀康德（Kant）與拉卜拉斯（Laplace）論星雲假定之理，法國拉馬克（Lamarck）論生物進化之說，英國華列斯（A.R. Wallace）論物類變遷之勢，達爾文（Darwin）論機體進化之義以來，進化論旨，炯睠於世，不特為科學界一種思想，而其範圍，則能周括宇宙萬種之事理。夫文化者，人類生活表現之總體也，又為人類在物質與精神中互相推演之動時現象也，不能逃出于進化範圍之外。古今來世界並立之國家多矣，卒之傾圮破裂，遺蹟微存，為後世所憑弔者何耶？古今來芸芸總總之儔，布衍種胤以長以育者多矣，卒之為天演淘汰而泯滅無聞者何耶？一言以概之曰，文化之停頓湮滅，有以召之也。近世國家學者，言國家之要素曰土地人民主權，必予斯三者安全獨立，而後足以當國家之名實也，詎知土地人民主權安全矣，而文化不能安全，土地人民主權獨立矣，而文化不能獨立，亦遂足以當國家之名實乎？帝國主義者，急以侵畧弱小國家。弱小國家被侵畧之後，土地已失，主權並喪，人民亦為牛為馬，而帝國主義者，尤且

汲汲皇皇，以消滅弱小國家民族之文化，吁！可怖哉。文化之停頓滅亡，誠國家與民族衰落消滅之朕兆也。中國立於大地，自有史以來已五千餘年於茲矣；此五千餘年之歷史，中經朝代之變遷，帝王之遞易，內亂之偵興，奸雄之割據，異族之人主，災禍之疊至，尙能堅持而不致敗壞者，有五千餘年潛滋暗長之文化勢力以爲礎石，斯不致國命陷於飄搖欲絕之境也。然而此亦不可異恃也！歷史家嘗指示民族之新生時代矣，民族之新生時代，是常少壯而衰老之謂也；民族之少壯者，其於文化常呈蓬勃復興之景象；其精神與事功亦丕著而顯於光明燦爛之時代；寢假文化衰老矣，則不能推演進行；國家社會民族，必受會影響而毫無活氣，甚或死氣沉沉，生機斷盡，即古人所謂哀莫大於心死之謂。是故評斷一國民族之盛衰，常可以文化之盛衰而推測之；評斷一國文化之興廢，常可以民族之興毀驗之；今後文化尙可綿延繼續於兩間否耶？今後中國之文化尙可安全獨立，而不致爲外侵勢力所消滅否耶？是在於民族之奮鬥復興以繼往開來。中國幾千年之文化，有其史的價值，此具有史的價值之文化，當發展之；歐美數百年來之文化，亦有其史的價值，此具有史的價值之文化，當吸收之，然而此吸收之力量，又常依國民之經濟環境以爲衡也。倘國民經濟之組織，日陷於破裂；地位日陷於搖動；生產日陷於墜落；生活日陷於奇窘；雖欲吸收之亦不可得。是故評斷一國民族文化之盛衰，常可以經濟之盛衰而推測之；評斷一國家一民族經濟之興毀，可以文化之興毀而證驗之。中國現代文化與歐西文化較，落後不知幾千里。迎頭趕上，

以冀創造世界未來的新文化，是在今日。來者方張，其又安可限制耶？予近在中大史學系四年級演講中國現代文化，從演進的觀點，以論中國現代的文化之歸趨，根據經濟的民族社會的諸條件以資證驗，暇鐫所見，爲文已十餘萬言，區區論著，未足以備其全，亦可知也。付梓之始，聊弁數言，世之大雅，其有以匡之。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著者序

中國文化演進史觀 自序

中國文化演進史觀目次

緒論·····

一

第一章 中國經濟與中國文化·····

二

(一) 文化的意義和範圍·····

六

(二) 中國文化的特質·····

一〇

(三) 中國幾千年之經濟狀況與文化演進的關係·····

二六

(四) 現代物質經濟之進步與現代中國文化的影響·····

四六

(五) 現代中國經濟之地位與現代中國文化的影響·····

六一

第二章 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

六五

(一) 中國民族的起源及其移殖·····	六九
(二) 民族的化合與文化的影響·····	七三
(三) 民族的特性與文化的影響·····	八四
(四) 民族的創造能力與文化的影響·····	九一
(五) 民族的遺傳關係與文化的影響·····	九七
(六) 民族的道德能力與文化的影響·····	一〇五
(七) 民族的地理環境與文化的影響·····	一〇八
(八) 民族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的影響·····	一二一
(九) 中國民族的復興運動與現代文化的影響·····	一二七
(一〇) 中國民族今後的文化運動與世界未來的文化·····	一三三

第三章 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 一四三

(一) 從社會家族制度的方面論中國文化·····	一四九
(二) 從社會階級制度的方面論中國文化·····	一五四

(三) 從社會統治的方面論中國文化 一六四

(四) 從社會法律的方面論中國文化 一六九

結 論 一七二

跋 一七三

中國文化演進史觀

陳安仁著

緒論

宇宙之中太陽地球行星衛星，在宇宙的體系中，爲不絕的演動，形成森羅萬象的奇觀，在太陽系中，（Solar system）而有聯繫的地球，不知經過多少年代，在永現的時間當中，表演牠綿延不斷的轉變，可知宇宙諸天世界，從一元論的立場而說明之，只是一個動字，沒有動就沒有變，沒有變就沒有進，沒有進就沒有生，換句說：沒有動，這世界的作用息，人類的創造息。我們知道，從世界生物而觀察之，自最初的小生物，而遞進至人類，中間經過許多「動」的作用，而有他不斷變化的一定過程；各個生物的形態，在長時間的歷史中，經過無數的，微細的，煩瑣的變化，才能維持牠們的體系，保障牠們的生存，抵抗牠們的外敵，搜集牠們的食物，養育牠們的後裔，不然，牠們老早就被宇宙自然支配的定律所威脅了，或被其他的障物所壓迫，而促於滅亡的境地了。有些生物，在牠們不絕之動作中，對於外界自然的環境，所表現任何不同的情狀，而發見牠適應的徵候，如普通的蛙，在牠生活史上，因爲要適應自然界的環境，初期雖是魚類，後來竟以肺呼吸而成爲陸居動物；在生物界中，因要適應牠自然的環境，憑着牠變化的能力，而發生

許多變化的狀態者於衆。人類在生存的历史，因要適應自然的環境，憑着應付的能力，表現不斷的動作，而創造許多的文化；在這許多創造的文化中，形成生活史全般的狀態，以維持生活的體系，保障生存的地位，促進向上的發展。倘沒有創造的文化環境，以適應自然環境，則人類老早已滅跡於世界了。美國 Charles A. Ellwood 在其所著文化進化論第一章，有說：「如果我們要了解人類生活的性質，及其可能的發展，即了解他的起源，方向和命運等，那末，我們必須了解這個文化的特殊要素，和支配人生前途的文化之發展」，可知文化在人類生活史，所佔的勢力的重要。文化是與人類結成不解之緣的，原始人類雖是野蠻，但亦有他淺演的文化，倘沒有這淺演的文化，即野蠻人類，亦不能保障生存的地位，舊石器時代人，（Palaeolithic man）大概是在五萬年前，在那時代中，氣候是很寒冷的，但他們知道用火，用火就是他們生活的文化工具。至新石器時代人，（Neolithic man）更進步了，他們發明交互耕種制，知道做陶器，用銅及青銅來做工具與戈矛，凡茲種種，就是他們生活的文化工具，在人類生活史上生存的物質文化工具，是佔很重要的位置。（可參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William F. Fiedling Ogburn 所著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 P. 4）。從歷史的進程，以觀察人類的文化史，大概有三大範疇：（甲）是物質的，或地理的因子即是自然，與物質的環境。（乙）是生理的，和心理的因子，即是人類的欲望，思想與意見。（丙）是社會的和歷史的因子，即是經濟，政治，法律，風習，文藝，宗教

的社會意識內容。人類歷史與文化的演進和改變，不離此三個範疇。我們探討一國的時代的文化，也不離此三個範疇。此三個範疇，是互相爲因，互相爲果的，不能據一方面，概括一國的文化，與一時代的文化。中國立國亞東，自有文字歷史記載以來，已有幾千年的歲月，在幾千年的歲月中，以先民的努力，所創造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是具有價值的。在先秦的及漢唐的時期，牠的文化，具有博大的，創造的精神，爲後代所謳歌景仰，及於近代受了異族的侵入蹂躪，文化有日益頹頓和衰落的趨勢，尋究其中原因，非簡單的敘述可以概括，當用歷史法（Historical method）從歷史演進的現象中，以論究現代的文化，因爲論究現代的文化，不能不溯源於過去歷史上，所受的文化所影響也。向來文化史家，多注重橫的研究方法，將每朝代的文化，敘述而排列之，即少注意縱的研究方法，標舉一個觀點，而統敘文化先後聯繫的因果關係。多注重靜的研究方法，祇將過去的文化作爲美觀古董的陳列，而少注意動的研究方法，從歷史進化變遷的法則，說明社會演變，人類行動所爲的影響也。本著根據斯義，以論究中國的文化，以及中國的現代文化，分爲四章，民族的，社會的三編，其餘學術思想，與文化的影響，則有俟之於異日也。

第一章 中國經濟與中國文化

歷史的轉捩，表見各時代的文化特質，所以各時代有不同時代的文化，各國亦有各國家的文化

，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各社會有各社會的文化，從各個文化的特質，可以觀察人類文化狀況，野蠻人有野蠻人的粗淺文化，半開化人有半開化的文化，進步的人有進步的文化，予在人生問題文化演進與人生概念篇有說：

「人類自有歷史以來，文化即從之發軔，歷史表見人類經過的事實，從人類經過事實之中，可尋出文化之軌跡，」又說：

「歐美之文化，比較的進步，此吾人所公認之事實也。然歐美之文化，各有其特徵，多有其演進的路徑，歐美之文化各有缺點，各有其頹敗的現象，不得謂歐美之文化，能括人類文化之大全，與已達於文化完善之地點也。」（見四三四頁）

現代的文化，和現代的歐美文化，比之數千年以前，或數萬年以前的文化進步得多，這是人類所公認的事實。然現代的文化，和現代的歐美文化，不能算為完全，且藏有許多頹敗的象徵，這是許多學者所探究的問題。各國對於這問題注意的，如印度有戈泰爾，日本有鳥武郎，俄國有托爾斯泰，脫洛斯基，（Tolstoy）英國有威爾士（Wells）哲斯脫敦（Chesteron）比洛克（Belloc）萊格（Leon Lodge），法國有法伯盧斯（Fabreuce）德曼金（Demangeon），意大利有斐勒維（Ferrari）與克維斯（Croce）等，諸君對於現代世界的文化，或表見不滿的態度，或蘊鬱疑之心懷情，或發揮高遠之理想，指摘現代世界文化之缺點，許多論著中對於這問題，激發思想

的，如西方之衰迷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十字街頭之人類 (Mankind at the Crossroad) 有色人種之興起 (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人生之悲哀 (The Tragic Sense of Life) 歐洲之衰微 (The Decline of Europe) 大陸之命運 (The Destiny of a Continent) 等書。以爲人類之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進步如今日，尙不能滿足人類之期望，甚或引導人類至於不幸的境地，然而現代世界的文化，不論如何之頹廢，不論如何之缺點，在文化進史上有牠的價值，有牠的貢獻，而不可一概抹煞的。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占有廣大的領土，在世界文化史上，本有偉大的貢獻，祇因數百年來因爲異民族所征服，中國的文化，沒有甚麼的發展，所以復興中國的文化，當以復興中國的民族爲其基本條件。各國民族皆誇示他的民族的偉大，在民族觀念的立場，又誇示他的文化高出於其他民族之上，中國民族，自視他的文化，高出鄰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猶太的民族，自視他的文化，爲最高之神所授；法國的民族，自視他的文化，爲近代文化之母，自由之邦，是世界的靈魂，是藝術的淵源，英國的民族，自視他的文化居自古以來文化之最高地。所產生的文學，屹峙那高直的希臘文學，並不見得差，對於政治的改良，是世界人類公認的領袖；德國的民族，自視他的文化，爲世界文化之冠，居於最高峯，而領導世界的前進的。各國的民族以他自己的文化爲標準，而輕視其他各國的文化。我們不能以民族的偏見，來觀察各國的文化。當以各個民族各個國家本有的文化特質，各有其長處短處，以評量各自具有的文化。那末，甲民族

有本民族文化之特長，乙民族有乙民族文化之特長，自不能一概採然了。中國文化有中國文化之特長，歐美文化有歐美文化之特長，不能重視歐美的文化，而輕視中國原有的文化，也不能重視中國原有的文化，而輕視歐美的文化啊。

(一) 文化的意義和範圍

英國人類學者泰洛(Tylor)爲文化下一個定義說：「文化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任何人在社會上，所可獲得的才幹和習慣。」泰洛是注重精神生活方面及人類能力以說文化的意義，(見泰洛所著 *Primitive Culture* P. I)。美國社會學家愛爾烏德(C. A. Eliwood)說：「文化是社會的產品，且爲宇宙進化的顯著狀態，變易，遺傳，甄擇，只是他的始基。」愛爾烏德之意，以爲文化是社會的結果，社會沒有進化可言，也就沒有文化的成績可見(見愛爾烏德所著 *Culture Evolution* P. 8—10)。斯托克說：「文化是一個社會所表現一切生活活動的總名。」斯托克以爲人類在社會生活中，衣食住行動作，及待人接物等事，可以看見他的文化特點，(見斯托克所著 *Storck: Man and Civilization* Cha. P. 23) 孫本文於其所著社會的文化基礎有說「爲禦寒而製衣服，爲充飢而製食物，爲覓食禦敵而製武器，爲躲避風雨而造房屋，爲便利往來而闢道路，造橋樑，造舟楫，爲交通意思情感而創言語，爲維持生活秩序，解決生活疑難，而有道德法律

，政府宗教等等的發明，凡這種種，由人類調適于環境而產生的事物，我們就叫他文化，所以簡單說：文化就是人類調適於環境的產物」孫氏之意，以爲人類之種種創造發明，就是文化。我於中國文化復興之基本問題一書有說：『文明是指靜的狀態而說，文化是指動的狀態而說，文明是人類以其精神力量，對於自然界，創造的，向上的，努力底結果：文化是人類以其精神力量，對於自然界創造的向上的努力狀態。』梁漱溟在所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說及：『文化是指精神生活，社會生活，物質生活三方面而言。』孫本文在所著社會文化論基礎說及：『文化的範圍，大別爲三類，（甲）物質文化凡人類所創造之具體的實物，叫做物質文化，例如衣服房屋舟車橋樑機械器具等皆是。（乙）非物質文化，凡人工所創造之抽象的事項，叫做非物質文化，例如風俗法律宗教道德之類皆是。非物質文化是人類對於環境的產物，大別爲三種，（一）適應於自然環境而產生的，例如：（1）宗教是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的一種信仰的表現。（2）哲學是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的一種系統的解釋，（3）科學是人類對於自然環境一種系統的說明。（4）藝術是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的一種欣賞的表現。（二）調適於物質文化而產生的，例如使用機械器具的方法等一部打字機，是一種物質文化，但要使用這部打字機，便有一種特別適用的方法，這種附屬於物質文化的使用方法，便是非物質文化，一切物質文化就都有一種附屬的非物質文化。（三）適應於社會環境而產生的，例如語言風俗道德法律皆是，適應於社會環境而產生的共同行爲規則：（1）語言是

人類共同生活時，交通意思所必要而產生的工具，（2）風俗是人類共同生活時爲便利生活起見所採用的共同的行事方法，（3）道德是人類共同生活時所公認的行爲正規，（4）法律是人類共同生活時爲維持秩序起見所制定的行事規則。」照孫氏所說文化對於精神上，物質上，社會上所創造的事功，而給後代的人以生活上的需要與便利者就是。據此範圍而論，文化是非一手一足之烈，而要靠往社會集團的相互協力，且種種創造的事功，當以供給社會全體生活上的需要與便利爲對象，祇供給少數人，或極少數的，特權階級的需要與便利者，並非適合於文化的範圍。日本高山樗牛於所著社會學概論，說及：「文化範圍當分完成價值，與貢獻價值，宗教哲學藝術爲完成價值，科學道德法律國家經濟技術等，屬於貢獻價值，」（見漢譯本三〇一頁）但就宗教和藝術在社會表現調協作用時，也可說是貢獻價值。故以此而解釋文化的範圍，也有不清晰之嫌。海蘭於其所著世界文明史要畧（J. S. Hogland, A Brief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Chap. II, p. 50）有說：

「文明是件精神，包含自由自覺服務與自制，文化是物質和自私雖然表現巨大的財富，難抵抗權威和廣博的學術，也許是完全缺乏自由與服務的精神。」海蘭氏之說，對於文化的意義與範圍縮窄而不明他的概念。其次我們對於文化意義與範圍之認識，有幾個基本概念，予在人生問題，文化演進與人生概念篇，操出認識文化有三個要件：（甲）文化是表現人生之生活意義，（乙）文化是表現人生之生活標準，（丙）文化是確定人生之生活價值。在何謂文化是確定人生之生

活價值一段有說：「生活價值，在人能盡其心能力以向上活動，並能副精神上之要求，願望，而得其多少之成平，以效忠社會人羣之謂也。其所表著之成果，惟利益於與個人之生活，而無與於社會人羣之生活，則其生活之價值亦未嘗顯也。文化之性質，是表見社會的價值之標準，此社會的價值，即所以利益於人羣之公共生活者，與個人之完美生活者，在文化普遍的成效言之，是增進社會之生活價值，在文化直接的成效言之，是確定人生之生活價值。」（見泰東版四七〇頁）認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之文化，是否完美，是否進步，是否粗野，是否退化，可以此標準決定之。陳高儲於其所著文化革命文化篇，論及重新估定文化的價值，提出幾個根本概念：（甲）文化是人類生活的表現，（乙）生活即勞動，（丙）勞動是人類從事生產的活動，結論說：「文化是人類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從事生產勞動的各方面的表現。」（見世界與中國什誌二卷六號）人類生活是勞動的表現，人類勞動的表現。在文質文化上，精神文化上，自然有許多貢獻。胡適也說過：「文化就是生活，只生活方式一有變動，則文化隨着變動。」人類生活之演進，自然可以促文化之進步，文化之進步，則人類的生活價值，與社會的生活價值，隨之而表現。然而生活就是表示勞動的意義，勞動是表示生活的意義，生產是表示創造的意義，創造是表示價值的意義，價值是表示文化的內容與範圍；所以隨生活的方式，可以表見文化的程度高下啊。

(二) 中國文化的特質

中國文化的特質是什麼？是應先探討的問題，從地理區別的常慣說，東方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猶拉伯文化，希臘文化。從社會制度區別的常慣說，原始共產文化，宗法文化，封建文化；從程度區別的常慣說，野蠻的文化，半開化的文化，文明期的文化。究之中國的文化，是何種的文化呢？有等文化史家，以為文化是有文字以後才有的，文化完全是社會開明以後的產物；故講世界文化史，就從巴比倫亞述埃及的文化說起；講西洋文化史，則從希臘羅馬的文化說起；講中國文化，就從唐虞三代說起，從文化發展方面來說，自然當斷代由五六千年起。但從文化的起源，及發動方面來說，當溯及沒有文字沒有歷史記錄以前的時期，因此不難說及沒有文字沒有歷史記錄以前的原始社會，野蠻社會，沒有文化。予在人生問題，文化演進，以人生觀念篇有說：『野蠻人之生活狀態，原始文化之可言，願從野蠻人之生活狀態中，亦可觀察文化之發源，不難嘗為絕無文化之可證。』（見四三四頁）因為在野蠻原始的社會中，有社會的生活，有社會的生活，自有演成的生活勞動，自有生活勞動，則在文質方面，及精神方面，自然有多少表現。在九萬年前，在人類史上有舊石器時代的人（Palaeolithic Age）有造各種石器的聰明，他們把碎塊的火石弄尖，以便切割，在寒冷氣中，燃點火，知道用火，就是在文化上之一大進步，新石器時代的人（Neolithic

ithic)對於各種石器製作，更爲精美，他們對於耕種，能利用交互耕種制，這豈不是文化表現的徵驗麼？(見Brief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P.23-24)，所以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文化，各個民族，有各個民族的文化，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的文化。同時各個時代民族國家，也有各個時代民族國家的文化特質。從各個時代民族國家的文化特質，可以知道各個時代民族國家的文化程度。李守常於言海季刊所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篇有說：『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一爲自然的，一爲人爲的，一爲因襲的，一爲創造的；一爲保守的；一爲進步的；一爲直覺的；一爲理智的；一爲空想的，一爲體驗的；一爲藝術的；一爲科學的；一爲精神的，一爲物質的；一爲靈的；一爲肉的；一爲向天的；一爲立地的；一爲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爲人間征服自然的。』李氏說，東西文明有根本之點，即東洋主靜，西洋主動。我以爲文化即是人類生活演進和創造的動力的表現，凡人類爲自然所支配，成爲安息消極依賴苟安因襲保守空想的狀態，而文化只有退落的現象，那有文化之可言呢？梁漱溟於其所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有說：『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爲其根本精神的，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爲調和持中爲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爲其根本精神的，』他以爲上所說的是人生的三路向，可是文化是向前進取的向上努力的。各民族各國家各時代文化的程度，雖有不同，而標準則是一樣，各民族各國家各時代所走的路徑，雖有不同，而方向則是一樣。如至北平者可由津浦

路去，也可由海達天達去，各國文化不一定偏走一路的方向，而不採擇其他之方向的。中國之胡曹作衣，高元作室，巫彭作醫，公輸子削木以爲鵠，墨子斲木以爲鳶，張衡渾天儀，蔡倫造紙，其他如指南針火藥印刷等發明，何嘗不走第一路向。老子莊子列子楊朱阮籍陶潛諸人的思想，何嘗不走第三路向，西洋的靈魂不滅論，比他哥拉士派(Pythagoras)士多亞(Saga)何嘗不走第三路向。印度之外道中如順世派，不信三世，不信梵神，不信靈魂，不厭世，不修行，排斥神秘，崇尙唯物，何嘗不走第一條路向。由是可知東洋之文化，未必是專走一條路的，有一時代，傾向於這一條路，有一時代傾向於一條路；有一時代長於精神生活的方向，有一時代長於物質生活的方向。且同時代各民族各國家，同時也表現精神生活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的事工，不過於三者之中，有等是注重於物質生活，有等是注重於精神生活，不能說注重於物質生活而精神生活完全不要；注重於精神生活，而物質生活完全不要。且三種生活，也是隨通而互相影響的，而精神生活的文化不良，（即宗教道德藝術等），常影響到社會生活和物質生活；物質生活的文化不良，（即飲食起居種種享用）常影響到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社會生活的文化不良，即家國社會國家不良，常影響到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歐洲近代的和現代的文化，可說是注重物質的生活的，克萊因（C. K. Klein）於其所著現代商業及其將來有說『在五六十年之中（一七七〇至一八四〇）資本家在英國建立一個新的帝國，其後歐洲大陸及新大陸接踵而起，說無數的工廠建築鐵路開闢通河，這種

變化，同時對於一般民衆的生活，發生極大的影響。（見現代世界的文化，一一六頁，）近代與現代歐美工商業之發展，可說由於科學的創造發明，這種種的創造發明，增加人類物質的安樂，與社會的繁榮，每一種創造發明，比較前一種更爲精巧便利，而有許多東西，今日所視爲奢華的，明遂視爲必需品，這種變動，對於社會全體的生活和組織，也有極大的影響。近二十年來，交通機關進步之速，影響到全世界整個的生活了，一九一三年世界電話之長度，是三千三百七十萬哩，一九二五年已增至八千四百十五萬哩，其他如國際海底電線，無線電航空，三藩市至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及柏林至布羅斯亞耳斯（Buenos Aires）之無線電話，煤油機及內燃機（Diesel engine）之經濟與效率，工業及交通之電氣化。在一九一三年之後美國，每個工人鋼鐵的出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每個汽車業工人的出產由七・二單位增至一一・五單位，現代物質機械之進步，真是一日千里，在美國所用的馬力，差不多百分之七十都是電氣，美國工廠對於美國工人所設備的機械，平均大約美金六千元，這種工業的變遷，對於社會文化發生一種影響，即是專門的教育，應此需求，而有充分的發展。一九二〇年美國職業學校的學生，是二十六萬五千，一九二六年就增至七十五萬二千，因此繼續設立之機關，如試驗室，圖書館，科學館，印刷局，（專門出版物消數在美國已超過二百萬）他如組織工業聯合會，在美國已超過二千之多，合作的組織，多二千五百餘間以上，這有一顯明的例證，就是物質的文化進步，影響到精神的生活與社會的生活。斷不如

梁漱溟所說，甲國的文化專走這條路，乙國的文化，又專走那條路。我們知道各時代各民族各國家的文化的色彩，是有不同的，也可說在牠特殊的環境中，形成不同的特質，這不同之特質，不是絕對的距離，是相對的歧異。各國各民族的文化特質有所長，也有所短，有一時期，表現這一種文物的特質多。另一時期，表現於那一種文化的特質多。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特質，是注重社會生活的文化呢？是注重精神生活的文化呢？抑是注重物質生活的文化呢？我以為中國文化的特質，從精神生活方面表現的，是愛和平重人道的文化，中國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故他的文化是愛和平的文化，幾千年來的教義，是主張以德服人，不是以力服人，主張以德教維護政治，不是以霸道擾亂政治的。民族主義第六講說，「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只有中國是講和平的，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國家。」我在孫先生之思想及其主義一書有說：「中國人有民族道德，故對於其他隣處的民族，都是講親愛講和平，間有雄才大畧之君主，併吞隣邦，只望其納貢稱臣已足，不主張侵侮的。」（見一〇五頁）中國古代大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都是鼓吹和平主義者，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受儒道墨三家之思想甚大，這種文化可說是深入社會之一般生活中，（其詳可參考拙著中國文化復興之基本問題一書七二—七三頁），從社會生活方面表現的，是注重忠孝仁愛信義的社會最高道德的文化，家族之基本信條為孝悌，故說：『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社會之基本信條為忠恕仁愛信義，故說：

「施諸已而不廣，亦勿施於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中國幾千年來家族基礎之鞏固而不致於鬆懈。社會維繫而不致於破裂，可說是這種文化彌綸於社會生活中。從物質生活方面表現的，是注重和用厚生調協國民經濟的文化，重農貴粟，爲物質生活之基本信條，人民因此安居樂業，使幾千年的農業文化保持而不墜，雖科學的創造供獻不如人，而維繫幾千年來的歷史（以農立國）而不致消滅者，這是重大的原因。文化發展滯進，爲人類勢力向上的表現，不論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皆存此傾向。梁漱溟所說：「以意欲爲調和持中，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也不過是一種求生存求進取求向上之另一種方法而已。然而方法不良，文化或陷於停頓保守的狀態中，其甚者或陷於衰落的狀態中，古代具有文化歷史的國家不少這種的慣例。海通以來中國的文化，與歐華的文化，兩相比較，遂覺歐美之文化爲進步的，活動的，有生趣的，乃吸收歐美之文化，而補充自己的文化，一方採取歐美優良之文化，一方宜保存自己原有優良之文化，而後文化有改良的氣象。有一美國駐華記者(Nathaniel Peffer)寫了一篇中國文化的滅亡，登在美國-Harpers雜誌，形容中國之混亂無定形，他說：「中國文化的精神已死，牠和西方那種更有勢力的機器文化接觸，以致受了破壞，歷史上的文明已失了功用了。種種決定中國社會組織以及人民生活方法的遺風，已經是再沒有維繫人心的力量了。舊的價值的觀念，已不被人承認了，各種制度都已經受了擾動，信仰也不會再一成不變，風俗是移動的，甚至一代傳一代的刻板習慣，也被打破了

，整個的中國社會結構力，在一代之中鬆散着，到了如今，忽然崩潰了」（見民國日報現代青年一百五十九期）中國文化的精神已死麼？，我以爲中國的文化特質，近百年來，已有衰落之趨勢，但是自中國革命運動以來，文化的根苗，已漸有培育潛長的機緣，假定中國文化的精神，已經死滅，則中國的文化，再沒有復興的展望了。中國優良的文化特質要保存，歐美學術思想及物質科學機械的文化採取，中西文化之創新表現牠機構的牛力，必可以挽回中國社會已鬆懈的組織，而鞏固牠生活的基礎，這是可以自信的。

（三）中國幾千年之經濟狀況與文化演進的關係

中國幾千年之經濟狀況，實在不容易以簡簡的文字敘述，尤其是幾千年經濟狀況，與文化演進關係，不容易以簡短文字敘述。生民之初、經濟的生活，是不能一日缺少，人類在經濟的生活中，有種種的創作發明。這種種的創作發明，就是人類文化之成績。經濟進化的階段，不能免於蒙昧期與野蠻期，蒙昧期與野蠻期也有文化之表現，在蒙昧期上段發明巢居與語言之形成，中段發明用火與古石器之使用，下段發明弓矢與新石器之使用。在野蠻期上段，發明陶埴與牧畜種植，中段發明銅器與牧畜，種植均較興盛，下段發明鐵器與文字，中國有史以前——有文字以前——之經濟狀況文化狀況是怎樣？沒有專書系統紀述，年代與事實，均不可考，但中國在古代曾經一次的洪水

，把加以前的文物以掃蕩，這是比較可信的，夏曾佑中國歷史稱：「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城郭之大可知。」這時期的洪水，必遲延幾幾舜的時代，不然，斷不至有禹受命疏河決江，疏河決江的功績，是人類文化已有進步的象徵，因淺演的文化時期，斷沒有疏河決江的本領，尸子一書說及：「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無有丘阜高陵者滅之，名曰洪水，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不窺其家，」這十年不窺其家的治水勤務，是沒有文化的人民可以做得到麼？洪水以前中國文化，以經濟生活上的需要，已有許多之創作，如燧人氏發明火，庖犧氏制嫁娶，造琴瑟，芒氏造網羅，神農氏發明醫藥耒耜。宿沙氏發明鹽，蚩尤發明兵器，隸首發明算數，伶倫發明律呂，黃帝發明樂與冕旒，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后儀占歲，大撓作甲子，賀秋作舟，容成作曆，蒼頡作字書，胡曹作衣裳，女媧發明笙簧，隨賁明竿，夷發明鼓，嫫發明弓，夷牟發明矢，巫咸發明醫學，嫫祖發明育蠶，祝融作市，唐虞發明漆器，舜發明陶器，伯夷作五刑，垂作鐘，夔作樂，鯀作城郭，禹作宮室，奚仲作車，夏作贖刑，儀狄造酒，可見上古洪水以前之創作已有可稱述，（洪水以前之創作，見世本有作篇），易繫辭有說：「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西人拉干百里Lacordaire言八卦即巴比倫之楔形文字），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考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蓋諸噬嗑。神農式歿，黃帝堯舜制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從以上各書所引證，可證明洪水以前創作之盛，據丹徒柳詒徵所編中國文化史有說：『自燧人以迄唐虞洪水之時，其歷年雖無確數，以意度之，最少當亦不下數千年。』我們知道社會之演進，文化之開始，固非一手一足之烈，且亦非一時期所能概括，文化創作之開始有幾個定律如下：（甲）人類是爲經濟的生活而結成集團，（乙）人類因經濟生活爲需要所迫而分工協作，以創造各種生活的工具，以節約其精神能力，（丙）人類因創造各種生活工具，而促社會文化之演進，與生活集團之日益鞏固，（丁）人類因生活工具創造後，社會之幸福與便利日益增進。中國幾千年文化的進步，可說是播種於伏羲，艸農黃帝堯舜，而萌芽於夏商，發揚於周秦漢唐，停頓於宋元明清之間。伏羲之世，創作頗多

其與文化之開展有關係者，約有八大事：如畫八卦，制嫁娶，興田漁畜牧，（由漁獵時代進至游牧時代）製衣服，築城邑，（當時尙用土未用磚石），創官制，（因龍馬之瑞以龍紀官），作曆數，造琴瑟，自伏羲傳十四世而至神農氏，在這時代發明有七件大事，如耕稼樹藝五穀，製茶，及製油，醫藥，市廛交易，製陶器與鹽業，神農傳七世而黃帝代之，至黃帝時建基立國，發揮文化，其主要者如立五官以治民，置左右大監以監萬國，畫天下爲九州，命匠營國邑，使人民安定其生活，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間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井一爲鄰，隣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州，復教民養蠶治絲以供衣服，作弓矢甲冑以資防衛，造宮室以避風雨，發明貨幣以制國用，探討病理以明醫學，凡茲種種，皆爲適應上古時期社會經濟狀況而開發他的文化，在有史以前之經濟生活狀況、穴居野住，茹毛飲血，文化簡陋，不足以供需求，韓非子蠶室說：「上古之世，民食果瓜蚌蛤腥臊羶臭而傷害腸胃，民多疾病，」禮記禮運有說：「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初民生活如此，其苦可知，故文化之生產，是所以供人民之便利，而除人民之禍害的。唐虞時代，中國文化開始進步，在這時，最著爲農業文化的特色，農業文化的開始，在於人民生活的安定與農時的測定，人民生活的安定在於奠定九州，消除水患，堯舜之時，中國水患仍甚，且禽獸迫人，民無寧居，鯀受命治水無功，復命禹治水，禹從事以繫山通道，疏九河，濬濟漯，決汝漢，排淮泗，而水患大治。復算

定九州而安人民，如冀州（今山西直隸），兗州（直隸東南山東西南），青州（山東東境），徐州（山東南江蘇北及安徽東北），揚州（江蘇安徽南及浙江西北），荊州（湖北南境及湖南北境），豫州（湖北境及河南南境），梁州（陝西南境甘肅東南及四川），雍州（陝甘北境及嘉峪關外地），九州已定，人民得安居農業，而後可以開發文化。農時之測定，關於農業之發展，即立之後，命重黎之後，羲和二氏司天象，羲仲居嵎夷，羲叔居南交，和仲居西，和叔居朔方，分四方遼遠之區。實事測量，所以定度數，驗里差，準節氣，成歲時，便農務啊。唐堯定曆法，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制，通行四千餘年，可知影響之久。書經堯典篇說：「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書經釋授時之法最詳，農時之外，一切行政，皆根據時令，故有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之說：堯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據馬融之解釋：（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中橫管，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所在。」鄭玄也說：「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中國幾千年前已經發明窺探天象之具，以勤助農業，可知文化開闢之初，已具的進步性。楊東專於所編本國文化史大綱說：及：「中國的經濟基礎，從來就是手工業的農業的經濟，帶着很濃厚的封建的色彩，故此中國文化特徵就是農業經濟之下的山林文化，我以為山林文化，不如說農業的平原的文化，較爲切近。農業與土地有密切的關係，人類爲明土地之種植，是經濟上之大變動，也是文化上的開展，農業要開墾土地，開

墾土地，要靠耕種的器具，故耨具的製造發明，是人類進步的徵象。中國自黃帝蚩尤，與帝堯平苗兩大戰役後，疆土漸漸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而伸展。這伸展之所至，就是把土地大大的增加，當土地未有大加擴張時期，土地必成爲自由耕種，在那時只有部落的團結，沒有國家的組織，後世徵收田賦之事，必沒有發生，農業的生產，必爲耕者所獨享，其後疆土擴張了，耕地日益增多，國家組織畧爲完備了，分配耕地，乃核定一種的方法，彙收土地爲國有，計口授田，平均分配，一以安定人民的生計，一增加國家的收入，這是社會文化重大的進步。孟子滕文公章有說：『夏后世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據馬端臨千文獻通考有說：『其時三代之制，天下之田，悉屬于官，民仰給于官者也，故受田于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視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疆土的擴張，靠往國家的武力，以國家武力所得來之土地，計口授田，平均是可能的事，照宋儒朱熹註解孟子上邊的話有說：『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制井田，以六百三十畝劃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不復稅其私田，周時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具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也。』關於貢助二法，有以爲貢者，是不增數年收穫的總量十分之一爲租稅的額，助者是以勞力代租稅，謂井田法，井田法於孟子之外，穀梁傳禮制之王制等，均有記載，至徹法則孟子無明白的

說明，或說徹係助之別名，或說係兼用貢助二法，清崔述著三代經界通考，謂通其田而耕，通其粟而析之謂徹，可知徹乃共同耕作的制度。授田制，是古代所實行過的，胡適等說：「古代未行過井田制，諸書所言田制，皆漢儒所虛造，」我以爲古代疆土擴張之後，田畝廣濶，爲國家所公有，國家將公有的土地劃井分野，授之人民，使人民共同努力生產，並治家的公田，以供國家之費用，這是可有的事象。周代農業較爲發展，文化也較爲進步，農業經營的方法與較古的時代不同，如黃帝時代，是採大農經營制，八家共同生產共同分配，至周時已復舊觀，以孟子八家皆私百畝之言考之，可知周時已採取小農經營制，不過八家各自生產，於公田百畝之中共同生產而已（可參閱顧國齊著中國土地問題之史的發展八頁），然周代田制經營只有享田權，據漢書食貨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還田之說，則可知土地是依一定年限而受還，土地受之於公，人民不得買賣，土地是由國家管理的，土地的制度已經確定，其他關於文化演進之工商兵車武器賦稅金融，皆從之進展，這是很重要的歷史事實。據司馬法所說：「周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爲治人之道，地著爲本，故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

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十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萬人，故曰萬乘之主。依司馬法所說，可知土地編定之後，關於兵車戎馬武器等，都是人民直接供給，兵車戎馬武器之供給，豈是淺演文化的社會所能做到的麼？國家文化之發展，當然要靠住國中經濟狀況之改進，國中經濟狀況改進了，而後國家的財政能够提供出來，周禮說：『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又說：『太宰以九賦欽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農業文化的國家，須要防備凶旱水溢，在積極上要儲蓄民食，倘國家時時遇着凶旱水溢，則經濟受了摧殘，文化必隨之而衰落，王制說：『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農業發展了，社會經濟必從而改變從中國經濟演進的狀況而觀察，計口受田，這種制度，是社會較為進步的徵象，這種制度的破壞，是社會演進時必經的階段，不是社會文化倒退的現象，因為人類有智慧勤惰，其具有智慧而勤耕者必超越計口授田之數，乃為井田之制所限，接踵許多曠土，不能取而經營之，其愚惰而不願從事於墾畝者，耕稼的能力，實不及此數，乃為井田之制所限，其墾耕之地雖大半荒蕪，他人亦不能起而代耕之，則不能盡地利而妨害人類生產。

之增益，社會之進步，人力與地力必使其如其分量以爲調劑，凡阻礙此調劑的制度，自必隨社會文化的開展，而歸於淘汰。且社會進步，人口滋生，社會情形必日見複雜，欲依據定制按口授田，而積有定，而人口增加無定，想求土地的公平分配，勢有所不可，革舊鼎新，徒勞紛更，這也是使經界制度不能持久之原因。周末時期，因工商業的發展，社會起了大變革，在政治上，諸侯與侯間，貴族與貴族間，互相攘奪爭戰，對於土地，務爲兼併，社會中之豪強者，互相競於壟斷，孟子說：「仁政必自經界始，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就是說明這個時代的現象。

周室東遷以後，中央集權之制廢，封建制度隨之漸次崩潰，這是因爲社會經濟狀況，即人口增加，原來土地制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戰事頻仍，諸侯務爲攘奪，貴族務爲兼併，豪強對於下層的社會，務爲壟斷壓抑，一般平民，亦相競於發表他的才能而在社會上政治上抬頭。社會的制度變遷，而文化也隨之而變遷，這是中國文化演進史上之一大轉捩，當分兩時觀察，春秋始於周平王四十九年，（即魯隱公元年，）自以是後，諸侯互相爭鬪，強并弱，大兼小，衆暴寡，當初凡千八百國，至是時諸侯存者，祇百六十餘，其間最有關係者十四國而已，這等國家，互相爭霸，如齊宋晉楚秦吳越，或地醜德齊，待隙而動，或肆意兼併，無所顧忌，或剪除異己，殘民以逞，那末，領土因此而日益割裂，社會經濟受了劇烈的變動，而文化也因此有急激的趨勢。當時國際信義，已不足爲統治階級信用，孔子在當時特標舉德治主義，禮治主義，奔走於齊魯衛楚陳

鄭宋之間游說，想當時的君主諸侯，有所感動，不要侵伐誅殺，使社會民生不要受劇烈的震盪，但不爲當時的君主諸侯所採用，季康子有一次問政於孔子說：『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答他說：『子爲政焉用殺？』當時魯之君臣，對於人民極其搜括，對於孔子的忠言，也不能信用，孔子乃退而著書立說，以振興文化的重大責任，領導天下後世，在那時候有一個管子。以爲於德治禮治之外，當兼任法治，所以他說：『不法法則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然管子不徒以法爲標榜，且極端注重國民經濟的，他以爲國民經濟的充裕，與國家文化有重大的關係，所以他說：『倉廩實則禮節，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輟滯積，修逆途，便關市，慎收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刊陂溝，決滯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又說：『國侈則費用，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又說：『貧富無度則失，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觀管子所說及其在政治上的實際行動，均是注重國民經濟，以興起國家的文化的。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講富國強兵的時代。因爲講富國強兵，不能不講延攬人才，在野之士，爭自磨濯，力圖上進，而文化才有充分的發展，因講富國強兵各國相競以攘奪土地擴充自己的領土，富裕國家的財源，而文化才有嶄新的氣象，我們看當時在文化上爭鳴之各派，就可以知道了，如儒家雖是開揚抽象的仁義學說，但是期望認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之始，道家雖是主張歸於自然的玄境，但是期望含哺而熙鼓腹而遊藝

齊氏的理想世界，法家雖是變革政治主義，似齊一而治，也是變革相齊，李悝相魏，申不害說術，商鞅談政，是極注重耕戰與農墾，至農家雖無專家，然相土地墾時令，耕並耕之新說，長索以勸農救民爲職志。如同馬稷直隸武興起之機，也足以保障國家領土爲目標，橫橫家立說新奇，以洞觀大勢的炯眼，外交的技能，使當時人君採擇他富國強民的策略。春秋戰國之世不獨各派以思想學術爭鳴，而在文藝上，亦足以表見文化之精彩，如管子之雄辯，老子之古奧，莊子之奇逸，論語之典雅，孟子雄辯，荀子之詳贍，墨子之高遠，左傳國語之辭華，韓非國策之奇峭，屈子離騷之淵深，可說是文藝上極盛時期。戰國之世，因農工商業之發展，社會經濟狀況之驟變，而社會制度隨之劇變，（甲）官制的破壞戰國時期，諸侯設官多與古異，如丞相將軍等名稱，與秦漢官制，漸爲接近，（乙）徵法的破壞，周代稅法用徹，至魯宣公時，改十徹其二之制，（丙）井田制的破壞，各國互相吞併，田地時易其主，魏用李悝盡地力之說，秦用商鞅開阡陌之法，古代受田之計遂廢，（丁）貴族制的漸次破壞，春秋時貴族政制漸次崩潰，下層社會漸次抬頭，（可參閱朝野僉誌十則拙著春秋時之貴族政制一篇）至戰國時其勢更甚，戰國時羅致客卿，平民更有機會上進，如齊宣王稷下談士，多至數千，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門下食客別亦羅致千數，蘇秦張儀，以微賤之軀，一躍而爲卿相，貴族制的崩潰，是社會文化進步之一與徵，（戊）刑法的破壞，古代刑法，較爲輕微，至戰國之時，各國務相爭奪，對於人民以嚴刑束縛，使內部

整飾，俾可以一致對外，如秦有腰斬車裂夷三族等刑，齊有烹刑，楚有冥室滅家等刑，君權擴張，故將輕刑之制，加以破壞啊。

戰國之世，是中國社會經濟大爲劇變之期，也是社會制度和社會文化，大爲轉振之期。（春秋之後，是爲戰國，戰國之始末，自周貞王迄秦滅齊凡二百四十八年，其曰戰國者，亦以國策記其時事，劉向定其名爲國策，故緣書而名其時，據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稿所考證）顧亭林於日知錄有說：「春秋時猶尊重禮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晏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俞曲園雜纂有說：「此百三十餘年（自左傳之終至顯王三十五年凡百二十三年）畧見於六國年表，觀韓朝侯六年伐東周，知諸侯無天子也；趙襄子元年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知諸侯得專封也；秦簡公七年初觀禾，孝公十四初爲賦，什一之法廢矣；秦厲公十四年，晉人楚人來賂，聘問之禮廢矣；秦簡公六年初令吏帶劍，捍護之容廢矣。秦孝公八年與魏戰斬首十萬，首功多矣；秦靈公八年以君主妻河，禮俗變矣；此春秋之所以爲戰國也。」觀上所說，戰國時期，是社會制度國家政制大爲變革之期，其時七國如齊楚燕秦趙魏韓，而七國中，國勢與文化較高者爲齊秦，這兩個國家，都是因社會經濟情形

，以當時的國家好納緣故。兩個國家中，又以秦魏併開拓領土之氣爲好，所以後來能都霸中原統一天下也。齊自田常弑簡公（一作陳恆）執掌齊國政令，四傳至田和季年，魏文侯爲請於周安王，受命爲諸侯，自齊威王用孫臏爲將，再戰勝魏，宣王勝燕，湣王滅宋，那末，東諸侯的勢力，可與秦相抗者，惟有齊國，史記蘇秦傳稱：「齊地方二千里，臨淄之民甚富，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張琴門雞走犬六博陽陶，四溜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可以知道齊國之經濟狀況了。

秦自孝公田商鞅（衛之庶孽）變法令，徙都於咸陽（陝西咸陽縣東），伐魏國，魏獻河西地（陝西東北部地），秦至是始強大，其後惠王任張儀（魏人）更東取魏地，擁有函谷（河南靈寶縣）之固，南收巴蜀之地，秦益富饒，及范雎（魏人）以遠交近攻之策說昭襄王，於是秦將白起伐楚舉郢，拔韓野王（河南河內縣）攻魏上黨，坑軍于長平，而遂與齊魏相結，卒之始皇用李斯謀（上蔡人）陰滑辯士，游說諸侯，離間其君臣，然後以兵威之，數年之中，遂併天下，淮南子要覈說及：「秦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形形便，蓄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立諸侯，而商鞅之法生焉，」通典說：「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耨，地利不盡出，于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廣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於多少，」史記商君列傳說：「以商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本。』朱熹問阡陌辯論及：『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出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併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可知商鞅之改革土地經界，是社會制度有進的一個現象。秦之所以統一中國，是商鞅變法之功，而鞅之變法，是根據社會經濟演進的情形，而爲富國強兵的計劃。考秦之所以成功的原因：第一，秦居關中據上游扼地勢之要害，第二，秦居西北與戎狄爲鄰，生於競爭之結果，使民風尚武，第三，秦歷代多英主，能招納賢才，第四，秦因併土地日廣，經濟富力，爲六國之冠，（其詳可參閱王桐齡所著中國史第一篇本論），秦代根據國家經濟演進的情形而爲文化的開展：（甲）法令的統一，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秦代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於是法令遂成統一，（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且法律趨重平等，舉國賢愚貴賤，莫不受治於法，公子虔是貴族，犯法則劓之，太子是嗣君，犯法則黥其師傅，所以法令嚴明，人莫敢犯。（乙）司法的獨立，自天子殿中御史丞相，以至諸侯郡縣，皆各置法官，司法之制，因而嚴密。（丙）農務的奮勵，督促民間，努力農務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工商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丁）內政的整理，當時見稱於孫卿，以秦國內，民俗樸質，百吏肅然，且行爵祿之制，

五家爲保，十家爲連，一家有罪，九家共舉發之，若不糾舉，十家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罪，因內政的整理，成就一天下之功。（戊）地方制度的改善，秦代廢封建而爲郡縣，以便治理，是國家形式的進化，因爲地方過小，則稽核太繁，過大則控制不易，其時所置郡如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障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琊，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雁門，九原，上郡，隴田，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三十六郡，此外又有閩中南海桂林象郡，不在三十六郡之數，可見秦代的文化勢力已及於南方。（己）官制的改訂，秦之官制頗簡，而綱目張，內官之要職凡三：丞相，相天子助理萬機，太尉掌武事，御史大夫，掌監察之權。外官之要職凡三：郡守掌治郡，尉掌守甲卒，監掌監郡，內官制，同一系統，丞相與守掌民事，太尉與尉掌軍事，可說是軍民分治，另御史與監，是糾察治民治軍之官的，秦時大縣，萬戶以上者置一令，不及萬戶者則曰長，令長之下皆有丞尉，丞尉受命於君主，對中央政府負責，中央集權之制。因此而日固。（庚）兵制的釐定，秦代對於有軍功者受上賞，爲殺門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亦除其籍，至兵制是舉國皆兵，依商鞅所定計割，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老弱爲一軍，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糗，陳而待令，與歐美徵兵之制無少異也。（辛）地方自治的普及，秦時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

，奮夫，陟敵。三老長教化，奮夫職，收賦稅，游徼，徵捕盜賊。三老出於選舉，無異於今之鄉自治職員。（見漢書百官表）（壬）萬里長城的建築，秦時匈奴異族，是遊牧部落，專掠掠中國的邊境，戰國時，燕趙等國，因北地山險築長城以備胡戎，秦始皇滅六國，乃首聯絡之，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從臨洮起首，築到遼東，凡五千四百四十餘里，號萬里長城，西人南懷氏，列爲世界大工程之一，秦始皇築萬里長城，所以防胡人之南下，胡人南下，必把中國的領土侵畧，人民食場受佔領，影響於國民經濟生活者必甚大，這個建築，雖勞民傷財，然在中國文化上是有重大之貢獻的。（癸）建設事業的勃興，秦徙天下之富豪於咸陽十二萬戶，築宮咸陽北阪，並治馳道，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關中建宮三百，關外四百餘，這偉大的建設，爲秦代以前所不及。其他統一文字，在文化的發展上，也有重大的關係，秦時定書爲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均用之簡冊，三曰刻符，用之符傳，四曰殳書，用之旂信，五曰摹印，用之璽，六曰署書，用之封檢題字，七曰殳書，用之銘勒兵器，八曰殳書，用之徒隸，而以殳書最爲流行，此亦可見秦代之創作，惟是秦代因伸張君權愚弄人民的結果，秦時書坑儒士，卒成文化上的大厄，這是可惜的事。

漢代成一大一統局面，而文化也有統一的趨勢。我們從經濟的方面先觀察一下，自秦代創立私有制度，人民雖因自由競爭而促社會之進步，但由私有制度結果，土地漸漸集中於豪富之手，遂致貧富懸隔，正如舊政治論中所描寫的：「富者席餘財，貧者鬻田而食，歷代爲傷」

，猶不勝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同時因人口日多，而社會需要田地耕種日多，所以董仲舒主張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併之路，孔光何武主張更民名田毋過三十頃，明監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師丹相孝哀，也主張限田說，社會經濟已發生這種情形，所以社會制度和社会文化，也跟着這種情形而演變。(甲)疆域的擴張，因為感土地的需要不足，不能不努力擴張領土，於是南方諸國，如桂林象郡南越，一概內屬，西南部分，由唐蒙通南夷，司馬相如通西夷，郭昌平西南夷，且把朝鮮統屬中國的版圖。先後遣衛青霍去病等北伐匈奴，其勢漸漸瓦解，中國文化遂施及北方。(乙)西域的交通，漢代葱嶺以西，有九個大國如條支，安息，大月氏，大宛，烏孫，武帝欲交通西域，特遣張騫探險，由隴西出發，經過大宛康居到月氏，又從大宛到輪臺。分置屯田，設立亭障，以戍西振，通及天山的南路，威服了西域諸國。(丙)水利的講求，以前農業經濟，有重土的關係，漢代用劉楨文翁，把水利來加給大多數的平民，為社會所稱道，武帝時穿渭渠灌漑渠及白渠，又親自率領子河，以除水患，其關心民生的證據。(可參閱商務版本國史)(丁)財政講求，理財的計劃，是國家經濟進步的象徵，漢武帝時用了鄧禹孔僈桑宏羊之徒，把財政講求，先從頒行新法。(子)設均輸法，設平準官於京師。(丑)天下鹽鐵，由國家專賣。(寅)用白鹿皮為後世鈔幣的先河，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鑄五銖錢。(戊)重農的政策，漢代對於民食非常注意，特置有力田一科，獎勵農業，文帝時採用晁錯的重農貴粟疏，准人入粟縣官拜爵爵除罪，

景帝時聽民移徙寬地，並親耕籍田，做人民的表率，武帝時用董仲舒的計劃，特遣謁者勸種粟麥，又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用趙過爲搜粟都尉，趙過把后稷所創的代田法，廣告人民，用力少而得穀多，可算是農業上的進步。（己）通商的發達，西漢時代極力發展國外的通商事業，商業區域，擴張到匈奴朝鮮西南夷西域，直達現今阿富汗及波斯印度一帶。這通商區域的擴大，就是爲後來輸入印度佛教文化的通路。中國是蠶絲出產國，織的綾錦，文彩鮮明，質地堅美，很合當時異國人嗜好，亞力山大東征，綾錦更輸入歐洲的方面，震耀歐人的耳目。可見當時物質上的文化勢力了。但是這正在膨脹的商業經濟，是否與當時大多數平民經濟相適合呢？商業資本的發展，對於農民必加以剝削，以高利貸吸取他們的血汗，或以賁力吸取他們的耕地，農民受着商業資本的壓迫和榨取，都失掉了耕地，日陷於貧困破產，在這殘酷壓迫中，不能不找一條出路，王莽是當時一個政治家，看見這嚴重的社會經濟情形，想將耕地制度根本改革，復興古代井田制度，所以詔令剝奪大地主私有過剩土地的權利，凡有超過法定一頃的，應平分九族鄉里，據井田法的表示，田爲一人所有，他頒佈詔令中有說『今更天下之田爲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過八而田滿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如制度，敢有私井田墾制，無法惑衆者，投之四裔以禦魘魅，』可見他看見當時嚴重的社會經濟情形，而表彰堅決的主張。莽復古運動，施行兩年，結果引起社會的騷亂，御批通鑑輯覽上所說：『莽性燥擾，不能無爲，有所

興造，動欲慕古，不定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奸，天下騷擾，陷刑者衆，并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賣得賣之，」史家稱當時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貧民流離於道，在那時農民受不得壓迫，不得不起來暴動，即所謂赤眉之亂，赤眉是那時貧民隊伍中最大的部分，是失掉耕地的農民，是受了苛捐雜稅天災兵禍，以及商人地主剝削的無產階級，這百餘萬人的暴動，結果祇推翻了王莽的統治，光武恢復了劉氏的統治權，因經濟社會的困苦，發生農民的暴動擾亂，因農民的暴動擾亂，而文化遂受摧殘，隋書牛弘傳有說：「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

東漢光武，繼續了統治權，注重休兵息民，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關於稅制，改田租十一之制，爲三十稅一，他對於經濟上先求鞏固社會的基礎。而後注重國家文化的復興。光武即位之後，首起大學，大興教育，立五經博士，修明禮樂，起辟雍和明堂，設小學以教授貴族子弟，且力獎名節以矯頹風，當時長安遊學諸生，如鄧禹學詩，賈復學書，馬援受齊詩，耿弇治詩禮。寇恂馮異通左氏春秋，對於文化頗有貢獻，至漢明帝時，戶口增多，國庫充實，國家威力向西發展，即超使西域後。印度與中國交通，以大月氏屬賓爲運輸的中心，明帝命蔡愔使月氏。求佛教經典，還還洛陽，從事繙譯，印度佛教的文化，東漸中國，使中國文化學術思想發生重大的影響。關於國內的文化，如註疏學，訓詁學，校讎學，其學益盛。其他天文學，醫學，音樂學，

圖書學，建築學，也有發達的象徵。但是東漢到了末年，因政治上的混亂，演成社會經濟的混亂，黨禍日興，宦官日加跋扈，宦官的親友，出掣州郡，剝削百姓，百姓冤無可訴，就變成盜賊，鉅鹿張角聚衆起兵，號爲黃巾。繼有三國紛爭，一直到後魏六朝時代，總是中國社會極爲紛亂的時期，幾百年全國不斷的戰爭兵禍，將社會生產關係破壞不堪（晉惠帝時天下荒亂人民多餓死）這個紛擾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國西北部游牧的民族，侵入的擾亂，一方面是大多數的農民，在當時商業資本及地主剝削之下，受了痛苦，因這兩種原因，釀成許多流離轉徙，得不到耕地以資生活的農民，成了當時社會嚴重的大問題。如後魏孝文帝太安和時，李世安上疏說：『竊見州縣之人，或因年荒流移，棄賣田地，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陵，』可說是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描寫。社會陷於擾亂，經濟發生窮困，國家文化，也受重大的影響。如劉石之亂，漢時經學多失其傳，南北朝風尙多趨浮華，不務實際，是也。

五胡紛亂幾三百年。這時期是中國文化銷沉的時期。及隋代興起，文帝統一中國，先從改善社會經濟着手，勸課農桑，以滋殖生民衣食之源，煬帝承天下昇平之後，內則盛興土木，外則屢勦遠界，文化事業亦多發展，如官制咸依漢魏，或仿北周，組織頗爲完善，兵制以府兵爲最善，分平時臨時二種，京師平時之兵，掌於十二衛，地方平時之兵，統於刺史都尉，臨時之兵，有左

有十二軍等名，唐代兵制，即仿此而改進，學制則普及學校於郡縣，教育達於西方，又注重交通，開通濟渠永濟渠邢濟江兩河，自天津達杭州，長凡二千二百餘里，中國南北文化賴以溝通。

唐代統一中國，都於長安，他的國勢，可稱強盛。其文化亦稱盛一時。當太宗時國承財力日盛充裕，所以能維持統治至三百年之久，唐代政策，也甚重社會經濟的調劑，通考說：『唐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稍假義倉以備他實，神龍中畧置。玄宗復置，後第琦訪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其法不但儲糧，且儲布帛絲麻等，又置庫以儲本錢，其制更備。

唐代也極注重農民的耕地問題：唐武德七年規定口制，凡天下男丁十八歲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田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以樹榆桑棗，及宜之木，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受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第一易者倍受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墾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並賣口分田，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親役者，且唐制度雖因玄宗時爲着燕鄉賜之故，三年造鄉賦一年造計賬，因而廢止，也是因商業發展豪強兼併因而崩壞，新唐書食貨志說：『初永徽中，禁賣世業田口分田，其後豪強兼併，貧者失業。』杜佑在通典中曾說：『開元天寶以來，法令廢弛，兼併之弊，有踰於漢哀之間。』可說是描寫當時社會經濟狀況。我們知道唐代盛時國力

充盈，文化發達，是商業與經濟發展的原因：（甲）東西陸路的互市，東西陸路的交通，至唐而極盛，唐與征服東西突厥，闢天山南北葱嶺東西孔道，橫越中亞細亞，包有烏澹河（即阿母河）兩岸之地。遂與波斯接壤，西域諸商之東來者日多，中國人之商於波斯天竺者日衆，中西文化因此接觸而交換。（乙）海路的交通，唐代商業發展，印度洋之航路大通或自錫蘭傍西由印度海岸而入波斯灣，或循阿剌伯海岸而抵紅海灣口之亞丁，錫蘭一島爲當時商業的中樞，中國人馬來人波斯，非尼其諸種人，皆輻輳於錫蘭通貿易，及阿剌伯勃興，恢復海運，經過南洋諸國，達到我國的沿岸。武后時，阿剌伯商人在廣州泉州杭州的計有數萬之多，可想見當時的盛況。唐代的經濟情形是這樣，故對於文化能有所發展，太宗時立宏文館，興州縣諸學，後又開禮部試，集四方名士於京師，此外巡狩行事，集四方之俊秀於行在而試之。關於教育，京師國子學，大學，四門小學，專門學校，有律學，書學，算學，又設有崇文宏文兩館，爲皇室功臣子弟所學，他如軍事訓練，亦設博士授之經，文化隨經濟的進展而擴張。因此日本高麗新羅高昌百濟吐蕃西藏等地，羨慕中國文化服飾禮義之美，遣子弟留學於唐，與今日我國學術荒落而留學於國外，適成反比例。但是唐代末年的情形就大不同了，唐代末年因爲封建藩鎮的割據與土地兼并的厲行經濟上有此劇變，社會上起了大騷亂，所謂十節思使，各統數州，掌握土地中兵財賦之權，獨佔兼併之事，日益發展，租庸調之稅法，難以實施，班田法也等于具文，中國財政史講義有說：「自武后亂國以

來，民避徭役，逃亡漸多，田瘠移于豪富，官不收授。『唐末黃巢的暴亂，就是因爲廣大的農民，失掉耕地，不能負擔煩苛的賦稅，起來暴動的緣故，據唐書所載黃巢到長安時曉告民衆說：『黃王非如唐家，不惜爾輩，各安爾母恐。數日後如是大掠富有者，縛筆諸人，索財號洵物，富家皆洗，編出他的家宅，掠得官吏悉數斬殺。』可見這種情形，純是社會經濟收況劇變演出的行動。無疑的這種行動影響到唐室的命運，從黃巢叛亂一直經過多年的爭奪屠殺，造成五代的局面，北方畜牧民族 侵擾，釀成六七十年的戰亂實爲中國文化史上黑暗時代。『唐代文學史學經學所以興盛，固由大學植基之深，亦由搜輯圖書之效。』書至唐始分四類 爲經史子集，黃巢之亂圖書多亡）五代時，中原板蕩，黃河南北，爲沙陀契丹之戰場，至石晉割燕蓟十六州以賂遼人，於是燕燕之地，爲遼族的窟宅，梁唐晉漢周，先後佔領中國，生靈塗炭，比之五胡亂華，南北朝分裂時代，有過之無不及，中國文化的銷沉，是必然的結果。

五代兵戰頻仍，人民不能安居樂業，流離失所，不堪設想，一切供應，皆取於田賦，全國經過多年的混亂，耕地舊有制度之破壞，和佔有關係之混亂，已到極點。在這種經濟狀況之下，故宋代三百二十年中，都不能頒佈一耕地法令，宋史食貨志說：『五代以兵戰爲務，條章多闕，周世宗遣諸使均割諸州田，（令官吏到各地均賦）（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可知宋代是承五代混亂田制，而無所變更，並無限制過農民的耕地，當時只官田和民田兩種，說不到均田制度。五代唐代

節度使的流弊。各州軍人有財政兵馬的大權，把租稅，斬不上輸，宋太祖雖能剷除其權，但對於人民仍然加以剝削，各州縣經費金帛悉送汴都，凡各路之財，設轉運使以掌之。其後因為不斷防北蒙古民族（契丹，遼，金，元）侵襲的戰爭，弄到財政困難，苛捐雜稅，重取農民，不勝痛苦。如朱熹奏摺中所說：『細民業去稅存，不勝其苦，』謝方叔奏摺中說『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課役，官役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于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不及。』可知當時捐稅的苛重。而且貧民，也是受富豪之剝削，宋史食貨志說：『近年多稼不登，富者儲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富家索價愈急，稅關未畢，資儲罄然』宋代社會經濟的情形是如此，所以對於異族的侵陵，一因兵權的削弱，未能與之抗爭，一方因經費的艱絀，未能從事北討，對於遼金不能不以屈服忍辱為能事，因此影響於學術思想，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而提倡主空尚敬的理學。宋代文化以提倡理學為最特色，如周敦頤，（湖南永州人）稱濂溪先生，著大極圖說，明天理的根原，究萬物的終始，其學以無欲主靜為人極，是為濂學。程頤稱明道先生，灝之弟頤稱伊川先生，前者出入于釋老，後者主張以誠為本，是為洛學，張載稱橫渠先生，其學以樂天命易以為宗，主張養氣之論，是為關學。朱熹之學，以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以敬為主，是為關學。這種種學派，都是受了佛教空無之旨染了色彩，故關於利用厚生征服環境反抗自然之科學的文化精神闕然不講，宋代對於文化上所取的途已然如此，所以在北宋時王

安石主張富國強兵的政策不能行，安石制置三司條例司，在于制兼併濟貧乏，以資貸貧民，均輸法以通天下之貨，市易法以抑制豪富，保護貧民，流通金融，募役法，以納錢免役救時惠民，方田均稅法，以定稅則，凡此皆以當時廷臣之拘迂守舊而反對不克實行。宋代文化趨重性理學，故旁兼經學，如歐陽修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范鎮呂大防等，雖不專以儒著，但亦皆深於經術，宋太祖時，修佛寺，造佛像，遣僧行勤等至印度，又印行大藏經，且僧徒遊西域而歸者，亦復不少，所以印度佛教文化，大盛行於宋代，因繙譯之業盛，同時活版之術，發明於神宗時，此影響於文化之推廣甚巨，（宋宗時常所僧尼十七萬人，使西僧繙經論，真宗時，僧尼之數至四十六萬餘人之多）。

蒙古族，是突厥的一部分，爲游牧種人，世爲遼金所轄屬，正合不勒勤部長，始有汗號，金人屢伐之無功，乃與議和，傳至也速該始強，併合諸部稱成吉思汗，首滅鄰近諸族，繼則伐金滅夏，最遠則西征至俄羅斯，自成吉思汗至世祖凡八十年間，蒙古領土，東自朝鮮，西達歐洲，北自貝加爾湖，南及安南，實爲自古未有的大帝國，世祖始始滅宋朝而領有中國，蒙在地理上擁有這種優異勢力，本來可以對世界文化，有一番融合及另創一特殊的新異的文化的機會，但是蒙古民族乃是一游牧的落後民族……未能盡他創造文傳的大業，不過在蒙古統治的時期，畧爲吸收中國印度波斯歐洲的文化而已，就思肖心史大義畧序有說：『舊韃靼所居，並無屋宇，氈帳爲家，得水草則住，獸皮爲衣，無號令以合同出入，不識四時節候，以見草青爲一年，人間歲數，但以幾』

草青爲答，『可知他的文化實爲淺演。蒙古據中國而爲元朝，對於中國文化很少建樹，且可說大體上是蹂躪摧殘，殊少特殊的建樹。予在拙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大綱一書有說：『遊女真蒙古等，這些異族是游牧民族，對於中國的文化政治沒有甚麼貢獻，中國黃河流域，受這些游牧民族的侵襲，元氣太傷，至今尙不能恢復，中國歷來的文化到了元代，得不到甚麼鼓勵，仍舊循老軌道走。』（見商務版三五九頁）蒙古民是慄悍粗野的，所以當蒙古太宗滅了金國的時候，近臣別迭曾獻議道：『把漢人留着於國家，沒有甚麼好處，不如把他們完全除去了，因此這地方做我們的牧場。』幸而當時有個契丹人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面前阻止，保全各地文化事業不少，這是何緣故呢？是因元朝時民族經濟立場不同，所以對於文化的認識，就有不同了，我們從經濟政治方面看去，元朝統治中國，把人民分爲四等，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蒙古以外各部族人，名爲色目人，三等是漢人，四等是南人，對於漢人南人。（江南一帶宋朝舊民）極力壓迫，對於經濟政策，完全是一種聚斂政策，設立十路宣課司，統爲各地方徵收剝削的機關，對於一般人民，防遏得十分嚴厲，各地方派五廳官，每官可兼民政，每十家設一甲長，駐在那裏監視一切，因爲這樣在文化上發生一種重力的影響，那是凡知識階級不敢公然提倡民族的革命的文藝，而提倡娛樂的享用的戲曲小說文藝，而避去民族的誅劊啊。元代爲中國文化史可紀述的一事，是戲曲及小說的發達，元代戲曲有五百三十五本，其傑出者：於北曲則有西廂記，於南曲則有琵琶記，所描寫的

皆不外男女離合悲歡的情緒，至於小說所出頗多，有名的水滸傳，雖具俠義的豪氣，未能樹民族的精神。其他元代版圖的廣闊，海陸交通的發達，東西文化，因接觸而溝通，而阿剌伯波斯的學士軍人，與意大利法蘭西之畫家職工等，來元朝作工的頗多，馬可波羅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個，於是西方的天文算術及數學，概傳入於我國，我國的羅盤針印刷術等，在那時也傳到西方。

蒙古人侵入中國，攘奪中國的政權，在經濟上是居於征服階級剝削的地位，且以政治力量，擾亂中國社會之經濟組織，那時屯田或軍田制度中，就是以蒙古軍中之長官攘奪漢人的耕地成為屯田軍，又利用所掠佔的耕地，而實行殘酷的剝削，據廿二史劄記說：「元人初入中原時，那王公路官，多據佔民田以爲牧場，縱養牛馬。」可知元代統治時經濟剝奪之一貫政策。元代因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奪，所以沒有注意到文化的擴張，這種壓迫與剝奪的結果，會釀成遍即烽起的農民大暴動，所以由貧農起事的朱元璋，領導農民而推翻元代的統治權。中國歷史上每一次的大暴亂，都是由農業社會經濟的劇變而釀成的，每一次暴亂的結果，幾千幾百萬的農民，或因戰爭而死亡而遷徙，因此許多的區域，變成許多的荒地，在暴亂之後，據着統治權的統治者第一件要事，是注意人民經濟狀況的改善，而後談及國家文化的開展，如洪武時鄭州知州劉蘇琦上書說：「自辛卯河南起兵，天下騷然，兼以元政衰微，將帥凌暴，十年之間，耕桑變爲草莽。」顧炎武日知錄說：「明初承元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戶部郎中劉九皋的奏摺上所說：「今河北諸處，

墾得田荒，居民減少，竄徙山東山西之民往耕種。——這可以證明經濟社會變遷的趨勢。明太祖得下統治權之後，沒有注意到大多數平民經濟的改善，竟專注意政權的鞏固，鑒於宋元孤立而亡，乃擇名城大都，以封諸子，致釀成後無數次的變亂，據明史食貨志說：『洪武時，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內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可見民間田地被軍隊佔去，亦屬不少。而且明代的土地政策，將元代貴族豪強的田，及無主的田，收歸政府，皇田的租，爲皇室及政府經費的來源，管皇田的官員，常侵佔民田，所以皇田日益推廣。其後政府雖將皇田出租與人民，只是變成人民繳納稅租而已，及經宣宗孝宗兩代，始較注重農業經濟的改善，如治黃河水患，興江南水利，設置倉等是。明代經濟狀況如是。而在民族方面，是動搖民族勢力於中國之外的革命成功，是中國民族復興的一個時期，雖因經濟的情形所影響，文化，有更大的開展。亦是中國文化繼續的一個時機，如吳棫元代是中國文化衰微的時代，則明代可說是中國民族文化復興的時代，如理學分融江及河東兩派，河東派以薛瑄爲祖，注重的是格物，姚江派以王守仁爲祖，注重的是致知。就是高談心理，不受漢唐註疏的束縛。史學：宋濂的元史，柯維騷的宋史新編，薛應旂的宋元通鑑，陳邦瞻的紀事本末，文學：推朱濂劉基方孝儒李夢陽何景明歸有光等，文字學則有貝琳朱載堉等，醫學則呂復王履戴思恭等，歷算則有徐光啓李之藻等，書畫則有解縉章其昌等。明代文化比起十代自然多有振作，但比之兩漢唐宋，則覺有不及，其中制義文的教育，可說是對於中國

文化。加以阻抑。制義文的教育，時注重古典的彫琢的粉飾的排偶的文藝，專取四書五經命題，限以程朱之說，不能越出範圍，遏抑人類心思才力的發展，莫此爲甚。惟明代以航海事業的發展，歐亞交通，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人向中國通商，西方的文化開始輸入，發生巨大的影響。基督教初期來華，教士中不乏苦行力學之士，對於科學頗有新貢獻。如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以歷法傳授中國人，其他地理學機械學醫藥學也有相當的介紹，自是以後，西方文化影響於中國近代和現代的文化，可說是很大的。

明代以經濟狀況沒有改善，統治者對於農幸社會沒有維持，結果不能免於農民的困苦。國家財源的凋弊，且不能免於政府的苦苛征。明代徵稅國用未裕而人民先困，各省漏置稅使，以苛民爲爪牙，窮鄉僻壤，米鹽雞豕皆有稅。又開皇店於各省中人家，大半廢破，士民因抗稅而囚繫者不可勝紀，（據顧康伯編中國文化史三〇〇頁）。這種苛徵會引起農民集團廣大的反抗，則歷史上有名的張獻忠李自成的暴動，此大暴動的羣衆，都以貧農流氓無產階級爲主幹，其他的饑民叛卒逃卒，加以比附。據清代通史說「考流寇所由起，大約有六，曰叛卒，曰逃卒，曰驛卒，曰饑民，曰響馬，曰難民……」這純是明代社會失却調劑的緣故，因此東北新興滿洲民族，乘明室的內亂而侵入中國，掠掠遼東，殺戮漢人，開二百六十餘年異族宰割中國的局面，同時把明代復興滿漢族文化，施以蹂躪摧殘的手段，滿清入關，關於民族象徵社會風俗所繫的薙髮一事，看得很重

要。清朝以薙髮爲分別順逆的測驗，竟有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口號，因此引起漢民族的強烈反抗，如江蘇之江陰，嘉定，崑山，吳江，太湖，宜興，松江，崇明，安徽之徽州，寧國，江西之建昌，撫州，贛州等處，都奮起反抗，結果牛敗，以江陰嘉定受禍最烈，江陰城內人民之死者約九萬七千餘，城外之死者亦在七萬五千以上，滿洲民族以游牧部落沒有甚麼高尚的文化，對於漢族的鎮懾，當其時不能不用一種劇烈的武力的屠殺行爲，這給予漢族的大傷痕，爲後漢族復興光復故國的伏流。但以滿洲統治幾三百年的歲月，漢人民族精神，以受威脅日漸喪失，而稽延崛起的時候，至如此之久，不無遺憾。滿清入關後，開首就破壞中國社會經濟組織，即是縱容滿人旗人圈佔人民的田地，凡指圈之地，則滿人請進漢人則請出，初施於直隸各省，繼則凡漢人駐防之地，亦快樣橫行，農人受滿人蹂躪甚慘，且滿人圈佔各地，不從事於生產，而從事於娛樂，順治時諭戶部說，『田野小民，全賴土地養生，朕聞各處圈佔民田，以備畋獵放鷹住來下營之所，夫畋獵原爲講習武事，古人不廢，然恐妨民事，必於農隙，今乃奪其耕耨之區，斷其衣食之路，民生何以得遂。』可知當時強奪人民經濟生活的苦況。滿清對於漢民族的經濟壓迫，同時也對於漢民族的文化，加以壓迫，凡漢人之言論思想著述亦加以箝制，如康熙朝有莊廷鑑之明史獄，戴名世之文舉獄，雍正朝有李嗣廷之試題獄，陸生之梅之論史獄，謝濟世之經注獄，曾靜呂留良之文誣獄，乾隆朝有胡中藻之詩鈔獄，王賜侯之字書獄等，無非想消滅漢人對於文化創造的事工。又據

乾隆四十一年，海成奏稱：「各屬蒐買，以及民間紛呈隱燬禁書，前經共有八千餘部之多，海成撫江西巡撫，僅江西一省，禁書已至如此之多，則合他省而統計之，其多可想，按自乾隆三十九年至五十三年，禁書之有目可稽者尚不下三千種，（可參閱商務版本國文參考書卷二之上）一〇九頁」據此可知古人搜羅漢族文化的辛辣手段了。有等史家以爲清代獎勵文學，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不無功勞，如康熙時代之詔開博學鴻詞科，網羅英俊以編纂各書是也，當時經學不易折中，詩書春秋傳說，三禮疏義等，史學中皇輿圖表，御批通鑑綱目等，性理學中有性理精義，朱子參書等，文詞中有三朝詩選，古文淵鑑等，其他分類之書，官私書集成五千餘冊之多，佩文韻府，淵鑑類函，聯珠類書，分類字錦等，是皇皇大觀，但是當知清代獎勵文學及其他學問，不是推廣中國的文化，宗旨，是以消磨漢人的民族文化和文化精神爲宗旨，自清代獎勵文學之後，一代學風，遂失去顧亭林等爲實際活動而考證的精神，竟成專心學問而從事考據學，因此，遂失去創造文化的獨立精神。惟於故紙堆中撫拾文化的渣滓物以自欣賞。因爲專事考據學問，而不參加政治運動，是逃避現實的生活，不敢向現實生活不良的勢力，樹起反抗的旗幟也。以上論經濟的狀況與文化的影響，經濟原因雖是重要，但非決定文化一切的原因。

（四）現代世界物質經濟之進步與現代中國文化的影響

滿清統治中國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在此長久的歲月中，可說是中國幾千年文化，到了清朝是衰落的時期。但從另一方面看來，因為世界交通的開展，世界文化，如奔放的潮流，傾進中國，中西文化的接觸，使中國幾千年固有的文化，得有黎明復興的機會，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可以從新估定其價值。自滿人統治中國以後，以游牧淺演的文化民族，襲佔中國幾千年文化之邦，初與世交通，尚以天朝禮義之國自驕，而鄙視歐西的文化，據英使馬加特尼之記載（馬氏以乾隆五十八年，奉命使中國）云：『中國朝廷，對於新學術之發明，毫不關心，深堪詫異，常與某大臣於熱河會見。於歐洲諸種發明中，特就氣球事，謂宜備置一球於北京，且常雇便用教授者一人，某大臣非特不容余言，即同在一處諸長官，亦皆以為不然，觀中國新聞，（所言新聞係宮門鈔之類）此諸長官，皆占樞要位置者，其他尚何言乎，據初時教會報告，康熙帝頗留心化學，能繼承帝之偉大品質者，殆無其人，余今殆知中國朝廷之政畧，與自負心相關聯，彼欲凌駕諸國之上，而對於實際所見不逮，不知利用之方云云。』可知當時清廷的態度，對於歐西的文化學術，是表示排拒的。但自滿清嘉慶兩朝以後，與歐西交通頻繁，外力日日向中國推進，清廷以國勢的衰頹，外侮的衝激，遂將岸然自大，輕視他國之陋見，逐漸廓除，一方海洋大通，歐西的新思想乘時激蕩有不可遏抑之勢，一方滿清專制壓抑過甚，國民覺悟起來，知中國舊有的文化學術思想，不如歐西遠甚，表示歡迎的態度。平心思之，歐美的文化，學術思想，何以比較中國舊有的文化

及現代的文化爲進步爲優良，這是不難解釋的。因爲歐美現代的文化學術思想，是注重科學的研，是注重物質的進步，是注重經濟的發展。歐美現代的文化特質，一言以統括，就是受科學之賜，科學能改造環境，制服自然，因此在物質上，可以達到人類期望的標準，精神上，詎使人類毅然改變其舊觀念，而傾向於生活的態度，從科學的途徑走，遂造成十八世紀的大革命，十九世紀的科學時代，二十世紀新文化時代，十八世紀以來歐美種種的變動和文化的進展，可分二部觀察，（甲）由科學的基礎以革新思想，思想的革新實是促進文化進步之動機，爲近代與現代革新思想的開鑰者，以英國首出的培根（Francis Bacon）洛克（Locke）赫謨（Hume）所倡的經驗哲學，達爾文（Darwin）之進化論，斯賓塞（Admund Spencer）之功利論，彌爾（John Stuart Mill）之經濟原論，法南西孔德（Comte）所倡之經驗哲學，柏格森（Bergson）之玄學，德意志斐希特（Fichte）之認識論，亦格爾（Nagel）之辯證論，叔本華（Schopenhauer）之天才主義，美國皮爾生（C. S. Peirce）之實驗主義，詹姆士（William James）之心理學，杜威（John De Wey）之實驗邏輯，其他關於文學，有英國之莎士比亞（Shakespeare）愛迪生（Adison）斯喀脫（Scott）羅倫（Byron）施萊（Shelley）迭更斯（C. Dickens）丁尼孫（Tennyson）等。有法蘭西之盧梭（Roussenu）福祿特爾（Voltaire）胡果（Victor Hugo）大仲馬（Alexander Dumas）等。有德國哥德（Goethe）施拉（Scheler）等。關於史學，有英國之馬可萊（Macaulay）安

諾德 (Arnold) 喀萊耳 (Carly) 等。有德意志之尼拔 (Nebular) 魯登 (Luden) 等。有法蘭西之介索 (Guizot) 泰奈 (Fanie) 等。關於科學：如天文學，自家利留 (Galilles) 發明望遠鏡，促天文學之進步，一爲天王星及海王星之發現，一爲分光鏡之發明，萬有引力 (gravitation) 行星移動律 (Laws of Planetary motion) 之發現。物理化學：有物質不滅說 (Theory of Conservation of matter) 能力不滅說 (Theory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德人魯根 (Roemagen) 發明 X 光線。俄人曼節夫 (Mendeleeff) 發現化學週期律 (Periodic) 法國物理學家居里 (Pierre Curie) 與其夫人梅麗 (Marie) 發現鐳質 (Radium)。生物學有華列斯 (A. R. Wallace) 發明之細胞論 (Cell theory) 胚胎學 (Embryology) 法人拉馬克 (Lamarck) 所著之動物哲學，英人赫爾所著解剖學 (Lectures on the Elements of Comparative Anatomy) 赫格爾 (Hegel) 所著普通形態學 (General Morphology)。地理學，有德人洪勃 (Von Humboldt) 所著之宇宙論。醫學：有法人巴斯德 (Pasteur) 之人工殺菌法，電學；有伏爾達 (Volta) 之發明濕電池，阿諾德 (Ohm) 和法賴弟 (Faraday) 之發明電報，諸如此類不遑勝紀。我們知道由科學的進步，可以明瞭最大與最小，思想界因此有突飛的進步，而現代的文化同時也有突飛之進步，(科學與人生有何關係，可參考拙著人生問題一書一四六頁至一六三頁。)(二)由科學的發展，以促物質與經濟之進步，科學發展，交通機關，日益發達，交通機關的發達，可促世界物質與經濟的進步，同時可

以影響于現代的文化發展者甚大，胡適在東西文化之比較曾有說：『如與中古時代那些祭司們可以相衡，那麼加利略（Galileo）瓦特，斯提芬孫，摩孫（Morse）柏爾（Bell）愛迪生（Edison）福特等祇稱為神，而奧伯勞米修士（Peromethus）卡德馬斯（Cadmus）居於同等的地位了。他們可以代表人羣中之最神聖者，因為他們能够利用智力，創造器具，促進文化。』雖然，世界交通器具之進步，所以促進文化的效力非常之大，自一八九〇年太平洋之海底電線設立，模司發明電傳機柏爾（Alexander Bell）發明電話機，其他若無線電信雷車飛機飛艇魚雷輪船等，俱為近代科學上特別的發展以佔交通之便利，物質之進步，經濟之充裕，文化之傳播，我們看自科學發展以後世界物質經濟之狀況，就知世界文化發達的狀況了。科學進步，物質文明工具改進，工具也進一度：即是人力減省若干，效率加增幾許，十九世紀間發明家最大的努力，就是農作器械，不但省了人工而且增加生產，不但將物價降低，而且增加效率。美國自傑佛遜氏等發明機器耕犁，新哈姆省州長阿爾布祿氏，並將新式犁耙的製作法公布，美國約農業從此遂入於新時代，有人計算全美耕地，因新犁的利用，比較舊犁，每日省却三百萬工人。又打穀機之發明，比之徒手農人打穀，法國製好機器，可多二十五倍，英國製多四十一倍，美國製多七十四倍，其後利用蒸氣機為原動力，每一日一機可多出一千至七千斗。又割草機與割禾機的造成，也有助工作的敏捷，一八五五年，在巴黎附近比暨，割禾機，同割一英畝的小麥，英國機工作二十二分鐘。

英國機口作六十六分鐘，法國七十分鐘，則此一端，可分微驗近代與現代物質工具的進步，其影響於國家經濟的發展，有如何的景象。英國東南兩部，爲文化區域，西北兩部，原爲荒原，但自十九世紀機器發達，工業革新以後，遂變爲富庶之區，英國經濟的努力，遂由於東南而移於西北。其新之都市Yorkshire, Du.bysire Shike Manchester Glasgow等富庶，僅次於倫敦，英國以紡織機的發明，而紡織工業隨之發達，據一九〇三年之調查，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等處紡織工廠，共有五一，〇〇〇，〇〇〇紡紗錠，可見他紡織業的盛況。法國工業。自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的結果，法國割洛林（Lorraine）亞爾薩斯（Alsace）兩省與德，法國實業界遂大受影響，因兩區廣產煤鐵，而煤鐵爲機器工業之命脈。及歐戰結果，收回兩省，法國實業界經濟界，頓開一新紀元。德國科學發達，歐戰前工業大加革新，德國製造多屬大機器，及電物工機器，製造船事業，在柏林特產爲電氣機器，在Leipzig特產爲農藝工具。其化學工業，造藥顏料等工廠，尤爲發達。此乃根據科學上突飛進步的緣故。歐美各國科學發展，物質經濟，同時進步，國家財富，亦日益增加，至此歐美現代的文化，亦達到最高潮。中國自滿清時期與西洋交通接觸以來，初由外國挾其威力以迫脅我國家，蹂躪我人民，割地賠款。喪盡辱國之事，痛不忍言，於是改變其自饒自傲，閉關自守之見，其對於歐美物質的文明，極爲欽羨，盡量徵收，惟數千年禮義文化之邦，乃有所不足，派遣學生留學歐美，以期吸收歐美之物質文明精神文化，翻譯西文書籍，以期促進新文化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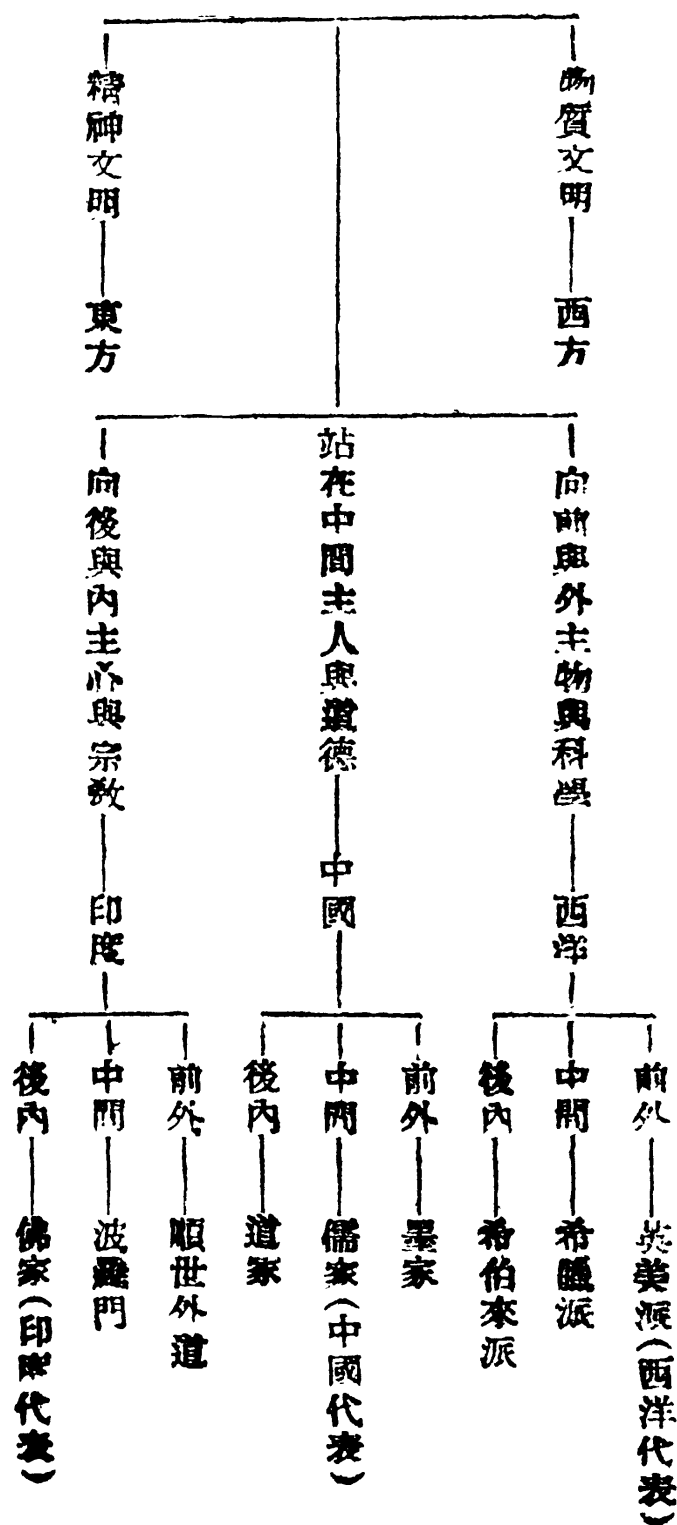
動者也日衆，這種運動發生兩種傾向：（甲）以爲中國現代的文化，已達於衰老，欲圖復興中國的文化，惟有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掃除之，對於歐美的文化盡情吸收（乙）以爲中國固有的文化，有牠的文化價值，復興中國的文化，惟有發展中國固有文化的精華與價值，補充歐美的文化，以造成世界新興的文化。滿清末年時代，對於歐美的文化，所以接受的緣故：（甲）是因國際的相交。清會典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親郡王貝勒大臣上行走，掌各國盟約，昭布朝廷德信，凡水陸出入之處，舟車馬市之制，貨幣聘娶之宜，中外疆域之限，繙譯傳達之事，民教交涉之端，王大臣率屬定議，大舉上之，小事則行，每日集公廨以治庶務，奏事日，則直朝房以待召見。」又說：「同文館管理大臣，學述五大洲之學，以佐朝廷，一聲教，考選八旗子弟，與民籍之俊秀者，配名入冊，以次傳館，設四國語言文字之館（天文化學算學格致醫學共八館）曰英文前館，曰法文前館，曰俄文前館，曰德文前館，曰英文後館，曰法文後館，曰俄文後館，曰德文後館。」郭嵩燾使西紀程說：「西洋立國自有本末，誠得其道，則相輔以致富強，由此而保千年可也。」李文忠朋僚函稿卷十七說：「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議起，鴻章瀝陳煤鐵鑛必須開挖，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應添設洋學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才。」可知當時中西文化之接觸，是由於國際上相交，以迎導其局勢。（乙）是因政局的劇變。自道光中葉至光緒末年，是政局劇變的時期，在這時期，外患衝進中國，辱國喪師，割地賠款之事，層見叠出，因此感覺到西人之所以富強，與中國之

所以奮弱，全在於兩方文化基礎的不同。優劣觀感，需往情生。（丙）是因海禁的大開。海禁大開，交通頻繁，歐風並雨，激湧而至，文化由是而迎導。歐復原強篇說：「海禁大開以還，所興者亦不少矣。譯署一也，同文館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業四也，輪船招商五也，製造六也，海軍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學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礦務十二也，電郵十三也，鐵路十四也，拉雜審之，不止一二十事。」（丁）是因變法的鼓吹。甲午以後賠款負累，中國經濟，陷於奇窮，國勢愈趨愈下，主張維新變法的人漸多，康有爲梁啓超等，在上海辦時務報，在長沙辦時務學堂，並在各處設立學會，努力鼓吹維新變法。歡迎歐美的文化，康有爲談富國之法有六：如鈔法，鐵路，機器，輪舟，開礦，鑄銀，郵政。談養民之法有四：如務農，勸工，惠商，恤衆。談治兵之法有六：如汰沉，而合營勇，起兵而立國練，練旗兵而振滿蒙，募新製以備器械，廣學堂而練將才，厚海運以威海外。又在開制度局疏中，主張立制度局以總其綱，十二局以分其事，如法律局，度支局，農局，工局，商局，鐵路局，郵政局，鹽務局，游會局，陸軍局，海軍局等，凡此的接續歐美現代的文化，主張盡量容納，以振興中國退落的文化。（戊）是因革命思想的灌輸。當清清末季，中國社會經濟現象，政治現象，已陷於奄奄一息之境，在那時候，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知道康有爲等所提倡妥協的變法主張，不足以振起國家的命運，又知道那時國民思想的頹敗，非以革命的學說，不足以復興滯迷的國魂。特提倡歐美文化的思想，革命主義，以振奮人心，自是以後

，人民喚醒。知道不但把滿清政權摧毀，同時要吸收歐美的科學文化，創造嶄新的國家，然後可以立足於世界啊。自辛亥革命成功，民國成立以後，因革命帶來之收穫，推翻了袁世凱，由是政治上的反動，封建殘餘的勢力復活，在文化上反映，而成一種復古的停頓的狀態，及帝制失敗，這復古的文化思想，漸次退落。民國六七年，新文化運動崛起，一般受了科學洗禮的人物，從思想方面，進攻舊勢力，舊思想。當時新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如胡適等，宣傳機關，是新青年新潮兩雜誌，新青年反對封建思想中心的孔教論調，反對陳腐的舊文學，提倡民主的政治思想，及科學與語體文學等。新文化運動至當時知識界的贊助，有巨大的影響，封建時代與復古的文化思想，遇到科學和民主的兩大奔潮，難以支持下去。自五四運動以後，全國青年界有很大的振奮，全國思想界，也有很大的革新。當時大小刊物，風起雲湧，不下千數百種。同時歐美各派各家的學說，不論主張積極的消極的甚麼主義，都如花卉怒放，因主張的不同而分許多的派別，如孫總理和國民黨所代表的三民主義派，以建設雜誌為宣傳機關。梁啟超等，所代表的東方文化派，以共學社時事新報農報為宣傳機關。曾琦陳啓天等所代表的國家主義派，以醒獅週報為宣傳機關。同時譯述界，如雨後春筍，且以歐美治學之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如胡適之考證紅樓夢水滸等書，梁啟超之整理古代政治思想，郭沫若之整理古代史料等。關於社會科學，也介紹歐美與新俄的許多名著。在文學小說方面，有魯迅所著的吶喊和彷徨，代表中國自然主義的創作。現代中國文學的革

新。可說是受了歐美現代文學的影響的。在現代革命文學中，對於白話文的宣傳，是有巨大的效力的。在民國紀元前有湖南的陳天華，四川的鄒容，可說能以淺顯的文字，宣洩革命的熱情，如陳氏所著猛回頭，警世鐘，中國革命史論等。鄒氏所著革命軍，是白話文學的先覺，中國現代的文化運動，與革命的文化運動，是受了歐美科學的新思潮的所影響，是無疑的。中國現代的文化特質，除却接受歐美新文化的部份來講，中國現代的文化是退步的，落後的，頹喪的，從整個的中國文化來觀察，中國文化自有牠的長處，從斷代的中國文化來觀察，中國近代與現在的文化，也有牠的長處，梁啟超於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說：『合世界史通觀之，上古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又梁氏於先秦政治思想史有說：『人類全體文化從初發育之日起，截至西曆十五六世紀以前，我國所產者，視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無遜色，雖然我國文化發展之途徑，與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趨，故如希伯來以印度人之超現世的熱烈宗教觀念，我無有也。如希臘人日耳曼人之思想的形而上學，我雖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歐戰之純粹觀的科學，我益微微不足道，然則中國存全人類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中上學術，以研究人類現世生活之原理為中心，古今學問家，皆集中精力於此方面之各問題，以今語道之，即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所句含之諸問題也。蓋無論時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嘗不歸結於此點。坐是之故，吾國人對於此方面諸問題之解答，往往有獨到之處，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吾國人獨

列世界文化展覽會之精品，特為。『中國的文化』在吾人眼中文化史應以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見長，而如歐氏一說，僅以此見長，則中國近代的文化與現代的文化，無怪比較歐美科學的文化物質的文化無落後了。抽象的形上的理論的玄微的文化，當然比不上具體的物質的實驗的理論的文化。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百科全書，漢唐時尤能振其餘緒，自宋代提倡玄想的抽象的性理學以後，競而空無。濛濛辭章考據之學，而與科學的物質的文化距離，故就中國全文化史來說，文化有所長，也有所短，蔡尚思於其所編中國學術大綱把世界三大支文化列表如左：



如上表。中國的文化是中間的文化；是以儒家爲代表，但是儒家所主張的仁義道德果能爲中國社會的文化中心麼？繁文縟禮，高談性理，外飾修飾，弄虛飾實的自私的利己的爲我的機智的社會行爲，在每一時期，雖間有節義高尙之士，以爲標榜，但很少爲社會的主幹勢力，以轉移全部的風氣。故就中國斷代的文化史來說，中國近代與現代文化的本身性質，（請參閱西洋文化接觸的文化而說）則中國的文化是下降的，是退後的，這種立說非我一人的私言，（就全部中國整個的文化來說，中國文化精神自有優長之處）胡適曾在湖南大學演講我們對新舊文化應取的途徑篇有說：『談到文化二字真令我們傷心，我國最近數百年來的文化，可說是已經失敗了無人敢於否認了！文化失敗，國家民族衰弱的狀態，也隨之表示出來：……我國的敵人，第一是國家和人民的貧窮，第二，是國人的衰頹病廢，第三是國民愚昧無智，第四，是政治腐敗與貪官污吏橫行，第五，是內亂不息，這貧病愚貪亂五者，真是我們認清的大敵，我們能解決這五個問題，甚麼敵人都可以不怕，我們的文化有不有解決這五個問題的能力呢？我可以胆大的說一句，沒有。本來我國真正的古代文化，最初的先哲的文化，是很有價值的，但因中間經過了一個麻醉時期，把固有好處失掉了，我國古代文化，如先秦文化有三大目標，就是正德利用厚生，正德是人格的修養，利用是增加人與物的效用，厚生是求人民的富裕。』在這篇演講詞裏，胡氏極反對佛教傳入中國後，提倡空無的弄人的文化，及主敬與格物致知相反的文化。他又說：『歐西文化，已成了一種世

界文化，是無法可以抵抗的，我們無論如何的反對，總不能不用他們那種物質上的創造和電光電報火車輪船等……西洋文化，並不是唯物文化，乃是高尚人的文化，只有我國晚近文化，真是唯物物的文化，是下流的文化，怎見得呢？因為我國人不能征服物質，不能克服自然，處處被物質拘束，甚至天災水旱，無法避免，惟有迷信鬼神，這種逃不了物質和自然環境的束縛的文化，不可說是唯物的文化麼？西洋文化就不然，他能充分利用人的聰明才智，征服環境，克服自然，能利用以空氣替我們行路，所有自然的物質能力，都利用作為我們的奴隸。西洋這種精神，真是止德利用厚生的聖人，……所以我們提倡西洋文化，也是恢復我們老祖宗的文化。『，中國現代的文化，除却近百年來感受歐西的文化，而改變文化的傾向和狀態以外，牠原有文化的本身特質，是值得不得頌揚的。（中國幾千年來整個的文化特質在例外），許多的著作家，對於中國現代的文化，都是如此批評着，生活週刊塞松所著中國的現狀危機和出路有說：『中國的文化雖古，然而這已成過去的了，現在所需要的，是大衆的科學的生產文化，只有這樣的文化，才能挽救中國的前途。但這些都為中國的經濟條件所否定了，古典的舊式的文化，仍然的那裏殘留着，而目前最危險的就是：（1）智識分子的沒落，這因為國民經濟的破產；政治的不上軌道，把智識分子的出路都打斷了，……我們知道智識份子，是文化的傳佈者，智識份子的沒落，也就是中國文化的沒落，飯都沒有吃的智識份子，自然談不上創造文化了。（2）玄怪文化的廣佈，在一般的下

層社會。這種玄怪文化的力量大極了，封神榜，紅蓮寺，三門街，小五義，濟公傳，孟姜女，七劍十三俠，這類的小說留傳民間，恐怕比任何中國新聞紙的銷數要多，這種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最大的，要算是義和團，而現在却還在那裏，麻醉了大多數的無知愚民，（3）性的文化的提倡，一部性史，銷了數十萬部，不知斷送了多少的健全的男男女女，然而却說這是新文化，其實這是給有閒階級作樂的低級的獸性的文化，還有人繼續的在那裏努力，這些，都是中國文化低落的象徵，而也是文化自殺的表現。」（見第八卷第一期）這可以說是露骨的徹底的批評中國現有的文化，已趨於衰落的現象。李劍農於其所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有說：「中國二十多年來的新式教育機關，除了粗製濫造，培植了一些半生不熟的新官僚政客，在政界上發生供給過剩的現象，變為釀成軍閥戰爭的酵母外，試問在社會文化實際的進步上，到底有若何的表現，出版界有幾本可以表現中國文化進步的著作，莫說科學的新發明應用，科學上已成事物的能力，到了甚麼程度，奄奄一息的招商局，所有幾艘舊輪船，還是要請外國人做船長，幣制的改革，還是要請外國人設計，甚至軍閥相互打仗打了十多年，還是要請外國人作軍事顧問。」（見太平洋書店版六四五頁），（4）梁園東於其編本國現代史有說：「中國固有的文化，因與異族接觸，而傳布於其他民族間者亦多，漢代的西域，唐代的蒙古新疆，皆因屬中國文化而為中國版圖，他如隋唐時，因與回教徒的商業來往，中國文化已波及東歐，隋唐間因征服高句麗，日本遂開始接受中國文化。但秦漢以

來中國文化的發展，只在其外延上，其性質改變之處實甚少。比方宗法制度似的家族組織，原始宗教式的崇拜祖先，與極濃厚的儒家封建道德，以及陰陽卜筮神仙方技種種觀念。無一非封建時代，或其以前的狀況，正社會生活上，除受封建勢力束縛之農業者與小商業者外，概無其他形態。即如工業在近代歐洲，早已爲主要生活，然中國幾千年來，不惟沒有偉大之工業組織，而除裝飾品工業外，即連生活必需品製造如紡織等，亦向來附屬於農業生活者；因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工業文化的成分，由農業裝飾品工業者及商業者所結合的組織，與其所享受之生活狀況及其所需要之知識，即構成中國文化的本體。」（見世界書局版第十九頁）印度泰谷兒於東西文明之比較觀的談話有說：「我們亞洲文明，可分兩派，東亞洲中國印度日本爲一派，西亞洲波斯，阿拉伯等爲一派，今但說東亞洲，中國印度的哲學，雖極小異，而大同之處很多。西洋文明所以盛者，因爲他，精力是集中的……我東方諸國如一般散沙，不互相研究，不互相團結，所以東方文明，一天衰敗一天了。」（見新潮第三卷第一號），從以上的引證，我知道中國現代文化，從不良的方面看去，自然有許多不滿人意的，有許多是與歐西文化不能比較的。但中國自海通以來，感覺自己文化的落後，受歐西文化的影響，倘努力科學的物質的文化，從革命的立場促文化的進步，將來中國的文化，自在東西匯流上，有許多的改進，這是可以相信的。

（九）現代中國經濟之地位與現代中國文化的影響

一國之經濟地位，與一國的文化進程，有密切的關係，重大的影響的，可說一國的經濟進步，文化必隨而進步，一國的經濟落後，文化必隨之而落後，德國 F. Muller-Jones 於其所著社會進化史云：『無論如何，唯物史論包涵一個大真理，植物賴其所生地的肥料而生長，繁植開發，同道理，可知食物根源的擴張（如由農業），生產方法的進步，（如因資本主義的制度），工藝上的文明，（如鐵路省勞動的器等等），對於文化發達發生的影響，遠勝於道德教訓宣講書畫藝術品哲學系統，但是這個理論，也不可極端的應用，以為經濟為文化唯一的原動力，因為進步非出自一隅。在文化任何方面的新成就，均足以引起其他方面之進步。因為一切文化現象，內部互相聯結，都有相即不離的交互作用關係，但就一切社會學的現象看起來，經濟確是大有影響於文化發達的。』（見商務譯本二七八頁）予在拙著人生問題一書二七六頁經濟演進與人生概念篇有說：『人生與經濟有密切之關係，每對於經濟之行爲而表現其二種之動作，一則發見，將地球上自然界的物質，可以供人類使用之便利者，而發見之以利濟人類。二則創作，將自然界所供給之物質改換之，變更之，製造之，以求得較方便之使用，較普及之效果。今試溯人類狩獵及漁獵時代，狩獵不能不求弓矢，漁捕不能不求網罟，人類何以不用手足之制縛而獨取於弓矢網罟，則因弓矢網罟器

用之行使較爲利益，較爲經濟也，以此之故，人生經濟之行爲上有不絕之動作，則有不絕之創作與發明。人類之經濟行爲與文化的創作，有重大的關係，我們從中國現代的經濟地位以論及中國現代文化的趨勢所受的影響，尤可以證明這個定例。文化發達，有時可以促進經濟的發達，經濟發達，有時可以促進文化的發達，在另一方面說，經濟的地位降下了衰落了。文化也必同時而降下衰落。我們要從實現中國的經濟地位觀察，就可知道中國現代的文化地位，在表面上經過幾年來的革新，對於吸收歐美文化，不論精神方面，物質方面，科學方面，教育方面，有多少的進步？在文化的新壘上，可說點綴有多少的彩色？但是要深入我們中國的社會觀察，經濟地位的狀況，與人民生活的形態，就知道中國現代文化，有趨於降下的朕兆，不可不預爲補救了。中國是農業的國家，中國的原有文化，是農業的手工業的文化，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就是中國現代文化將降下的預伏危機，中國農村，破產的原因，可以分數方面來觀察：（甲）列強的環攻，帝國主義利用不平等條約以壓迫中國的社會經濟與農村經濟，自南京條約成立，沿海各省，開闢商埠，遂根據商埠爲搖撼中國經濟的大本營，從一八四〇年開始，英國紗棉織物猛進輸入，一八五一年棉紗磅進口爲四三〇，〇〇〇，至一八九〇年，增至一，四七〇，〇〇〇，一八五一年，棉布磅一一，四九〇，〇〇〇，至一八九〇年，增至五七，〇二〇，〇〇〇，這種增進數，無疑的是給中國農民莫大的打擊。壓迫農民不得不放棄植棉及紡織工藝，自關稅權爲外人限制後，外貨對

中國源源增加，自一八八四年起，輸入超過輸出五萬餘兩，至一九一四年輸入過至二萬四千餘萬兩，試就出入口貨品種類比較，如一九二一年，飲食物及煙草輸入，超過輸出三千餘萬兩，製造品超入，超過輸出三萬七千餘萬兩，一九二四年出入口貨品價額比較，棉貨類出口二千餘萬兩，入口一萬八千餘萬兩，鐵及鐵製品出口十餘萬兩，入口三千餘萬兩，煤油出口無，入口五千餘萬兩，米出口二十餘萬兩，入口六千餘萬兩，麥及麵粉出口一百餘萬兩，入口四千餘萬兩，糖出口一百餘萬兩，入口七千餘萬兩（可參閱嶺南大學版拙著孫先生之思想及其主義從經濟方面看去一節八十九頁），從上表在糖食一項，一年之入已達二萬萬以上。中國是以農業立國的，而糖食一項，要靠外國接濟，年年有增加之勢，據中國銀行二十年度營業報告，二十年度中國的國際貿易入超五萬四千餘萬兩，合洋約八萬一千餘萬元，入口貨中佔大宗的是農產，這就是表示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實錄。其他列強工業資本的輸入，在通商口岸中，工廠林立，使中國原有手工業日益破產，間接影響於農村的經濟，又外人金融資本的侵入，在華之匯豐，麥加利，東方匯理，花旗，正金，台灣，朝鮮，華北，有利，美豐等銀行，成爲剝削中國困苦農民的吸血鬼，間接陷中國農村於凋敝的情景。（乙）自然的壓迫。中國農村受水災旱災之苦，而農民戶口日見減少，民國三年，農戶數爲五千九百四十萬二千三百一十五戶，民國八年農商部統計的戶數，爲二千九百五十四萬八千五百二十九戶，相差如此之遠。根據民國十九年賑務委員會派員所調查各省的受災概況

，計全國被災之縣，共計八百三十一縣，災民總數四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五人。在一九二八一二九年的大旱災中，被災人數，達九千四百萬，據主計處的統計，被災八省中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湖北湖南江西浙江，被災農戶，統數八百五十七萬九千戶，可見受災之廣了。（丙）政治的剝削。官僚軍閥，用政治的手腕，剝削農民，苛捐納稅，勒索綁票，無所不至，加以政治不良，兵匪騷擾，秩序破壞，交通阻礙，鵠犬不甯，農民多向城市廢棄，鄉中人口漸減少，而農業日益頹廢。（丁）生產的遞減。中國農村生產年年減少，這種情形是中國的隱憂。據農商部統計，在一九一四年，全國米的收穫量，共計一億二，一三三，四八三，〇〇〇石，至一九二〇年時減到八八，七六三，〇〇〇石，六年之間，收穫遞減到二十四分之一，全國所產的糧食，不足供半數人口的消費，一有天災，隨處可以發生糧食恐慌。孫中山十年前曾說過：『中國現在的痛苦，每日生活，至少有三萬萬人朝不保夕，吃了早飯愁晚飯。』像這樣的情形，有甚麼方法，可以保持過去中國的文化，不隨現在經濟不良的狀況而衰頹呢？有甚麼方法可以避免現在不良的經濟地位，而復興中國現代的文化呢？在希臘歷史中，以經濟中心的地方即為文學技藝的中心，意大利古時文明極盛於弗尼基，雅典亞，羅馬連斯等處，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以中國現在農村經濟窮困，商業不振的狀況，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是不可不注重經濟的條件啊。

第二章 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

中國有幾千年文化的國家，是有悠遠歷史的國家，比之古代巴比倫埃及墨西哥希臘羅馬等國的文化，未嘗有遜色。在某一時期，甚或有過之無不及。民族主義第四講有說：『中國的文化，比歐洲早幾千年，歐洲文化最好的時代，是希臘羅馬，到了羅馬最盛，羅馬不過與中國的漢朝同時，那個時候，中國的政治思想便很高深』可見中國上古時代文化的創造，在世界佔有相當的位置。各國有各國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印度民族，有印度民族的文化，拉丁民族，有拉丁民族的文化，日本民族，有日本的民族文化，中國民族，有中國民族的文化。就文化的進度說，各有高下的不同；就文化的性質說，各有優劣的分別。予人地著人生問題一書文化演進與人生概念篇有說『文化之起原，有關於民族之質性者，民族的質性，有剛柔強弱溫文冒險勤惰忠實詐偽之不同，由民族質性之不同，而發見其文化起原之有異。中國之文化，印度之文化，歐洲之文化，各有不同一點，由於起原有不同之點。其起原有不同之點，由於其民族性有不同之點。譬如西方民族有冒險活動尚戰之民族性，其文化則帶有此民族性之色采：（堅甲利兵戰船飛艇及其侵略殖民地之義）印之民族性，有容忍寬厚冥想尚虛之民族性，其文化亦帶有此民族性之色采。（見是書四四五頁），德國克斯你林（Herrmann Kesseling）以為拉丁民族的文化，並不是其老舊的

文化，德意志民族的文化，把理想放在國家的特殊的方面去努力，不以普通人類的方面去開展，在普通一般人民的心理上看來，只能產生不良的結果。他以為印度民族的文化，帶有古代婆羅門教精神的形而上學，由此精神以貫徹現象界後面的宇宙的靈魂的實現，與歐洲人認識的路向經驗的習慣是不同的。日本自己雖沒有甚麼偉大的文化，但印度的佛教文化，和中國的儒家文化，日本吸收之，以其古代的武士生活綜合而成一種日本的文化，這種文化有許多地方，亦是歐洲人所不及的。一可參閱文化與文明一書引證大意）。我以為各國民族有其創造不同的文化。這種不同的文化，幾千年來成為歷史的陶冶薰染，深入於民族的心靈，而常可以激起民族的情緒的。法國民族受馬丁（Henri Martins）的法蘭西史及地亞雷（Thierry）米西列（Michlet）的著作所激動的情緒者甚多。意大利民族統一以前，波打（Botta）的意大利史，激動其興奮。羅馬尼亞民族國家的產生，森波爾（Alexander Xenopol）羅馬尼亞史給予極大的刺激力。中國民族之革命運動，受歷史上名賢著作，激動他夷夏之辨。民族意識之遺留者亦甚大。可見民族在歷史上文化的創造，其所給予後世的影響固具有偉大的勢力的。中國民族，在歷史上每經一次的劇變，都仍能奮起興廢繼絕，這也是受歷史文化所影響。西晉之末，五胡十六國之亂，豈非中國民族與外來民族受了亡國慘痛的時期麼？然經此劇變，民族終能奮起而成統一的大業。清代末年，豈不是中國民族受了因迫壓抑的時期麼？然經此劇變，終能成中國之革命運動。一個民族復興運動，由於歷史

文化的陶冶薰染，深入於民族的心靈而後可以成爲偉業，否則民族對於歷史文化，沒有甚麼的觀感，而他的民族，對於有復興運動，他沒有甚麼發奮，這是歷史必然趨勢，征服的民族，對於被征服的民族，往往以民族文化的權威、消滅他民族的文化特徵，使失却民族的感覺性，期望不久與之融合。當德國畧取亞爾薩司羅蘭時，在小學校中，禁止教習法語，在社會上禁止法報之發行，禁止法國的服飾，禁止法國遊歷者入境，戰後法國收回兩省，也採同一的手段對付德人。德國對待波蘭人，在公共集會的時候，禁止使用波蘭語，以德語爲小學校語言，羅馬尼亞人，在道白羅茶的地方 (Dobruja) 地方，雖佔人口僅四分之一，然羅馬尼亞政府竟封閉二百以上的保加利亞學校，而採羅馬尼亞化的政策。俄羅斯對於波羅的省波蘭及高加索等地也採取俄羅斯化的政策。世界優強的民族常欲以其所誇示的文化，支配弱小的民族，弱小民族雖有他固有的文化，必要把他的文化，消滅而後甘心，中國固有的文化，在幾千年來，有他相當的位置，牠的文化，今後能否繼續保存，在於今後中國民族能否復興爲其基本條件（見暨南大學版拙著中國文化復興之基本問題一書）。尙使中國民族能够復興起來，必能將中國幾千年來固有的文化發揚光大，將他特殊的文化與世界各國的文化，行相見握手禮，或水乳交融，產生新異的文化。人類學家泰裏 (Tylor) 在初民文化裏 (Primitive Culture) 說及：『文化是一種複雜體，包括智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餘從社會學上學得的能力與習慣。』無論那一個民族，從民族的精神生活裏、

表見他的智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能力習慣，此等智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能力習慣，就知這那個民族所表彰的文化是甚麼樣，這表彰的文化在他縣延的歷史上，而所以固結民族的意識和思想的。孫中山先生有說過：「觀中國歷史上之所示，則知中國之民族有獨立之性質與能力，其與他民族相遇，或和平而相安，或狎習而為之同化，其在政治不修及軍事廢弛之時，雖不免暫受他民族之蹂躪與宰制，然卒能與力勝之，觀於蒙古宰制中國，垂一百年，明太祖終能率天下豪傑之士以光復故國，則知滿洲之宰制中國，中國終能驅除之，蓋民族思想，實吾先民之遺習，初無待於外鑠者也。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習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滿洲不以復仇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和國內之諸民族也。對於世界各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其與諸民族並屬於世界，以副至大同」。〔見中國革命史〕，我們知道，一個民族能够生存於世界，在他的民族的性質能力有優異之點，不為其他民族所屈服；在他的文化有特殊之貢獻，不致為其他的民族的文化所同化。中國文化在有文字記載以來，已有幾千年的文化歷史，這幾千年來文化歷史，能否繼續以存，是在於中國民族能否有生存於世界的充分能力以為斷。倘使民族的能力墮落了，文化必從而墮落；倘使民族的文化退化了，而民族必從而退化。這是歷史上文化上必然的定律。

（一）中國民族的起源及其移殖

中國民族，立國於東亞大地，生殖之數，達四萬萬，爲世界之冠，此偉大的民族，在歷史上其他光榮的時代，爲永恆子孫的謳歌；但此偉大的民族，是何處來的，是一個疑問？一因研究歷史，要依據文字，我們今日所認識的文字，僅能及於商周時代，所讀的書，大抵周秦以來之書，周秦時代去太古不知若干萬年，周秦時代，相傳的舊說，不能盡信爲正確的史料。一因研究未有文字以前的歷史，必根據有文字以前的器物爲證，近代東西學者，研究中國發見的石器，多不能定其時代，且古器沉沒，僅從浮土中，畧得數事，不足據爲信史。列子楊朱篇有說：「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世，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皇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大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二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可見太古未有文字以前，許多的歷史事實，皆屬渺茫，難以推測。據王伯禎本國史參考書第一編 根據日本某學者的主張，以逸周記所稱赫古士於大荒，山海經所稱少昊之國，在東海之外，其母方節生少昊於華胥，遂斷定中國民族是從茫茫大海之島上來的。西方學者如德的基爾什爾，沙蘭的波因謨，法國的胡愛，英國的菲伯敦等，根據文字斷定中國人是從埃及來的。法國的波耶諾說：「中國

是從印度來的；」法國的巴伊說：「中國文化，是皇古原有民族之殘餘文化，中國人，當是皇古原有民族之殘餘人種；」且有說來自中央亞細亞，或來自阿富汗，或來自于闐，或來自馬來半島。衆說紛紜，莫衷一是，而以法人拉古柏里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論較為可信。（Terrien Lacouperie -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拉氏引據亞洲西方古文證中西事物法制之多同，而彼處亦有民族東遷之事；中國學者如劉光漢之華夏篇，思故國篇，黃節之立國篇，章太炎之種姓篇，蔣觀雲之中國人種考，及日人所著之興國史譚，均以中國人種西來之說為信據。丁謙中國人種從來考有說：「西亞古史，中國人種為丟那尼安族，其族分二派，一思米爾，一阿加迷，皆起於亞洲中境。思米爾人(Sumirians)先入美索波達米南境，建立加勒底國，阿加迷人(Akkadians)後至沙蛟山麓，建都城於蘇薩，稱爾南國，其王廓特奈亨登，兼併加勒底諸部，既乃率其種人遷入中華，謂即黃帝，以此王時代在西紀元前二千二百八十年間也；但其說不確，因此年數，即彼土亦不衷一，或謂在二十四世紀至二十七世紀，據竹書所紀之年，上推黃帝，為二千六百二十年，與第一說不相應，但亦無實證，不足為憑。」考查歷史在黃帝的時期，已然利用軍力，從黃河流域把勢力擴張，征服四方的酋長，建成統一的國家，接續有許多的文化成績（如衣裳宮室貨幣蠶桑井田等）可知在黃帝東遷的來源地，必有文化的承接，而後可以繼續發展，查思米爾人，阿加迷人。根據中央亞細亞美索波達米亞等地，已有建立帝國的能力，交通技術的發明。

黃帝東來，承接其餘緒，是有可能的，不能說絕不足憑據。陳漢章中國通史說：『近今一般社說，並謂中國黃種皆黃帝子孫，而黃帝實由西北遷徙而來，按法人拉克伯里說，以奈亨臺爲丟那尼安種，非塞米的種，與黃種合矣；底格里士河（Tigris）邊地，與幼發拉的河（Euphrates）側地，並即加勒底（Chaldean）古國，而裏海西岸之巴克，並其統領迦勒底國之地，當時實爲波斯巴撒迦特族人所居，若率巴克民族東來，則東來者，仍是白種，非黃種，且紀元前二千八百八十二年，當中國顓頊帝之二十二年，猶得以底格里士河邊之酋長，由土耳其斯坦來中國者爲黃帝乎』。陳漢章之說，則不承認黃帝有向東來之事。據丁謙中國人種從來考說：『西史謂徙中國者爲巴克民族，巴克乃盤古轉音，中國人謂盤古氏開闢天地，未免失實，盤古氏之爲中國始祖遷祖，則固確有可考矣。』中國民族主要部分爲漢族，漢族由西北徙遷而來，已成歷史之確定事實。據王桐齡著中國民族史有說：『中國民族起原地，大概在蔥嶺一帶，即亞洲中部的山脊，西洋書上稱帕米爾高原……現在世界人類祖宗，從帕米爾高原分道下山，遷到平原，往西遷的，大半移到中央亞細亞、阿富汗，俾路芝、波斯，美索波達米亞，小亞細亞，阿剌比亞，及歐洲等地，後來成爲白色人種。往東遷的，移到新疆、青海，西藏，蒙古，滿洲，朝鮮，及中國內地。黃色人種，下了帕米爾高原以後，便分道往東南東北兩方面進行，往東南方面進行的有三族，歷史家稱之爲東三系，往東北方而進行的，亦有三族，歷史家稱爲北三系：南三系中第一族，遷到中國中部南部；

——即揚子江流域七省西江流域五省——同印度支那半島——即安南暹羅——等地，歷史稱之爲交趾支那民族。現在四川南部之獠，貴州之苗，廣西湖南之獠，雲南之獠，廣東之蠻，同暹羅越南境內之土人，皆屬於此族。因中國唐虞時代，此族曾創立過大國與漢對抗，國名三苗。所以後人就稱之爲苗族。第二族遷到中國北部，就是黃河流域六省，因爲此族在中國中古時曾代則立過大一統之帝國，國名爲漢，後人就稱此族爲漢族，第三遷到青海，西藏，歷史家稱之圖伯特族（Tibet）；因此此族大多數住在西藏，所以現在就稱之爲藏族。北三系中第一系遷到中國東北方，歷史家稱之爲通古斯族（Tungus），因爲此族大多數住在滿洲，所以現在就稱之爲滿族。第二系搬到中國正北地方，在中國近古時代，曾創立蒙古大帝國，所以後人就稱之爲蒙古族（Mongol）。第三系遷到中國西北地方，即阿爾泰山系以東以西等地，歷史家稱爲突厥族（Turk）因爲此族大多數奉回教，所以現在就稱之爲回族。」依王桐齡所引證，中國民族的起源由帕米爾高原東向移植，非索來根據中國江河流域以爲繁殖的。考之吾國古史三皇史事，雖不可信，然三皇是往古時代的民族首領，是可信的。古代諸部落興於山嶺者多，而起於河流者少；如天皇起於柱州崑崙山，地皇起於熊耳龍門山，人皇起於刑馬山出陽谷分九河之類。實中國民族先居山嶺後移向河流之證，孟子得乎丘民爲天子，禹貢有降丘宅土之文，可知上古人民多居山丘，爾雅：「林，蕪，君也。」古代部落，其酋長多居山林，後世譯古代林蕪之名爲君主，尙書有四嶽之名，可知古代

諸侯多居山嶽。據張國仁著世界文化史大綱第五章東方文化的起源引證有說：『漢族，爲世界三大支源黃色人種中的主族，亦起源於古地中海盆地之東畔，小亞細亞一帶，與巴比崙及色馬人有若干之淵源，其移經裏海之南與都庫士山以北而至蔥嶺，即古代之所謂崑崙，漢族游牧於此一帶森林草野及山嶽之地，不知經若干年，分爲若干部，或依據森林，則其領袖謂之林蒸，或據山嶽，則其首領號稱爲嶽，其後越蔥嶺，遶河源東下，故漢族游牧於塔里木河一帶盆地，又不知經若干歲月，然後才到了真正的黃河流域。』又據韋休編中國史話有說：『古書上載中國人民古代祭祀所供的神，有崑崙之神，或者崑崙地方，就是漢族人的老家了，崑崙在那兒呢？考據下來，就在現今新疆省西北一帶高原上，這一帶高原，據人種學家的意見，以爲世界各大民族的老家，所以研究中國歷史的人，也大都以爲我們漢族人，是從這一帶高原，經由現今的新疆甘肅兩省地方，遶黃河流域來的。』從上各說引證而論，漢族（漢族這名稱，不是中國民族的本名，古代稱華夏，漢本是朝代的名，因漢朝時民族勢力很強盛，就移作民族的名稱），是從西方東遷移而殖於黃河流域的。究之，尙待實地的考證而後可信。

（二）民族的化合與文化的影響

中國民族以漢族爲主幹，是就移殖領土之廣，人口之多，傳世之久，文化程度之高下言之。

我國上古民族之名爲夏，見於唐虞時。劉賈楠愈愚錄說：「蠻夷猾夏。此夏史所記，夏者禹有天下之號，」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從夊，從頁，從白，白兩手，夊兩足也，會意古文夏。段注：中國之人，謂以別於北方狄，東方貉，南方蠻，閩，西羌，西方南焦僥，東方夷也。」其後中華民族，復有華稱，章太炎釋中華民國謂華取華山，夏取夏水，中華民國解說：「諸華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爲言，世言崑崙爲華國者，特以他事比擬得之；中國前皇曾都崑崙與否，史無明徵，不足引以爲質。然神農之胃，自西方來，以雍梁二州爲根本，伏羲生成紀，神農產姜水，黃帝宅橋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陽起於若水，舜居西城（據世本西城爲漢漢中郡）禹生石紐，是皆梁州之地，觀其帝王所產，而民族奧區，斯爲根極。雍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之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起如此也；其後人跡所至，遍及九州，至於秦漢則朝鮮越南，皆爲華民耕稼之鄉，華之名于是始廣，……建漢名以爲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爲國，而種族之義亦在。」依上說而觀，中國主要的民族漢族，是初居於中原，而後分布於各方，漢族成爲中國的主要民族，及其移殖于各方與各種的民族化合，與文化的擴大，有巨大的影響。中國幾千年來因民族不斷的化合，中國民族的本質，已非初由西方移殖來時的本質；中國文化的本質，也非初由西方移殖來時的木質，換句話說：漢族已參雜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中如飲食居住建築風俗習慣法制等的文化本質，也因民族的參雜而發生重大的變化，這是可

以相信的。當四千年前，漢族佔了黃河流域，由游牧的部落，進爲農業的安居，當其逐漸向四方發展之時，楊子江兩岸如現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已經有苗族的佔領，此族國名爲九黎，君主名蚩尤，當時同漢族共主炎帝榆罔氏大起戰爭，進逐炎帝至直隸口北道涿鹿縣，黃河流域幾乎陷落；幸漢族有黃帝者，統率部族迎擊蚩尤，把他打敗，於後經畧四方，漢族勢力逐漸擴大，至虞舜夏禹時代，始把苗族招降，同時苗族具有的文化如刑法兵器甲冑宗教，漢族遂因襲之。苗族子孫有一部分同化于漢族，其不肯同化者，至雲南貴州廣西湖南等深山中，近代以來與漢民族日益接觸，文化蒸蒸日上。漢族移殖黃河兩岸，爲當時政治文化之中心地，如黃帝死後，廟位黃帝金天氏，立都曲阜（即今山東曲阜縣），高陽氏立都帝邱（今直隸大名道濮陽縣），高辛氏立都亳（今河南洛道偃師縣），唐虞立都平陽（今山西河東道平陽縣），虞舜立都蒲坂（今山西河東道永濟縣），夏禹立都安邑（今山西河東道夏縣），此後傳十七王四百三十九年，爲商湯所滅，商湯立都亳邑（今河南開封道商邱縣），傳二十八王六百四十四年，爲武王所滅，夏商二代，雖時常遷都，總不離河南中部北部一帶。在夏商時代，社會組織漸次完備，中國文化大爲發展，至周代更爲完備，因此乃遂向各方的異族征伐，或同化之，不然則自己漢族本身，也有很大的危險。我們知道周代勃興憑藉陝西渭水流域爲根據地，傳了十二王三百五十一年，爲西藏族之犬戎所滅，嗣君周平王棄陝西遷都洛邑，將陝西舊地封當時西方小諸侯秦襄公，秦襄公同其子文公，與犬戎血

戰二十年，然後擊退戎兵，建立秦國，以後逐漸在陝甘方面擴張勢力，併戎人之部落甚多，傳至三十一代之嗣君政，遂統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之大國家。中國上古之時，對於異族，先後征討，繼以政治的力量鎮壓之威脅之，而後逐漸同化之，如史稱黃帝登州分野，得百里之西萬區，命斥營國邑，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其設監萬里，所以防背叛的異族；又如武王率周伐殷，將、劉、羌、黎、微、盧、彭、濮、諸民族皆相率以從，而天下大定之後，立國七十一，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十四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其餘以疏遠而得封者，非同種之功臣，即異朝之舊裔，而以上八族人，未聞有尺寸之加封，這因爲鞏固自己的部族，不能不給予優越的政治權力，而後可對他族加以鎮壓威脅，逐漸同化。齊堯典說：「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黎民是當時的異族，必待萬邦的協和，而後於變，此是由於種族意見的立場。在春秋戰國時代，東夷一族，在淮河流域，時常與漢族諸小國起衝突，經過春秋戰國數百年，齊國勢力，包括山東半島，楚國勢力亦擴至淮南淮北，東夷始完全同化爲漢族。南方民族一支在中國東南方，佔領現在江蘇安徽南部之楊子江南岸，與浙江寧波錢塘江流域，史書稱爲吳越，此二國在江浙一帶休養生息數百年，併吞江南各小部落，漸成大國，至春秋末年，與晉楚爭霸于中原，後吳滅于越，越併于楚，楚又滅于秦，此支民族始完全歸併於漢族。一支爲荆舒，佔領中國南方、荆人之介佈地在湖北，舒人之分布地在安徽中部，其地

爲苗族舊領土，與苗族有血緣的關係。荆六一支有一楚國，佔領湖北一大部分，與齊晉諸國，爭霸于中原。（稱其先人鬻熊曾爲周文王師）、凡百舉措、摹倣漢族、後同化於漢族。及楚彙併舒人領土，而安徽江北一帶之民族，遂完全同化於漢族。一支爲羣蠻，分布于南方各地，即現在湖南廣西貴州雲南等省。一支爲閩，分布現在之福建，蠻閩與苗族近，可以推測與苗族血緣相近，漢武帝時，閩越，徙閩族于江淮間，與漢族雜居，南北朝時，漢族南遷福建，閩族逐漸同化於漢族。一支爲甌越，佔領浙江中部之甌江流域，漢武帝時，閩越擊甌越，甌越徙衆于江淮之間，晉室南遷以後，逐漸在甌越地移殖，甌越民族，逐漸同化於漢族。一支爲南越，佔領現在廣東廣西等地，屬於苗族血統，漢武帝滅南越，在此地分設九郡，其一部分土人于江淮之間，逐漸移漢族雜居其地，久之遂同化於漢族。西方民族戎，一支爲蜀，佔領中國西南邊，即現在四川西部，戰國時代，秦惠王遣司馬錯將兵攻蜀，始全併於中國，後經西漢三國，遂同化於漢族。一支爲巴，分布於四川東部巴江嘉陵江沿岸，曾與漢族起衝突，光武帝遣劉尚擊敗之後，逐漸同化於漢族。一支爲廐，分布於湖北西北部漢江流域，春秋時與楚爲敵，後同化於楚國，爲漢族一部分。一支爲西戎，屬西藏族，即氏羌，其根據地在現在青海西藏往東，分到甘肅川邊及陝西四川兩省西境，此族與漢發生交涉頗早，商頤上說：『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可知在商時已內附，在西周中葉以後，常與漢族起衝突，在西周晚年，

追泆族、共主之周平王東遷洛陽，幸而秦襄公文公將戎人擊退後，經過春秋戰國數百年，陝甘一帶之戎，逐漸同化爲漢族，惟青海西藏一帶之戎，離中國太遠，至今不能同化。北方民族滿洲方面爲通古斯族，在蒙古方面，爲蒙古族，此族大部落爲獯鬻獯狁，在北方時爲猃狁族，齊桓公時，管仲以尊王攘夷名義，號召山東淮北河南河北諸侯以抗狄，並救燕以攻滅山戎；晉多英主，屢次出兵蠶食狄人卽土，至戰國末年，萬里長城以南之狄人，全數同化於漢族。秦始皇統一宇內，以武力征服異族，其去外政策，大抵對南方民族採用進取的手段，對北方民族，採用保守的手段，萬里長城之築，就是這種用意。漢代匈奴入寇中國，時爲邊患，搶掠財帛婦女，武帝用遠交近攻之政策，聯絡匈奴仇人大月氏，民國紀元前一千零三十八年，使衛青霍去病遠征，復與西域交通，納渾邪王降，關河西四郡（酒泉之武威敦煌張掖），與西域王烏孫夾擊匈奴，匈奴自是遂斷。武帝將匈奴降人，分住甘肅陝西等部，東漢初年，匈奴又有內亂，分爲南北二部，南匈奴單于投降中國。漢計度遼營于五原，（現綏遠省五原縣），監視南匈奴；章帝末年，北匈奴衰弱，和帝初年，派竇憲出征，大破北匈奴，自此以後，匈奴主力漸向西方遷移，後到歐洲，爲匈奴牙利人的祖先。南匈奴移到黃河套內，與漢族雜居，休養生息數百年，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是爲西晉末年五湖亂華的禍首劉淵之祖。查漢晉兩代，異族雜居中國，如匈奴雜居地，大抵在現在綏遠山西陝西及甘肅北部；烏桓雜居地，大抵在現在熱河奉天；鮮卑雜居地，初

在察哈爾京兆直隸山西甘肅西鄙與青海，後則遍於黃河流域全境；氏羌雜居地，大抵在陝西甘肅及四川；巴氏雜居地，在陝甘南部與四川中部北部。西晉之末，五湖亂華，塞外種族，所殺晉人不下數十萬人，所謂永嘉之亂。永嘉之亂，中州士女避亂南遷者十居六七。憑藉揚子江流域，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爲根據地，北抗五湖，南抗蠻獠，其結果則舊日苗人巢穴之揚子江中流下流流域同化於漢族之文化，其勢力範圍擴張西江閩江流域，廣東廣西福建等省內，漢族戶口繁盛，文化亦同時進步。南北朝之疆土，以秦嶺與淮水爲分界，當時中國之大都會，北推洛陽，南推建康（即南京），南朝國勢以梁武時爲最盛，京師人口達一百四十萬，北方自異族佔據以後，壘攘幾及百年，然雜居已久，異族爲中國文化所征服，漸與漢人相同化。後魏拓跋氏，本東胡族鮮卑之裔，至孝文帝時，其國都由平城（今山西大同），遷至洛陽，汲汲同化於華夏，禁其國人胡服胡語，又改其姓氏爲元氏，與漢族通婚姻，漢胡混雜，不可復辨。至隋代勃興，南北統一，稽濠混血族之烏桓鮮卑，蒙滿混血族之匈奴，藏族之氐羌，藏苗混血族之巴氏，皆純一於隋代勢力範圍之下，化爲漢族新分子，於是自秦漢以後，因安富尊榮漸形衰老之漢族，經過五胡十六國之屠劫，加入許多新分子而復活，隋唐時代之文治武功，乃蒸蒸日上，蓋五胡十六國時代，異族所以同化漢族之故，有五種原因：（一）因雜居已久，習於中國之政教；（二）以中國向來文化淵源長遠，根深蒂固；（三）因異族文化低下，對於中國漢族素所信仰，故意吸受；（四）因異族割據

，仍多印漢人爲政（如石勒之張寶持璽之王猛等）。（五）因異族的領袖多領導部下，傾向中國文化，（唐史稱石勒硯珽裴襲冠帶釋介冒同庠序），隋唐兩代，突厥新興，變爲強族，疆土佔據現在蒙古新疆滿洲和西伯利亞中亞細亞一帶之地，分爲二大部落，一曰月氏，一曰烏孫，南北朝末年，建立極大之遊牧帝國，南而侵入中國，隋代建國日淺，對於突厥始終取綏懷政策，唐代興起，始採積極政策，太宗高宗二代，先後滅東西兩突厥，併其領土、融合其民族，於是漢族中始有突厥民族血統之加入。高麗在朝鮮半島北部，百濟在半島西南部，隋代文帝煬帝時，曾三次大舉兵攻伐高麗，皆無功而還，隋亡唐興，高麗百濟新羅，先後遣使入朝受封冊，其後雜居中國內地者，漸與漢族同化。（唐中宗時之黑齒常係薛濟人，玄宗時之高仙芝，王思禮，係高麗人，均唐代名將）。吐蕃本圖伯特族，唐室西境與吐蕃相接，隋唐之交，其國頗強，太宗時以公主妻其君主，又遣諸豪子弟，留學中國，其後在中國之吐蕃遺民，漸次同化於漢族。契丹居鮮卑舊地，東接高麗，西接奚，南接中國之營州，北接室韋，大抵在現遼河流域，隋唐之交，始爲中國所羈縻。唐之帝國盛況，爲歷史上所未有，塞外諸國，及西域諸國，皆奉唐代之正朔，故有『天可汗』之稱號，張其昀著中國民族志，據桑原博士所考證說：『唐時中國固有之李姓外，蕃人出身之姓李者甚多，如高麗人，渤海人，奚人，契丹人，及回紇人，突厥人，黠戛斯人，乃至安南人，印度人，大食人，波斯人，猶太人等，如唐代有大食國（今阿拉伯）人彥昇，成大中二年繼

土，睹其名，已可知其華化之深。」唐代嶺南之地，爲漢蠻雜居之區，官吏謫戍之所。韓愈謫居於潮州，柳宗元謫居於柳州，皆有關於中國南方文化之開發。唐朝到高宗死後，國內變亂，無力鎮定外國，東突厥的殘餘勢力，又在北方一帶蠢動，鮮卑的遺族奚契丹，也起來侵擾東北，突厥契丹擾亂中國邊境時，回紇吐蕃也在西北一帶侵畧中國土地，因此唐朝不得不注意邊防，守邊之將，擁兵自固，成尾大不掉之勢，外患內亂相繼而起，當時外患比較重大的，是回紇與吐蕃，其次是南詔和沙陀。回紇在唐肅宗代宗時，當與中國交通，漸染中國風習，唐朝末年，被黠戛斯所攻，殘部有一部竄入中國，有一部逃至西域，住在天山南北，成爲現今新疆省一帶回族的祖先。回紇侵擾中國沒有吐蕃的熱烈，代宗時吐蕃攻入長安，代宗逃至陝西，在長安抄掠府庫，焚燒街市，弄得殘破不堪，郭子儀收拾殘兵，始成光復之功。南詔是獠獍人的祖先，據雲南貴州四川等省而立國，唐德宗時韋臬爲四川節度使，招降南詔，其後屢侵邊地，遂把他勢力削平。沙陀乃西突厥的別部，於唐末入中國代平亂事，化爲割據河東的蕃鎮，黃巢造反，唐引用沙陀部族李克用去打黃巢，事平，李克用任河東節度使，以外族而兼藩鎮，唐亡之後，遂成五代中之第二代。契丹自唐中葉以後，每歲遣使入長安朝會，朝廷懸其外附回紇，不復授官爵，後唐明宗天成二年（西紀九二七年）太宗即位，乘中國有內亂，屢發兵南侵，助後唐叛將石敬瑭滅後唐，敬瑭割燕雲（今北京山西雁門道大同縣）等十六州賂之，敬瑭崩後，出帝即位，以事激怒契丹

，太宗自將南侵，大掠河南州縣，旋以病死，所得之地爲中國後漢劉氏所恢復，自此契丹日益漢化，改國號爲遼，仿唐官制，設種種官爵，皆用漢名，及道宗時好文學，採用科學制度，漢文漢詩流行於社會，其後朝政日非，契丹固有悍悍之風，銷滅殆盡，傳至天祚帝爲女真所滅而國亡，契丹遺民，皆在女真勢力範圍內，漸次同化於國族。女真爲古之肅慎氏，隋時稱靺鞨，唐初畧取現在東三省地，輸入中國文化，開闢東方草昧，黑水以下諸部，皆隸屬之，分生熟女真。宋徽宗政和五年（西紀元一一五年）生女真酋長阿骨打，自立爲帝，國號金，是爲太祖，以兵力取現在吉林奉天熱河京兆等地，遂國遼。又與北宋起衝突，連破宋兵，盡取現在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與江蘇安徽北部陝西中部甘肅中部南部，及世宗即位以後，與南宋言和，與民休息，承平已久，逐漸漢化，及蒙古成吉思汗勃興，乘隙南侵，盡取現在熱察京兆三區與直隸山東山西及東三省，驅逐金人於河南，金人卒爲蒙古所滅。女真遺民，在蒙古勢力範圍之內，逐漸同化於漢族。蒙古之根據地，在今外蒙古東部，南宋中葉以後，金室溺於漢化，武力漸衰，蒙古偉人成吉思汗乘機舉兵滅金室，佔領中國北部，是爲太祖。至太宗憲宗之世，其疆域已據有今之內外蒙古天山南北路，中國之西北部，阿富汗波斯之北部，俄羅斯之南部，而分爲四大汗國，創立空前之大帝國。元人分所治爲蒙古色目（即西域）漢人南人四色，元朝所謂漢人南人者，以宋之疆域爲判，故契丹女真高麗皆漢人，而純粹漢人反爲南人，據餘邊考，元朝蒙古色目人借居內地，與內地人聯姻

者頗多，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部人聯姻，乃詔互遷其久任者，據近人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證：「畏吾兒，（即回紇）突厥波斯大食敍利亞等人，本有文字，本有宗教，然一旦入吾華地，亦改從華俗，且多在文學上佔重要之地位。」（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蒙古侵畧中國後，改國號曰元，（西紀元一二七一年），一切典章文物，皆仿效中國，傳至順帝至正二十八年，爲明太祖所滅而亡。蒙古遺民，大半留居中國內地者，遂爲漢族所同化。（據元史釋老傳：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罔用漢楷，及畏吾兒字，以達本朝之旨。可見元朝之傾向漢化。）清代滿洲民族入主中國，其發祥地在奉天東北部，及吉林黑龍江，據京師後，設滿洲蒙古漢軍三旗，每旗各以都統掌之，強制漢族，同化於滿族，然八旗及駐防旗人與漢族雜居日久，習染漢族風俗，讀漢書，學漢語，滿文漢語，日久遂至淪亡，清初在東三省滿洲人，多數移殖於關內，充各省駐防，久之遂與漢人同化。乾隆中年以後，（紀元一七九〇年）直隸山東兩省饑荒，貧民無法生活，相率移民於東三省，土地所有權逐漸移轉於漢族，咸豐年間俄人南下，經營滿洲，一八〇六年與北京條約割烏蘇里江東岸與俄，隸東海濱省。政府爲對俄人計，開放滿洲一部分，允許內地漢人移住開墾，至光緒十三年，遂允全部開放，（見東方雜誌二十二卷第二十一號徐恆耀滿蒙勞動狀況與移民篇），因建設鐵路，開採森林耕種農業等需要，勞工日多，滿洲移民

更呈活潑氣象；每年由山東等省移殖者，以數十萬計，東三省全部皆漢化，只有松花江畔及省城駐防營一小部分，猶保存滿洲舊風而已。（以上是很簡單的敘述，其詳可參考商務版章休編中國史話，張其昀撰中國民族志，北京文化學社版，王桐齡著中國民族史中國史，其他唐書，遼史百官志元史清史等書）。孫中山先生有說：「就中國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突厥人，計算起來，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我們知道中國境內之民族，雖有漢滿蒙回藏苗六族，然經過幾千年的化合，已變成混合的，在這幾族中，是以漢族為主體，而同化其他的民族：（一）是因漢族人數比較多。（二）因漢族所居之地理環境比較好；（三）因漢族是農業的民族以文化勝，其他民族為游牧民族，以武力勝，兩方同化，將產生新特質。（四）因漢族的智力比較其他民族為優。惟是漢族自北宋弱於遼，滅於金，南宋弱於金，滅於元，近三百年為滿族宰制，雖能同化滿族，而本身之文化力量，經數次剝削之後，又有退落之勢，遂為帝國主義者壓抑中國民族之遠因，文化復興，民族獨立，是有待於今日。

（三）民族的特性與文化的影響

中國建國，遠在五千年以前，有世界最長的歷史，而其文化在古代，又爲古代東洋諸國之冠，依進化向上之義，現今當超越世界各國之上，豈知自近代以來，不但民族之氣質，隨時間遞衍而日益消沉，而文化的精神，亦隨世代演進而日益退落，環顧宇內，歐美文化競新突進，超越我們的國家，不知幾千百里，而關於人類精神活動所創造的科學藝術政治經濟學術思想種種文化，亦隨世變而日益向上，所謂具有古代光榮歷史的文化國如我邦，不但不能並駕齊驅，而且相形見绌，這是何種的緣故呢？關於物質環境社會環境諸複雜的原因，雖然很重要，而關於民族精神之振奮與創造革新之朝氣，以組織牠的文化網，成爲人類生存整個的活動者，有所歧異之故也。我們研究一國的文化，從政治宗教物質經濟學術思想各方面以爲評價，本來亦可知到牠的動因，而從民族的方面，所謂生理的和心理的條件之中，也可以得到牠癥結的所在；一個民族陷于衰微的，豪氣生氣的，暗淡的，平庸的，屈伏的，苟安的形態時，他生活日趨於水平線之下，試問不！振奮，文化尙能提高於水平線之上麼？

文化的演進與提高，要靠國民的經濟力物質力，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然而中國幾十年來，學步歐美，注重物質文化之輸進，汽船戰艦大砲飛機工廠，應有盡有，而國家至今沒有富強起來，國家文化，也沒有突進的表現，這是何故？不能不歸根於國民精神的方面，失去古來優美的民族性啊！予於民國四年在港報發表中國文明進步之動機一專篇有說：『民族觀念者，先天的觀念也

，基此民族觀念，以樹立民族之精神，由此民族之精神，以團結其愛國之思想；彼大日耳曼主義，德意志民族觀念之發現也；彼大不列顛主義，英吉利民族觀念之發現也；彼士拉夫主義，露西亞民族觀念之發現也；所以得祖國之國勢而不致凌弱者此觀念。所以揚祖國之文明而不致衰落者此觀念。『國家之強弱，文化之盛衰，受影響於民族性質之優劣者甚大，歐美人有歐美人之民族性，印度人有印度人之民族性，中國人有中國人之民族性；各民族承其本國幾千百年先哲文化之遺澤，社會之環境，以養成其特殊之性質，又由此特殊之性質，以胎成其特殊之文化。民族與種族不同，種族以皮膚毛髮，骨骼等生理條件作標準，民族則以血統文字語言思想風俗宗教等文化的條件作標準，中國民族各處地理的環境，以形成畧為殊異的性質，演生畧為殊異的文化，據地理分布狀況分析之可分為三大派：（甲）黃河流域的。黃河流域氣候較寒，雨量復少，水旱無常，飢饉時有，人民身體壯健，性情直爽，任俠好義之風，古來素著。（乙）楊子江流域的。楊子江流域氣候溫和，雨量豐足，物產富饒，蠶桑棉茶之利，甲於全國，俗尚奢華，性嗜文藝。（丙）珠江西江流域的。珠江西江流域位置益南，氣候愈暖，雨量愈豐，物產愈富，人民性情敏活浮動，惟具進取的精神。但就中國普遍的民族性論之，全國亦有相同之點，而表現其優劣之特性，影響於文化者甚大，就優點方面而說：（甲）勤儉性。中國民族具有勤儉的性質，故社會的信條，教訓的設施，極注重養成此種德性，以此種德性的多少，為人格高下的標準，惟勤，故注重實際的

生活以保存目前經濟自足爲目的；惟儉，故對於踵事增華，奇技淫巧，在所排斥，偉大美觀的創作，素所輕視。（乙）和平性中國民族素具和平天性，歷史上的先哲言論，主張以德服人，不主張以力服人，幾千年的文教，注重汎愛衆而親仁，此性的發展，可以包容許多環住的異民族，逐漸同化。而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所以悠遠廣被啊。（丙）忠孝性。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歷史，提倡忠孝兩德，植根於民族的天性，遂形成爲日常的社會生活，歷史上盡忠盡孝的烈士義士，史不絕書，孔子孟子諸大哲，提倡孝道，爲人類社會倫理中最高的文化，且提倡立己立人之說，以維繫社會根本的組織，進而提倡恕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凡事盡在我爲標準，這種種教義，影響過去的文化殊鉅。宋朝之亡，轟轟烈烈以殉國難者，多至數千人，元清兩代竊據中國，卒能光復，不致文化終斷，這也可說是歷史上忠孝大義感召人心者至深，故能致力於君父之仇也。（惟此後當移忠於國方有意義）（丁）中庸性。中國民族性常表現中庸性，以中爲倫理之原則，爲應世接物之條條，此性能循正軌以表現，則能調和物質的生活和精神的的生活，所以窮奢極侈姿縱物慾之事，視爲大戒。予在中國文化復興之基本問題一書，中國文化優良之特質一篇有說『中國幾千年的物質，沒有講求到如今日西洋人之進步，這是中國文化之缺點，但中國人之人生觀念，價值標準，不是以物質供求之豐富爲教訓的，不是以個人之過度享樂爲標準的，這是中國文化之所長。』（見七十六頁）中國人的中庸性，能調和物質的生活，與精神的生活，致幾千年來的文化，不陷於

類之境，是其一原因。中國民族性此劣點方面而說：（甲）依賴性。依賴性，是中國民族性之一弱點，壯年人之倚賴老年人，老年人之倚賴少年人，全社會也是互相倚賴，而失去其強的獨立性，創造性，這倚賴性，自漢漢兩代土權傾達以後，更爲發展，而最要者，可說是倚賴天命，成敗得失吉凶禍福榮辱貧富貴賤，凡事倚賴天命，而不敢別有主張，此乃由孔子之教義，提倡有命之說，深入人心，而墨子非命，荀子否定天命之主張，素來不爲社會所信仰。此種心理，影響於民族者，對於國家的存亡，概歸之天命；而國家文化，即便發達，必成爲靜的文化，而不成爲動的文化了。（乙）自利性。中國民族，是注重實利的民族，然因公極心的薄弱，很少注意國家的實利與社會的實利，而注重家庭的實利與個人的實利，因爲過重於家庭與個人的實利，久之，遂由熱烈的情緒，而陷於自私自利，此種性習的發揮，往往放利而行，損人利己，孳孳爲利，言不及義，舉凡公的教育事業文化事業之不能發展，皆爲此自私自利之心所貽誤，甚至國家之將亡，民族之危險，爲私人利益之故，可置諸腦後，此性的發達往往注重私利，不注重公害。宋朝滅亡之時間，有從敵國方爾，受了賄賂，殺害忠義之士的事；明朝滅亡之時，流寇李自成攻掠北京，皇城全被包圍，思宗皇帝，努力防戰，危機迫迫，國庫的金不多，不能給士卒以特別酬賞，所以請求內帑，然而皇帝重臣，大家都不願多出資金以急國難，皇帝遣使者向當時的富豪徵集軍費，很多都是託故，祇出少許，所以兵士，也因之而不努力作戰，北京因此攻破了，皇帝因此殉難了，國家也因

此滅亡了。前車之覆，後車之鑑，這種性習，如不掃除，必影響國家的危亡，民族的消滅，文化的墮落啊！試觀教育一項，歐美注重農工商的實利教育，而中國注重個人學優則仕之官僚教育；幾千年國家文化教育，受惟我論者（egoism）的影響是很大的。（丙）保守性。中國民族是謳歌古代之黃金世界，是讚美古代之英雄豪傑的；日常百般之儀禮風習，墨守幾千年的傳統，這因為在古代時中國的文化，已卓絕於四鄰的異族，故自尊心與保守性很強，自信己國的文化，有無上的權威；如以孔子教義。也是迄而不作，信而好古，爲古代的文明作保障；所以歷代鼎革之後形式雖是革新。內容却仍舊，而社會習慣，處處是表示着保守性的威權。加以老莊的哲學，佛教道教的彌綸把這保守性，更爲發揚，所以在歷史上賈誼以特出的天才，想力改正朔，易服飾，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想把秦法完全更改，受了守舊黨的元老周勃灌嬰馮敬的反對，於是被貶謫了。王安石以爲偉大的政治家，想力行新法，也被保守黨，完全破壞了。清末康有爲之徒，雖表面樹起維新的招牌，但是骨子裏，也是以保皇爲號召，不脫保守的法調。自革命運動開始至今，提倡進取革新，對於保守的性習漸漸衝破，而於歐美的新文化，遂有迎頭碰見的趨勢了。（丁）渙散性。中國的民族性，因歷代閉關自守老死不相往來之故，加以惟我主義個人主義自利主義的發揮，遂使民族的性質，日趨渙散，而不有實際的團結這種民族性，影響於國家，沒有表現充實的愛國觀念；影響於民族；沒有表現堅決的民族精神；影響於文化，沒有表現學術的團體合作。無

論何項團體組織，常以此性爲梗其中，終致解散破壞，這種性質不改變，民族的文化力量，是不足以發展的。

（戊）消極性，中國民族性，凡事不願作積極的主張，每因因循妥協而貽誤時機。凡積極的創造作爲，每以爲迂遠，不切事實。在道德上，常主張安貧樂道，隱遁山林的消極生活；在風習上，常主張生活事小，死節事大的消極行爲；在社交上，常主張只顧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的消極意見；這種不重積極的精神，即爲民族。精神與文化建設逐漸消失的一原因。美國杜威博士，對於中國人之評論有說：「中國人在華盛頓會議，及一切外交談判時，終始抱注目靜待的態度。」又說：「中國人爲什麼不前去開發自己的富源呢？爲什麼不像美國那樣去借外國資本，把政治和經濟權，拿到自己手足呢？詎中國所走的路，已陷於惰生窠？」我以為這是不難解釋的，有消極的態度，當然不能表現積極的精神。中國的民族性有優點，又有劣點，把劣點的民族性逐漸淘汰，把優良的民族性，逐漸增長，這是中國民族的文化力量重行振興的基原本因。美國 Carlton Hayes 於族國主義論叢什麼是中國主義一章有說：「民族斷然是文化的一方面，民族的結合的性質，應該用社會的和基本人文的科學來理解，不應該用植物學和動物學來理解。俄人希臘人德人日人，及任何其他民族的特質和特性不是僅僅種族的附帶品，或地理的偶然物；民族的特徵和特性，是社會境遇及文化傳統的創造。」（見漢譯本十六頁）可知民族性影響於文化者至大

(四)民族的創造能力與文化的影響

一個民族的創造能力，與他的文化發展有重大的關係。文化不外發見與發明，然何以與發見宇宙間的事理？何以能發明世界物質的精神的文化？非民族的集團與分子，有創造的能力不可？中國古代中代的文化，對於世界沒有遜色，是因為中國古代中代的時期，先民利用他的能力以供獻於文化事業的緣故，在中國古代發顯耕稼，經土說井，教民植桑養蠶治絲，製定衣服宮室器用，而且醫術天算音變貨幣學校體制官制，皆燦然大備，莫非表示我國民族在古代具有創造能力。至周代實集合黃帝堯舜禹湯諸哲的大成，上國幾千年的政教典禮。悉基於此；中國之有周代，猶歐洲之有希臘，周代政制體樂文物之所以如此發達者，賴有特出的大才創作家周公，就其制度之充實，文化的光輝者大約如下：(甲)官制，定官號三百六十，以掌理財政選士祭祀五禮兵賦刑法民政。(乙)爵祿，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一定的爵祿。(丙)田制，定一夫授田百畝之制，使無失業的游民。(丁)稅制，稅制則定粟米之征，布屨之征，力役之征，以均人民之負擔。(戊)兵制，則兵制採用通國義務兵之制，服役年限在二十歲至六十歲之間。(己)學校，中央太學與地方學校，中國歷代教育，以周為最普及。(庚)選舉，選舉分選士俊士造士進士以定官制祿。(辛)刑

法。刑罰之重者，常多寬厚之典。（壬）實業，對於農業，有籍田祈穀勞農諸農政；對於工業，有考工專職分工之制；對於商業，與典商有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此可以表見周代周公之創作，於我國文化有重大貢獻。春秋戰國之世，百家爭鳴，學術思想，發揮張皇，可說是我國之哲人時代。秦代始皇巡遊天下，刻石頌德，可知雕刻學已開始；又長城之築，是世界建築物大工程之一。阿房宮建築於渭南，亦極其華麗。秦之蒙恬造筆，文化傳播遂以便利；張衡（後漢南陽西鄂人）研覈陰陽，作渾天儀和候風地動儀；蔡倫造紙（後漢桂陽人）而及於利劍器械；前漢有唐都，李尋，後漢有蘇柏，郎稚光，均以通天文名；前漢有淳于意擅方術，後漢有張機通黃帝內經，扁鵲難經，及神農本草之旨。三國時，魏馬鈞作翻車及桶以利灌溉，漢諸葛武侯，作連弩矢及木牛流馬以利戰爭。晉代紛爭，幾無寧日，及南渡後，文化集於江南，美術尤為所長，如顧愷之，衛協精繪事。阮咸作月琴，宋識作拍板，流傳至今。建築如張駿所起之謙光殿，窮極珍巧；製造如晉杜元凱作連機水碓以利農事。隋代開通運河，為世界人工造成之第一長水，又築西北兩邊的長城，偉績不在始皇下。唐代天算大家，有李淳風製渾天儀，頗稱精妙；繪畫有北派之李思訓，南派之王維；音樂當時教坊有生員二千人，太常樂工至萬餘戶；醫學有孫思邈所著千金方翼，甄權作脈經針方；建築有高祖時之披香殿，玄宗時之華清宮，皆甚壯麗；陶工以南昌窯越州窯為著；機械如內庫所藏之十二時盤，楊思齊所作之傀儡等，亦極奇巧。宋代東京西京宮殿寺觀，規模宏

備；活版發明於神宗時（畢昇）。元代郭守敬，對於歷數上集古法之大成，旁得泰西新法，匡中國三千年來歷法之謬誤；醫學有朱震亨等考校醫經，製造則因海運而造平底船，因用武而造軍器。明代有呂復，王履，戴思恭，於醫術有所發明，李時珍著成本草綱目爲醫界的大觀；徐光啓譯幾何原本，測量法諸書行世，西方學術，開始萌芽，繪畫一學，有王冕，王履，沈周，唐伯虎，文徵明等，均有名於時；工業方面，有鄭和航海造大船，長四十四丈廣十八丈六寸有二。清代文化，雖是中衰之期，然以海禁大開，西方學術，從此輪進，中國關於歷算有閻若璩，楊光先，孔廣森等的中法派，薛鳳祚，游藝，李光地等的西法派；王錫闡，梅文鼎，陳厚耀等之中西調和派；醫學有陳念祖著有醫書二十種，徐大椿著有醫書十三種，武之望著有濟陰綱目等書；關於製造，有江浙等處之織染，江西景德鎮之窯磁，北京之景泰藍銅器，廣東之刺繡象牙，長城沿邊之製皮毛氈等。從以上的引証，可以知道幾千年來，我中國民族之創作能力。中國幾千年來有三大之發明創作，對於世界有重大之貢獻的：

（一）是印刷術。當歐洲黑暗時期，我國印刷術，已有萌芽，唐末谷州已有墨版，五代之際，印刷術大盛，宋代活版完成，我國印刷術之流入歐洲，始於十五世紀初葉，歐洲木刻文字，始於一四二三年。（二）是指南針。指南針，由我國發明，由阿拉伯學之，然後傳入歐洲。（三）是火藥。火藥之發明，我國最古。宋太祖時，創造火箭，真宗時有火球，十二世紀中葉，岳武穆將魏勝

創制車施火石，此實近世鎗砲之原始。其後阿剌伯人伊思瑪，因之製造火砲，後於魏勝百餘年。民偉主義第六講有說：『外國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從前發明的，比而指南針，在今日航業最發達的世界，幾乎一時一刻都不能不用他，推究這種指南針的來源，還是中國人幾千年以前發明的，如果從前中國人沒有能力，便不能發明指南針。』中國民族所創造的文化，在過去是有貢獻的。近據國民新聞社特阿蘭泰通告，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留學生關慶炳與哈佛大學中國留學生白崧棠，在美國科學協進會年會演說，聲稱血循環與消化理論，皆係中國首先發明，遠在西方發見之前，中國之發明血液循環，尚比西方哈威爵士於一六二八年發表此項論文時，更早二千年；中國紀元前一二二二年時，即有解剖學家著書，闡明人體內臟，及其功用；中國醫生，紀元前第三世紀，即知使用麻藥，更有若干外科器械，中國醫學在紀元後第七世紀，即已使用，而西方則迄今僅使用一百餘年云云。二君演講，雖然尚待證實，惟中國醫學在幾千年前，是比世界任何國為進步，是可倡的。中國自滿清統治政權後，利用科舉入股以消磨漢族之聰明才力，且加以威迫，斷削漢族進取的雄心，故幾百年來，科學落後，發明稀少，與歐洲文化進展的景象比較，真有不勝今昔之感。十九世紀歐美文化的特色，是新發明，那末，二十世紀的現代，更當以新發明為特色了。在二十世紀的現代，差不多在每一年中有一種重要的發明：如一九〇一年勃郎克的力的量子論，得普里斯的變遷論，一九〇二年刺得福的鐳射氣，一九〇三年來得的最早的

飛機，一九〇四年的電子管，一九〇五年愛因斯坦的特別相對論，一九〇五年的維他命，一九〇七年最初的無線電，一九〇八年原子論的證實，一九〇八年密可斯蓋的空間和時間的統一論，一九〇九年斐利的第一次發現北極，一九〇九年彌立根對於電子的測量，一九一〇年尼德對於鐳的說數，一九一二年阿瑪得奎第一次發現南極，一九一五年愛因斯坦的普通相對論，一九二〇年變光星的測量，證明了巨大星的存在，一九二二年愛因斯坦光的曲折的證實，一九二四年愛因斯坦分光論的證實，一九二五年彌立根對於光線的研究（見華國艾迪博士著現代的新信仰第四頁），二十世紀以來，歐美科學的發達，可說已達到最高峯，這可以說現代的世界文化，惟有科學的進步，可以說明牠發展的形象。我們中國的現代文化。有那一種可以比較歐美現代的文化呢？有那一種的文化。可以比較歐美現代文化爲進步呢？在歐洲從柏林到倫敦只費一天工夫，在阿非利加的人到晚上的時候，可以聽見倫敦的音樂，英國和非洲殖民地的交通，只要費一秒鐘的四分之一，科學已經把世界縮小了，同時又把宇宙的範圍擴大一千倍的光景。在生物範圍內，歐美科學家已提出二萬五千多種的脊骨動物，以及二十五萬多種的無脊骨動物，又發現了人類身體中的四十萬萬個白血輪，以及五十兆兆個的紅血輪，而且每一個血輪，都具有複雜的世界；在天文學中，人的眼力祇看見四千個星球，倘用有效的望遠鏡，可以看到幾千萬的星像；在物理學中發見一磅的一百十五分之一的脂肪，乃是一兆輕氣的分子所造成的；科學家不但能計量分析分子，而且

可以分析原子；電子，乃是世界上最微渺的東西，科學家能知道牠的對徑爲一寸的五千兆分之一，那末，要有五千兆顆電子，才能成爲一寸，這精密的計算，真是令人驚奇。現在世界的文化，我們可以用民族的創作能力，在科學進程上可以說明牠發展的形態，然試問我國現代的文化，在科學的創造發明上，有那一種可以同歐美現代科學的文化比較呢？歐美在二十世紀時代，每年有重要的發明和創造，而中國民族在二十世紀時代，有甚麼重要的發明創造呢？最近中國有四位發明創造家，在科學史上文化史上，雖沒有重大的貢獻，然亦可以稱述的。一位是創造中國電風扇之楊濟川，他先由洋布店的學徒，做到洋布店賬房，再由是而做到電氣工程師，組織華生廠，最初一年造電風扇只有一千具，民國十五年增至三千具，民國二十一年達到二萬具，出品優良，比外國便宜到四分之一，搶回外國貨十分之九的生意。這是值得稱道的一件事。一位是發明藥沫滅火機的薛震祥，他在上海百司洋行做學徒，費了十年的工夫，發明滅火藥沫爲消防上的利器。一位創造味精的吳蘊初，他積了二十年研究化學的經驗，辦了不少的事業，如天津硝鹼公司，上海機昌公司，天廚味精廠，天原電化廠等，都是於國貨事業上有貢獻的。一位是發明木炭代汽車油的湯仲明，他是河南孟縣人，民國八年赴法，民國十五年歸國，在法七年專攻機械，歸國後，充甯海路開封修械廠廠長，及機務工程師，其代油渣之創造，先後經五次，方造得成功，（可參閱人物述評一書），爲他近人如浙人厲汝燕，粵人謝讚泰，於飛機亦有所發明，粵人羅福能製水

面行車機；創造能力，雖未足與歐美並駕齊驅，也可說對於歐美現代科學的文化努力追蹤的。

（五）民族的遺傳關係與文化的影響

遺傳血統的關係，影響於人類的生理心理及智能，由人類的生理心理智能，而影響於他的文化之高下，有許多的科學家是贊成的，有許多科學家是反對的。我遊南洋英荷兩屬及澳洲各省紐絲崙南太平洋各羣島北美洲南美洲巴拿馬秘魯各地，看見當地的土人與白人的比較，土人大概是膚色黑黑魯魯無文知識低下的，這種種土人與當地白人之土生子，同受地理環境所支配，爲甚麼有智識的高低，文化高下之差別呢？此不能不採用遺傳因素以解釋了。多爾西（George A. Dorsey）在他所著種族與文化一篇，他是反對遺傳關係與文化有影響的（見俾耳德所編現代世界與文化商務譯本二七三頁），美國哥布金司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生物學的哲林師教授（Prof. H. S. Jennings）及配耳教授（Raymond Pearl）是相持同一之意見。劍橋大學教授哈登（A. C. Hodgen）在人類之種族裏說：「以文化爲標準而把人類劃分若干種族，對於社會學家是很方便的，不過這種分類，對於遺傳並無根本重要之關係，雖則可以說明民族互相之影響；種族的文化，並無這樣東西。某民族之文化，完全是根據於他們生活之方式，而生活之方式，又是根據於地理的環境。」（見三〇七頁）民族的地理環境與文化有重大的關係，但不是唯一的關係，我以爲遺傳的關係，是其中

因素之一；倘使以地理環境為唯一的關係，則美洲上古文化的發源地，在秘魯高原墨西哥高原俄亥俄（Ohio）流域三處，為甚麼現在牠的文化至今退落而不能仍然繼續呢？可見除却地理自然環境之外，尤有其他的原因，而遺傳關係，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世界的人類，分許多種族與民族，這種種之種族與民族，因種類的不同，血統的分別，結婚的傳衍，致令其性格身體性質才力，有許多的不同，由性格身體性質才力許多的不同，因影響到歷史文化有種種的差別，這是確定不移的事實。試問高加索的百色人種與蒙古的黃色人種，有相同的遺傳血統麼？有相同一致的文化程度麼？馬來之褐色人種，與黑色的尼革羅人種，有相同的血統遺傳，有相同一致的文化程度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自然的定律。愚蠢白癡的父母，那裏能產生強幹聰慧的子女？人類的皮膚毛髮眼睛，以及身材的長短，體質的強弱，才力的高下，性情的剛柔，總是由遺傳得來的。智識低下，心性柔弱，體魄衰殘的民族，他的文化進程，斷不能超越智識高尚心性剛強體魄雄偉的民族的文化。在遺傳的定則中，其所謂遺傳的類似性，和差別性，或變異性，且有所謂分配遺傳，擇一遺傳，混合遺傳的；不論遺傳的形式如何，子女都是酷肖他的父母祖先的。其有不同者，大概是屬於變例。英國加爾端（Francis Galton 1822, 1911）努力研究遺傳問題。他於一八六五年時，主張精神的性質與肉體的性質，都有遺傳的可能；一八六九年他著成遺傳的天才一書（Hereditary Genius），把歷史上有名的三百個家族，分為異常優越的，與比較優越的兩種統計，

，知道在這三百個家族內才能異常優越的，有四百十三人，才能比較優越的，有九百七十七人，這些優越者近親，如子兄弟父祖叔伯從兄弟等，都有相當優越的實質，而且血緣愈近者（如子）其優越之人數較多，血緣愈遠者（如從兄弟），其優越之人數減少；因此，他就斷定凡優越的天才，多出自優越的家族。一八五四年哥賓留（Count Arthur Gobineau）著種族不平論，以爲文化緊要之成因，是種族或身體之構造，國家發達，是由於種族血統之純潔；他以爲祇有雅利安族，建立了一個真正偉大的文化，（見商務版現代世界的文化二八〇頁。）法人拉普池分歐洲種族爲歐羅巴族及諾迭古族（Homo Nordicus）他說：「德國兼有三族，法國亦兼有三族，美國亦兼有三族以上，但法美之所以强大者，則三族之一——歐羅巴族或迭諾克族——爲之也。餘則附贅懸疣耳。」又說：「偉大之人物，大率自純正的歐羅巴族或迭諾克族產出，然亦有自間種產出者，則間種血統中，歐羅巴族之成分，有以致之。」（見潘光旦著人文生物學論叢引證二四頁。）歐洲民族爲世界優秀民族之一，他對於世界現代的文化，有偉大的貢獻，是值得稱頌的，但是歐羅各民族雖然優秀，不能說他唯一的優秀民族，高出於其他優秀民族之上，因爲除却民族遺傳原因之外，尙有其他地理環境與社會環境。奧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教授，在他寫給於紐約時報的一封信，證明歐洲近代與現代許多的大思想家，大發明家，對於世界文化有重大之貢獻的，如拉斐爾（Raphael）、芬奇（Leonardo da Vinci）、伽利略（Galileo）、科修斯古（Kosciusko）魏拉斯啓（Pala-

尼·科利尼(Coligny)科爾伯特(Colbert)、修飛(Joffre)、福熙(Foch)大藝術家羅丹(Rodin)、大文學家拉馬丁(Lamartine)等，都是那丹民族。從以上各項引證，就知道民族的遺傳關係，是與文化有巨大的影響的。因此我們可以據一個定則，凡一個民族內他具有優良品質的分子，與其他同一民族內，具有優良品質的分子結婚，必產生更為優良品質的後一代分子，以促該民族文化的進步。凡一個具有優良品質的民族，與另一個具有不良品質的民族結婚，必產生較為次等品質的後一代分子，以致該民族文化的沒落。其在後者的引例，著者於民國十年間游澳洲及南太平洋羣島，十一年至亞包加柄等埠時，曾觀察當地的白種人與當地的土人結婚的子女，非特他的形體面貌不如純粹白種人結婚所生之子女，則其智識能力，亦大有所不及；其在前者的引例，紀元前五百三十年至四百三十年，希臘一個很小的阿提喀市(Attica)，曾用生十四個有名的人，平均四千三百個自由民裏，就有這樣一個人；從紀元前五百年，至三百年，這個很小的市境內，至少出了二十個有名的人，牠的面積與人口總額，恰與現在羅得島，(Rhodeisland)相當，至於自由民還不及羅得島五分之一，政治家詩人哲學家科學家建築家美術家歷史家，在兩世紀之中，蟬聯而起，後世所罕見：這些有名之家，都是地中海沿岸優異的種族，經過一番的自然嚴密的選擇，集合而來。因謂雅典，是個尙材智重社交的城市，所以一般喜事好功與有能力的人們，雲集其間，貝特孫(Batson)認為雅典種族所以優越者，由於該市出類拔萃的民族，彼此互婚之故。(可參閱錢嘯

秋著人種改良學概論四二頁）。在城市的文化的進程與鄉村的文化進程來比較一下，自然鄉村的文化，比不上城市的文化，除却城市文化環境設備優異於鄉村之外，在城市裏因為人物萃聚，尙才智重社交的利便，利用選擇婚姻較爲容易，故優秀分子多產生在城市之間（亦有不盡然者），我們知道遺傳對於文化的影響，是因為先天稟賦所決定之故。甲民族的文化，何以與乙民族的文化不同？甲民族的文化，又何以優勝乙民族的文化？除環境的影響之外，是受遺傳所影響的。種族和民族所遺傳的品質，是決定文化的高低和優劣的。自達爾文華萊斯（Darwin Wallace）同時唱生物進化以來，生物學家與善種學家，接踵研究生物遺傳性質之影響，而進及於人類，如曼德爾（Gregor Mendel）衛士登（August Weismann）加爾登（Francis Galton）沙利比（Caleb W. Saleeby）等，開發人與生理心理上之進化理論，其結論如下：（一）人種欲求最適生存，當舍數目而取品質。（二）康強體魄，明敏心靈，皆不可少，二者難兼，當以心靈之完美爲首要。（三）凡國家富強其種族於內，始能競存於外，未來的戰爭，非決於疆場，乃決於父母之遺傳。（四）遺傳原則，先天的或原有的特性，能遺傳於後代。（五）父母有形體與精神的良品質，始能遺傳於子女。（六）男女慎選配偶，始能孕育碩大偉健優美子女，爲國家之俊傑，以承繼管領世界的文化。諸如此類，都是說明優良的遺傳，是使人類心身方面的健全，人類身心方面健全了，自然可以促文化的進步。（可參閱拙著的中國文化復興之基本問題一書暨南大學第四一頁。）加爾端曾

說過：『向使雅典能保存其卓越之性，子孫繁衍散佈於通都大邑，將劣等人民之位置取而代之，則其所成就之結果，必有大造於人類的文明，出於吾人預想之外，可斷言也。』現代世界的文化在將來能否進展呢？是以現代世界各國家，對於人種改良在遺傳中有否控制的方法以爲斷。在現代社會經濟制度的下，如大多數的優秀分子，常處於變態生活中，所受祖先遺傳質中的優良因子，缺乏適當環境之刺激，無由發展，即想得到一個配偶，把潛伏在本身優良因子，不能延續下去，以爲未來文化的發展，祇是生理心理品質低下之分子，在現存制度保地位，以孽生蕃衍，這就是現代文化在將來退落的動機。反之，社會制度日漸改良，容許品質優良之分子，佔了社會的高層，以孽生蕃衍，這就是現代文化，在將來進展的傾向。中國民族，號稱四萬萬，照大體而說，是以優秀稱，然而現代的中國民族生理上心理上，能否仍保持此優秀的傾向呢？現代中國民族，憑實際的調查，就知道因早婚及門第階級財產地位的選婚種種緣故，中國民族之體質，一天比一天，體質的孱弱，當然精神能力，也是虛弱的，民族古代來冒險的精神（如班超張騫等），日益消弭，開拓一世之奇功偉烈，已不如前，以現代中國民族的體魄能力，與歐美人士之體魄能力比較，有愧不如人之嘆；今後想中國能繼續古來優美的文化，改造現代的文化，發展將來的文化，在於人種改良的方面，須要加以注意的。倘使中國民族，愚魯的，低能的，犯罪的，粗暴的分子日多，和這種分子結婚的數目日多，數世紀以後，中國的文化，會隨這種分子的日增而

進步麼？決不會有這現象的。倘使中國民族智慧的，溫和的，誠實的，能幹的，強健的，堅忍的分子日多，和這種分子結婚的數目日多，數世紀以後，中國的文化，會隨這種分子日增而進步麼？決不會有這現象的。周建人於讀中國優生問題一文中有說；『現在中國人的文明創造力怎樣？和別族生存競爭的能力又怎樣呢？這大概無論何人都不敢說中國民族，現在是最強盛的民族罷；然則數千年來所行的合於優生學的制度效果在那裏呢？』（見東方雜誌二十二卷八號。）他是懷疑到潘光旦所主張中國的家族主義，門第主義，科舉制度等等，都是合於優生學的話。

中國現在的民族生命，已到於孱弱受帝國主義者環攻的地位，這就是證明中國現代的文化，已到退落的地步，如果中國現代的文化是蓬勃的現象，同時中國民族決沒有現在這樣的衰弱的。改變這樣的景況，在人種改良的方面用力，是一個條件。我們測驗中國現代的文化，當以大多數的人民程度為標準，而不能以少數的人民程度為標準的。據報載南海縣官窰北村（此地方，於二十三年）曆正月廿六日觀音誕生菜會，各屬男女前往參神絡繹不絕，每日萬餘人。神壇中參神者，怪狀百出，喃喃拜神者有之，求財賜子者有之，這等迷信陋俗下等的文化，凡怕全國遍地皆然。所以由現年中國大多數的羣衆習俗風尚，來觀察中國現代的文化，決不是高尚的。所以在教育方面政濟以外，要注意實行優生的制度。生物的演進與人類保存，他在天演界的位置，是注意於兩性選擇之作用的。在動物界中兩性選擇無不以對方的美麗強健敏捷勇敢為標準，很少選擇弱

弱衰老醜陋消極的性質的；在人類兩性的選擇中，在於形體的美觀健全表面的選擇，比較容易；在於心能智識品性的優良的選擇比較難；兼之社會的現成制度門第階級財產的支配勢力，可以使愚魯者歸弱者，根據以爲兩性互相的選擇。總之：人類選擇偶配，倘以優良的品質爲標準，則根據優良分子產生的定則，優良分子日多，必有助於文化的發展，這是可以確信的。中國婚姻之大弊病有三：（一）是男女婚姻不自由；（二）是一夫多妻；（三）是婚姻太早；欲矯正這種弊病，要制定婚姻法。美國哥倫比亞首府，關於婚姻律，有父母允許結婚年齡法禁親屬結婚無效婚姻之條文；歐洲意大利對於法禁婚姻規定：（一）癲狂癡呆有神經病者不能通婚；（二）男子未滿廿四歲以上者，不許結婚；（三）男女未滿廿四歲者，非經父母或保護人允許不能結婚；（四）軍人非經長官允可，不許結婚；（五）男女兩造，未自由允許願作夫妻者，不許結婚；（六）犯罪應處重刑者，不能結婚；（七）有夫或妻者，不許再婚；（八）親屬同血統者，不許通婚；（九）犯姦之男女，不許通婚（十）肢體五官不全不能成爲夫婦者，不許通婚。法國之婚姻律亦有大約相同的規定（可參閱中山大學版拙著民族主義與人口問題一書第十八頁）。我們知道優秀民族，必產生優秀的分子，但是世界上現在的民族，那一族是最優秀的呢？這不能根據現在的國勢而斷定的。法國有名著作家哥賓連（Gobinen）認定歐洲之亞利安種族，是最優秀的種族，是受有天赋的才能，以統治其他之民族的，因爲亞利安種，是具有遺傳優異的特質之故。這是種族偏見，不足以據爲定則的。亞利安種族，

是優秀的，是可貴的，然不能以他優秀之故，而有統治其他民族蹂躪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權利啊

（六）民族的道德能力與文化的影響

道德是行為的規範，民族道德，是民族行為的規範。所謂民族道德，不是專指個人內心生活誠意正心的消極道德，是指一個民族分子爲他自己民族貢獻他道德力量，爲全體民族努力奮鬥犧牲，以創造倫理價值，道德價值，文化價值之謂。美國哈佛大學白璧德教授於其所著歐亞兩洲文化篇有說：『彼英吉利人，所以能併吞印度而保有之者……實由於英人品德之優越。其於道德精神沉毅；英人之所以爲世界古今最善統治之民族者，以此，其能夷滅印度者，亦以此也。』（見白璧德與人文義一書二六頁）英吉利民族對於他自己的民族講道德，對於別的民族，就不講道德，這等對於自己的民族講道德，對於其他的民族不講道德，是沒有民族真正高尚的道德標準的。我在民族的特質篇曾說過：「民族有優異的特質，未必有民族的道德；因爲優異的民族，對於自己的民族就講道德，對於其他的民族，就不講道德；對於自己是族就講親愛，對於其他民族不講親愛」。（見中山大學出版拙著孫先生之思想及其主義一書七二頁）。我們知道一個民族，沒有正義的，博愛的，高尚的道德，惟具有殘忍性，淫暴的，暴動性，莽悍性，這種民族對於世界的文化，是沒有可稱頌的貢獻，而且必利用這種不良的性習，以摧殘弱小國家的文化。一二八滬戰之

役，東方島國的日本，利用飛機炸彈，燬滅上海租界文化機關，中國現代新文化，方在幼稚萌芽中，經這次的慘傷殘，其所受的損失，誠難以一言而盡。我在拙著人生問題一書道德與人生篇，由國家總狀影響而起之道德問題一段中說及：「近世國家侵掠主義，如狂潮噴射，橫震世界，一方面國家藉假仁假義之空名，以薰化人民，其目的非以為道德問題，實所以收人民反側之心，其操刀以授之富貴利祿，得以長此無恙也。且國家以侵掠為必要之信條，人民平日潛移默化，于講信修睦據德行仁之事，實放棄殆盡。」（見是書二九三頁。）一個民族對於其他民族要講道德，而對於自己的民族，也要講道德，對於自己的民族能發展他的道德力量，互相依存，互相協助，為他的民族的全體幸福文化價值而努力創造，當然影響文化的前途甚大。一個民族，受了強暴的民族侵侮壓迫，倘自己民族，卑怯服從，以圖生存，豈能表現民族的道德力量麼？希臘以世界文化搖籃稱，然必待與波斯戰爭以後，打倒他的強敵，保障生存的經濟地位，同時由外觀的認識，進於內心的認識，並由以內心的認識，發見人生觀的見解，及道德善惡的倫理價值；蘇格拉底，伯拉圖，亞里士多德，名賢輩出，提倡知慧勇氣節制正義諸道德，以為民族的領導；其後幾何學，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論理學，建築學，雕刻學，才日益發達。一個民族的節制性，與文化發展有重大關係，現世物質文明日益進步，同時人類的慾望，亦隨之弛縱。現世所謂文明病者，在人類社會，跋扈飛揚，不容易制服，文明病愈流行，而人類文化發展的前途，愈受障礙。所謂文

明病者即是：（甲）酒精中毒。享樂主義，隨一般人慾的進步而流行，於是狂飲之風，各處蔓延，歐美患酒精中毒之人，及由狂飲而犯罪之人，非常之多，這種現象，就是歐美現代文化的污點。據英國內務部報告，倫敦市平均每日入酒店之人數裏面，女子占三萬九千五百餘人，小兒占七萬零一百餘人，各國也有頒佈禁酒律，然秘密狂飲者也甚多。（乙）徵毒。徵毒之在文明國中，既以非常之勢蔓延，不可揜邇，社會生活困難，男女達結婚之期而沒有結婚之力，性慾衝動，沉溺而不能節制，直接戕賊個人之創造力量，間接損害國家之文化事業，中國現代之城市，已日趨歐美化，而這種病症之蔓延遂日有進展之勢，上海為繁盛都市，中國文化之中心，據南方雜誌三十卷十三號載上海營醜業之女子，公私統計達六萬人左右；西語所謂開化者（Civilization）梅毒化也，（Subilization）兇風日熾，燎原不息，其使現代文化之退落，豈不昂意中事麼？此外社會之競爭日烈。謀生之路日窄，不惜用陰險狡詐傾陷之手段，以對付社會集團內之人民，且以自由競爭之日兇，行掠奪壟斷的制度，資本日益集中，社會之豪奢愈甚，而在生活水準上，不能站立於大多數羣衆，因利益的衝突，而抱而走險，或擾亂社會之秩序，監獄騷亂，不勝煩苦，這等現象，豈文化發展的幸福途徑麼？復次，民族的內部鬥爭，也是使文化退落的。中國歷史上的內亂，不脫成者為王敗者為賊的兩條路道，每次內亂暴動即表現道德上的混亂，而摧殘文化的。洪容齋筆記，說及秦為無道，暴虐羣衆，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望，影響文化，當然很

大。赤眉賊之亂，樊崇統衆至百萬，由山東西向，一而暴動到長安，長安爲文化之區，大遭蹂躪，黃巾賊之亂，張角引仰暴動的羣衆，數十萬人，常時皇甫嵩，朱雋，統率兵士殺了幾萬人，並殺了三萬多民衆，被迫跑到河裏溺死的人，有五萬多人，被焚燒的車輦，有五萬多，這等內亂的屠戮擄掠，豈不是關係於文化的損失麼？唐代黃巢賊之亂，統率暴動之衆，陷落河南淮南江南鄆州許州滑州宋州汴州福州建寧廣州，他們所到的地方，號稱洗城，這洗城之舉，豈不是對於地方文獻加以燬滅麼？明末流寇李自成，張獻忠，統率賊衆至十二萬，凡陝西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湖南四川等地，無不大遭慘劫，所過之處，必屠城邑燒房舍，豈不是對於文化加以摧殘麼？自民國成立，中國現代文化，方在滋長，然以北京政府時期，多次的內亂混戰（除革命征伐外）其摧擄城邑公私建築，學校建設亦以億萬計。可知民族內部的鬥爭，可以證明民族的道德能力的缺乏，不論直接間接，均影響於國家文化，而至於混雜的境地。一個民族須具有道德能力，表現民族犧牲，勇敢，親愛，堅忍，和協的美性，以充實人格之內容，然後民族可以繁榮，文化可以發展，倘一個民族祇充溢貪污，卑鄙放縱，淫逸，鬥爭（內訌）狂放的不良道德，在文化線上，祇有頹廢的景象，那裏有創造文化的偉大貢獻呢？

（七）民族的地理環境與文化的影響

一個民族，要根據地理環境，以發展民族整個的文化勢力，猶太民族，自稱為選民的、但自紀元前五九七年後為巴比崙，馬基頓，羅馬，波斯，阿剌伯，土耳其，埃及等國家所蹂躪，到紀元後，民族分佈到全世界，他的民族整個文化沒有表現，在散處的人民中，雖然有多少對於文化上學術上有貢獻的，如大哲學家斯賓諾沙(Spinoza)，大經濟學家李嘉圖(Ricardo)，大社會學家馬克司(Mark)，大科學家愛恩坦(A.Einstein)但因為失却國家領土之故，未能表現他整個民族的文化。我們知道民族的地理環境，與文化有巨大的影響。地理環境如地域氣候山脈河流等等，對於社會經濟有一定的影響，同樣對於物質文化精神文化，也有一定的影響。古代的幾個文明國家中，巴比崙，希伯來，印度，中國等，都是根據優美的地理環境，尤其是河流，如埃及之尼羅河(Nile)，巴比崙希伯來之幼發拉底河(Euphrates)，與底格里斯河(Tigris)，印度之恒河(Ganges)與印度斯河(Indus)，中國之黃河等，都是促進上述國家文化進展的一動因。巴恩拉於其所著社會進化論曾說及(Harry Elmer Berner, Ph.D. The Evolution of the Great Society)是等國家，因為受天然的地理的保障，又不致過於隔絕，陷於完全孤立，阻礙外交文化的滲入，所以最古的文明，能够發生，人類在經營歷史生活中，不但要適應人類自身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的條件，同時要適應自然界的地理環境，在熱帶地方，因為太陽光線強烈，人類的皮膚，變成黑色，甚至純黑種。因此，人類便分出許多種族來。酷熱氣候之中，自然界生產之物，非常豐富，在那地方之人，

用不着勤苦的勞動，也就沒有促進他們精神能力發展的機會。在嚴寒氣候，如此冰洋一帶之中，自然界的產物，異常貧乏，他們努力於保存生命之外，沒有可以發展精神能力生產力的工夫。人類開發文化，正適合於溫和氣候之地，這等地方的自然界，既不過於豐富，使人類不致荒廢其勞働力量，生享其成；又不過於貧乏，使人類的努力，不致徒勞而無功；地面組織，構造山地，或平原河流豐富，海岸的遠近，動植物的多少，對於人類歷史文化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人類文化發展的速度和方向，開始之際，就自然界地理環境之支配，等到發展在地理條件限制之下，開始有一定的方向之後，則人類歷史文化之進程，就於自然的影響之外，還有自己的人工上的原因，都是人類在經營經濟生活中的生產力的進步，與社會生活中，各已成勢力和經驗的傳授，但是自然的地理環境，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也可說自然的直接影響於社會經濟，又由於社會經濟直接影響於各種文化的發展。（可參閱馬哲民著精神科學論六二頁陳著應動力論一四六頁）在自然的地理的環境當中，其一是氣候。氣候與文化的發展，是有重大的關係的。德國氣象學家亨尼（H. H. H.）謂氣候係有影響於動植物生活的各種氣象現象的總稱。人類是高等動物之一，他的生活，當然受氣候的影響的文化，是人類生活表現的形態，亦當然受氣候的影響。洛爾教授（Prof. Lull）說過：「變換了環境，可以刺激遲緩的進化之流，而使之迅速活動。其間之因果關係，無論什麼時候，可以連起來的，而氣候就是這普遍的一種直接影響。」（見商務版陳著書若氣候與文化之引

體，氣候與物質供給有關係，物質供給與文化有關係；當哥倫布未到美洲以前，在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與猶達(Utah)兩地居住的印第安人，和他們隣近住在新墨西哥的秘勃羅人(Pueblo)相比較而觀之。就可以明瞭住在加利福尼亞與猶達兩處的土人是很下等的野蠻的，他們住在很簡陋的草舍，所食是很鄙陋的食物，常為求食之故，東奔西逐，這樣孤單的游牧的生活，當然祇有極幼稚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但是秘勃羅人，因物質供給較優，終在於美洲土著中佔了最高的地位，尋究其中的原因。就是秘勃羅有適宜的氣候和雨量的緣故。古代文化發達的國家中，都是位於適宜的氣候，地帶適寒，如埃士忌摩人(Eskimo)所居的地方，他們為抵抗寒冷之故，已費了全部精神，試問尚有甚麼體力發展文化？予遊南太平洋各羣島如大溪地，紐經尼，亞包，加柄等埠。看見當地的土人，居於炎熱地帶中，天然產物足供飲食，用着振奮精神，發展文化，至今尚在梗塞襟懷的境地啊。其二、土壤。歷史上極普通之點，凡是古代偉大文化之起源，都是在肥沃的平原，在那地方中，用灌溉法經營農事，發展農業，如埃及，美索波達美亞，北印度和中國，都位於離赤道二十五年度的地方，幾千年來以相當的努力與同心協助，造成他比較完美的農業社會組織，與相當的文化。在西藏居住的人，地勢險峻，沒有合適的平原土壤耕種，所以人民性習頑固保守。如美國俄亥阿(Ohio)和法蘭西北部平原，都有深厚適耕的土壤，其農產都很富足，他們的文化進程，比之西藏自不可同日語。(可參閱商務版人生地理學原理及紐約 D. Appleton & Co 版穆勒(H. R. M.)

(三)著世界地理(International Geography)其三礦產。礦產與人生有重大關係，與文化的發展，也有重大的關係。地下礦藏有金屬的，有非金屬的，金銀鐵錫鉛煤錒等屬於第一類，石灰石和泥炭屬於第二類，各有各的用途，假若世界所有金銀，都行銷費，人類的活動，差不多沒有甚麼變化，若把鐵除去，人類的的生活狀況，便要比美洲初開闢時還要困難。以人類利用器物而分別他開展的時期，爲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人類知道鑄鐵之後就起一種根本變化，經過兩三千年的鐵器時代，鐵的用途，可以肅清森林，鋤破泥土，挖掘礦穴，建造鐵路汽船，以及各項機器。在近半世紀中，鐵的用途更廣，可說是達到鋼鐵的新時代，可以用鋼鐵的多少，而徵驗國家文化進展的程度。如美國于一九〇〇年鋼鐵的出產，增至一千萬噸，一九〇五年增至二千萬噸，一九一三年增至三千二百萬噸，一九一八年增至五千萬噸，其他沒有利用鋼鐵的國家，她的文化可與美國相比較麼？埃及巴勒斯登美索波達米希臘羅馬等國古代文明，和西歐美國的近代文明不同，其中種種原因，而關於日用的鐵量，也是其中的一端，近代現代的文明，和古代文明不同，就是因爲近代和現代，容易獲得鐵以及鑄鐵燃料的地方。英國自一六〇〇年以後，人民知道把煤變成焦炭，用以鑄鐵，美國，英格蘭，德意志，比利時，法蘭西等國，煤與鐵的豐富，這等國家，物質文化都有驚人的進步。中國的煤藏，只次於美國，但許多的煤，沒有開發，不知利用於機器的方面，所以物質文化，沒有多大的發展。河北省每年民家消耗的石灰百萬噸，是消耗於主要的燃料，

雖少有消耗于鑄鐵與製鐵的應用上，據此一端，就知道牠與文化的關係了。其四動植物。動植物的繁盛與否，與文化之盛衰，是有關係的，植物中如米，大產地如中國，印度，日本，使這等國家缺少米的供給，她的文化能够維持下去麼？產麥最多的地方，如北美合衆國，俄羅斯，加拿大，法蘭西等，使這等國家缺少麥的供給，她的文化能够有今日的興盛麼？世界產棉額最高者，如北美合衆國，印度，埃及，與中國；產絲最多者，如南歐羅馬諸國，日本，及中國；產森林最盛者，如北美合衆國，加拿大，瑞典，挪威，芬蘭，俄羅斯，德意志，奧大利，法蘭西等處；使這等國家，缺乏棉森林絲的供給，她的文化能够繼續進展麼？人類經營種植能力的表現，也是文化能力的表現，在世界熱帶許多的地方中，有白種的冒險家，開墾家，到去經營許多的農場，種植場，儘管地未開化的土人，仍自然供給以資生活，仍是原來的老樣子，他們要是能吃，此外之事，一概不管，若是一天，工作足夠三日食用，他們次日只做三分一的時間。試問這沒有經營種植能力的土人，能够發展他的文化麼？動物中如馬，被人豢養，最初是在東歐或西亞，馬的用途，大都爲人背車負貨，供人乘騎，澳洲美國以及歐洲許多地方，用馬耕田，亦復不少，歐洲的野牛，印度的犀牛，中國的黃牛，水牛。多用之於電犁耕種，及用於食料的供給；羊是畜類中數額最多的可供人類的食料和衣料，現在世界養羊最多的區域，如澳洲，美國西部，阿根廷，南非洲，紐西蘭等地，作大規模的羊羣放牧，以供世界羊手的需要；象可以負重，可以曳犁，可以載人；英國

在印度駐軍中，以象爲登陸軍備；二千年前，迦太基的軍隊，侵擾羅馬國土的時候，就知道用象作戰，試問以上許多國家中，沒有這等動物的供給，他的富力與文化，能够達到今日的程度麼？其五水陸交通。世界歷史之三大時期：（一）爲河流文明時代，如埃及之尼羅河流域，巴比倫之幼拉底河底格理斯河流域，印度之恒河與印度河流域，中國之黃河揚子江流域，文化的發展有三四千年之久，直到耶穌紀元初，她們的文化，已達到很高的程度，而周圍的民族，大部份尚是在半野蠻的部落。上述流域內，能够誕生人類文化，其中就是在共同調劑自然力量之外，（如尼羅河流域東西二面是山嶽，流域內的居民，從事農業，山邊居民，從採礦和製造業，在此不相同的天然條件，就有許多不同的經濟活動，促進居民向前發展。）尚藉河流爲交通之利器，以發展其智能才能。西方兩支文化（埃及與巴比倫，）因交通之便利，把他們的文化成績，傳授給地中海邊的人民，腓尼基人，希臘人，羅馬人，並且經過他們散布於全歐，至近世全部文明的民族，西方的兩支文化，因位置在地中海旁。航行不感困難，因此說使西方文化，由河流時代，轉到海洋時代的過渡階段。（二）地中海時代，人類歷史第二時期——地中海時代——腓尼基人，擴充殖民地於地中海沿岸，首先鞏固了海上貿易的霸權；古代希臘人的勢力基礎，也和腓尼基人一樣，建築於海上貿易，其後羅馬帝國統一了，佔有地中海四旁全部的領土，最終受了東方與北方野蠻民族的侵襲而崩潰，這些民族，在他遺址上，組織民族的國家，吸收了古代文明，所以在中世紀時，是

人類文化的中心區。自七世紀時，阿剌伯人，開始伸展勢力於地中海沿岸，曾統轄羅馬所屬的領土，由貿易的交通，直達印度南洋羣島與中國。H. C. Thomas 與 Harman 合著近代文化基礎有說：「貿易是把人從原始野蠻狀態，升到現在的文化境地的主要因素，貿易是把世界各處的人帶着互相接觸，使文化和科學，變成世界的，把歐洲從中世紀的昏睡中喚醒的，是貿易；導興文藝復興的是貿易，把歐洲人從茫茫大海中，送到世界不知到的地方去，帶着他們底語言習慣文明，以及物產，使歐洲的文化，變成大多數人類底文化的，也是貿易」（見漢譯一七三頁。）黃國璋於所著社會的地理基礎有說：「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昌通，多半是作靠他們的商務為立場，荷蘭位於萊因河口，便於海上貿易，所以他的實力，能及於世界許多部份。他如位居內地，像比利維亞與瑞士總國家，與海洋隔絕，他們在國外的勢力則是很少。就是一個位於海濱而海岸形勢不良，或是海岸長度有限的國家，他們的對外關係，也是要受限制。現南美洲和非洲許多的國家，與外界不大互通聲氣，文化仍是幼稚，缺少良好的海岸，實是一大原因。」（見一二五頁）交通便利，能發展商務。地中海能於中世紀時代，成為人類文化的中心區；是有賴於商務，而商務之發達，是有賴於交通。（三）大洋時代。世界歷史的第三時期，——海洋時代——海洋時代，自十五世紀後半葉開始，歐洲人欲發現到印度去的新航路以致致富。從前歐洲赴印度的舊路，經埃及由海路沿阿喇伯前進，或由旱路，經敘利亞美索波達米亞，與波斯而達印度，及為土耳其所截斷，就發見由海洋達印

度之通路。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四九八年瓦哥台加馬發現環繞非洲的航路，一五二一年麥哲倫周遊世界的航行成功，因這船路的發見，市場的擴充，殖民地的掠奪，商業與工業的發展，文化的吸收，交貨日益發達而世界遂改換舊觀了。現代世界的海上交通，商務日益繁盛，而文化也隨之日益進展，如上海，橫濱，孟買，倫敦，利物浦，漢堡，紐約，均是世界有名之大港，即是世界有數的海洋貿易文化中心；據民國十九年六月十二日中央日報所載，以上海十八年計海洋貿易而論，入港船隻共有二千六百八十六隻，從海外載入貨物九百八十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五噸，共值銀六萬二千四百六十四萬九千八百二十三海關兩，出港船隻二千二百七十隻。載往海外的貨物，九百十二萬二千六百五十六噸，共價銀一萬八千五百一十六萬九千四百六十海關兩；上海在中國現代的位置，成爲經濟的中心，文化的中心，就是這個緣故。陸路交通，關係於文化的發展，也是很重大的，人類發明車輛，爲運搬的工具，知道在軌道上運輸更爲便利，這是鐵道輪船始；自一八〇四年Trevithick 利用蒸汽機關車，一八二五年George Stephenson 改換林敦Lancaster 和斯拖免敦Stockton間的馬車鐵道，一八三〇年試行於孟却斯特與利物浦，自後逐漸發展。達到現在的情形，而人類文化，也隨此交通機關的發達而進展。世界的鐵道，若依地方分別而論，據一九二六年的統計，美國是四〇一，四〇三杆，德國是五八，〇八九杆，法國是四一，八一一杆，英國是三二，八一九杆，日本是二四，六八〇杆，中國是一二，〇二〇杆，鐵路交羅錯

延長數，須與領土面積和人口的密度，成正比例，換句話說：交通的延長數，與面積人口成正比例，則國家文化的開展，是成了正比例的。

英美德法，她的交通發達，她的文化，也隨交通的發達而發展。中國面積如是之廣，人口如是之密，而鐵路交通，祇有此數，可以徵驗現代文化發展的形態了。（其詳可參閱經濟地理學大綱一九六至二二二）。中國已成之國有鐵道，如滬杭浦，津浦、北甯、中東、瀋海，泗泲，打通，吉長，呼海，洮齊，洮熱，京包，平漢，正太，道清，瀋海。粵漢，株萍廣九等，其中北寧，中東，瀋海，泗泲，打通，吉長，呼海，洮齊，洮熱，（從洮南至熱河的承德）等鐵道，已入於日本侵略者之手，其他全國已開築鐵道地方，交通已比前發達。而鄰近地方文化，亦比較進步。非洲大陸的大部，即撒哈拉沙漠以南之地，及巨大的高原，都是交通不便之地，八十年來歐洲列強開始非洲的分割地，一八八〇至一八九〇年間，非洲大陸之半（五百萬平方哩）為歐洲列強所併吞，至十九世紀終，非洲乃分割殆盡，以後列強遂從事於鐵道的建設；非洲大陸內部，雖因此開通，而非洲民族失却地理環境之獨立基礎，淪為被征服者，更有何文化之可言呢？其大生產力之增加與國際之貿易發展。生產力之增加與國際之貿易發展，完全根據於地理環境。優勢，當他國國家在生產力能够增加，在國際貿易能够發展，而文化自然隨之發達，非洲至印度之航路發見，與新大陸之發見，世界貿易之範圍，隨之擴張，稱為商業的革命。商業革命之後，國際貿易，隨交

通之發達而發達，從前圍於一隅的文化區域，乃擴張為世界的文化區域；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的接觸，其動機全在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吉利等國東來貿易，一時西方文藝學術思想相由滲博之士的介紹，植基於中土，加特力教宗，自一五五二年傳布於中國，其後范麗安（*Galileani*）利馬竇（*Matteo Ricci*）羅利堅（*Michael Rugieri*）等，先以數學地理等科學之思想，灌輸士流，而湯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等（*Ferdinandus Verbiest*）推闡天文學與儀器，尤足光大本宗。自是而後，西方文化隨國際貿易而盛輸於於中邦。近代文化基礎一書論及貿易文化發展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對於歐洲人民生活影響有說：「貿易是引起那個十三世紀，到十六世紀間，發生一般的智力復興的工具，由貿易所引入的新物品與新工業，影響了全歐人民生活底式樣；貿易助成了農奴制度的崩潰；貿易消毀了基爾特，而把資本家引進了製造業；貿易產生了一個新的階級，——商人銀行家股票經紀者資本家——布爾喬亞，而注定了其為歐洲任何國家之統治階級；貿易發展了民族國家的情緒，增加了帝王底權力，而使今日所存在的民族國家，能以成立，貿易引起了殖民事業，而使歐洲文化，散布於全世界。」（見二〇九頁。）貿易何以能成就如許的偉大工作呢？是因為由貿易上可以交換兩地的文化思想學術和工具啊。中國民族散布於東亞大陸，據中部及東部的地理南起北緯十五度四十六分之土萊塘島（*Tilio*），北至五十三度五十分薩陽山脊，西起東經七十四度之烏仔別里山口，東至百三十五度之烏蘇里江黑龍江會口處。東西寬八千八百餘里，

南北長七千一百餘里。北及西北接俄屬西伯利亞，西界俄領中央亞細亞，東北界俄屬東海濱及朝鮮。東隔海與日本琉球羣島，及台灣島相望，南臨海南，西南界印度，緬甸，總面積約三千四百九十六萬六千餘方里，當亞洲面積四分之一，全世界陸地面積十五分之一，爲世界第三大國。計田圃面積一百九十萬一千八百餘方里，森林面積，六萬六千一百八十餘方里，採礦區面積，二十五萬七千八百餘方里。荒地面積，一百五十七萬二千一百餘方里。（見商版中國分省地誌一六頁），可說是天府的雄邦，此氣候以溫和的土地，物產礦物豐富的場所，本應成爲世界最文明的國家，即以水上交通而論。世界上沒有第二大河在交通上運輸上影響及人民之衆有勝過於楊子江的，此江本流和支流，合計共有能通船隻之航線，一萬一千一百六十一英里；又黃河流域，自石嘴子至包頭鎮一千二百英里，西江流域四千二百九十一英里，閩浙兩省之通流域一千一百六十二英里，河北省四百五十五英里，全國合計現有可通船隻之水道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九英里（除東三省四千六百六十八英里），這河道關係於水運交通及農業上的灌溉者甚大，（可參閱商務版中國年鑑一〇六至一〇七〇頁），可說是保持中國農業文化的台柱。但是中國民族根據這優美的地理環境，而與歐美的文化比較，望塵莫及，就是因中國民族沒有利用科學方法，開發他的富源富力，同時中國民族本身幾百年來受異族之專制束縛，把原有充實的力量剝削，文化成爲式微的景象了。歷史家考察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發生與增長，都在一定的地域，遂指此一定的地域，爲文化的搖籃，

(*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中國古代文化的發生與增長，是在黃河流域，黃河流域可稱中國古代文化的搖籃，但是中國文化的發生，並不在黃河本身，却在黃河的支流，因為支流，沒本身汎濫不定的緣故。黃河支流，一個是汾水流域，一個是涇水與渭水之間，汾水發源於管岑山脈，自北南流，至河津注入黃河，長凡千餘里，是黃河第一支流，這支流左近地方，是古代民族發展文化的根據地，如堯都平陽（即今臨汾縣），舜都蒲板（即今永濟縣），禹都安邑（即今安邑縣），從這幾代的都會看起來，就可以知道上古文化的發祥地，是在汾河下游。中國古代文化的第二發祥地，是在涇水與渭水之間，渭水發源於甘肅鳥鼠山，涇水發源於甘肅六盤山，流至咸陽，注入渭水，這兩條河，是自西向東流的，在這一帶地方，所謂關中的平原，沃野千里，古人稱為天府之國，在這很好自然環境中，自然可以發育民族的文化；這民族文化的創造者，是號稱八百年的周朝。南宋以後，清代以前，文化的搖籃，可說是在揚子江流域，（據朱君毅中國歷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說），揚子江有最長之水運交通，兩岸地方，適於農業的發展，在文化上當然有發展的根據地。現代文化的搖籃，可說是在珠江流域，珠江流域，因交通的方便，貿易的興盛，物產的富饒，氣候的溫和，東西文化接觸的頻繁，民族性質的顯著，可以為現代文化復興的基礎；但是依中國自然地理的環境，雖可以如此分別，若依世界自然地理的環境分別，中國現代文化的階段，可說是海洋文化時期。海洋文化時期，是指中國現代民族，能保障他自北至南的

海岸線，及沿海各地的通商口岸，能發展對於全世界的海上交通權與貿易權，能吸收東西洋各國的文化，能鞏固太平洋的地位而設；惟中國民族能做到這幾層，中國文化今後只有一天發展一天，這是中國民族現在應該注重的重大事件啊。

八、民族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的影響

每一個民族所創造的文化，除却自然地理環境之影響外有社會環境的影響。社會環境。是一個民族生存於社會中，爲了保障生存的地位，意志的向上發展，造成許多的物質工具，及社會制度宗教道德倫理風俗法律習慣等。這種就可說是社會環境，也可說是人爲環境，即是每一個民族在空間中，經過許多相互的工作，在時間中，經過許久的努力所成的環境，成爲一種文化勢力，影響於每一個人之思想行爲的。社會學家倍那特 (L.L. Bernard) 對於環境作如下之分析：(I) 物質的環境。如天象，氣候，地形，無機物，自然力等。(II) 生物或有機的環境如動植物生物的環境等。(III) 社會的環境，(1) 物質的社會環境，如器械工具等；(2) 生物的社會環境，(A) 非人類的如家庭，五穀，藥料等。(B) 人類的如奴隸，工匠，技師，兵隊等。(3) 心理的社會環境，如制度，風俗，信仰，輿論，語言等。(V) 綜合的環境，(1) 普遍性的，如政治，經濟，種族，美感，倫理，教育等。(2) 特殊性的，如人種，性別，宗教派別，思想派別等。倍氏所分析

的，亦有清濁不齊之虞。如綜合環境中，特殊性的，人類性別，可編入生物的社會環境方面，宗教派別，思想派別，可編入心理的社會環境方面。又生物環境中，如奴隸，工匠，技師，軍隊等，非天生而爲奴隸，工匠，技師，軍隊，實是社會制度所造成的；社會是人類造成的，社會環境，是人類集合的複雜勢力造成的。予在拙著中國文化復興之基本問題一書有說：「文化已開，人爲之力量常連成複雜的社會環境，這社會的環境是劣的，可以使文化的衰落；倘是優的，可以使文化的發展。初民的社會，是淺演的粗野的沉靜的怪誕的，所以牠的文化，也受影響而成爲淺演的粗野的沉靜的怪誕的文化。文明的社會，是活動的理智的科學的有生氣的，所以牠的文化也受影響，而成爲活動的理智的科學的有生氣的文化。在初民的社會裏，豈能產出拉馬克（法國博物學者）達爾文，斯賓塞爾，赫爾斯，海克爾（德國博物學家）之進化理論，克魯泡特金之互助學說，邁爾（德人 Robert Mayer）佳爾（英人 Daines Prescott Gould）之物質不滅說，湯姆生之電子說（英人 J. 勃蘭克（德人 Black）之原能說，愛因斯坦之相對論。在野蠻怪誕迷信的社會裏，豈能發明陰極線，X光線，週期律，電信機，分光鏡，消毒法，電報機。社會環境，即人爲創造已成的勢力，對於人類文化之發達，有重大的影響。倘使沒有這相當之複雜環境，斷難發生一種特殊的優異的文化。」（見暨南大學印行本二六頁）。民族文化在社會環境中，有重大的影響，民族在一個地方，嘗過共同的社會經驗，在許久的年代中，產生許多社會的成績，以成社會的環境促文化

的進步，Herbert Joseph 在所著民族論裏有說：「民族之興起，是因為環境，對這一羣的天資歷久的影響，構成民族的一羣人，必須在一個地方，經過共同的經驗，至少至數代之久，直至這些經驗，給予這一羣的集體的天資以影響，產生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換言之，產生一種特異文化。」（見劉君本譯民族論二二六頁。）各民族居住於他特殊的社會環境，以形成他們的實際生活與精神生活，由這等生活以形成民族的特性與特異的文化，誠有如哩茲教授所說：「民族是文化的現象，俄羅斯人，希臘人，德意志人，或日本人的標誌特性，不只是種族的附屬品，或地理的反映，他們是社會情況和文化環境的產物。」（見上書二二五頁）。由這說可以證明民族的文化與社會環境的關係了。人類文化演進的程序怎樣？十九世紀下半葉摩爾根（Morgan）有明白的解答，他身居美洲土人印第安民族中，從實際的觀察，著有太古社會一書（Ancient Society）分人類歷史為三大時代：（一）野蠻時代。（二）半開化時代。（三）文明時代。這樣分析如的確，那末，就可以為此理論的佐證了，野蠻時的初期，人們生活於樹上，以菓子樹根為食品，熱帶森林，為人類的原始居住，試問在這時代，不經過野蠻時代的中期而可以直接發明或創造野蠻時代的高期的弓箭木具手織物獨木舟木屋村落麼？又在半開化時代初期中，不經中期的時代，而能創造文明時代。工業與技術及種種機器，與生產力的偉大組織麼？文化之演進，常經過每一階段的轉變，因為在某一個階段中，有社會承接遺傳的環境勢力，漸發根柢，以次推進，不能越級超過而創造各種的文

明工具啊。予在人生問題一書文化演進與人生概念篇有說：「文化之發展有因於強度環境之刺激，強度之環境，每會支配人之思想，而人類思想所傾向之處，即爲文化發展也。周末時代，乃吾國思想界活動之時代也，論者謂平王東遷以後，中央集權破壞，而爲地方分權；封建制度瓦解，而爲英雄割據；是時諸侯競力於強兵富國之問題，故人才輩出，而文化乃以發展，一也。春秋戰國五百餘年，實爲競爭最烈之時代，而各個人間智力之奮鬥，激而爲言論之開放，思想之自由，而文化乃以發展，二也。……十六世紀法國之里昂派，成爲文化的中心，而勢力激射於巴黎之故，乃因里昂爲法國意大利之孔道，商業繁盛，而意大利人日耳曼人與法人雜居一處，其精神刺激而益強。日耳曼當十五世紀時代，古學甚盛，因當時有十五大學，而其間八大學均教希臘拉丁文，故也。」（見四五頁）。從上引證而觀；社會環境有如何已成的勢力，以促進人文的發展，就可以知道了。當歐洲還是過着野蠻的游牧部落的時候埃及的國土，已是古代文化繁榮的地方，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還未開始創建文明以前，埃及才智之士，已知曉自然的秘密和具有很豐富而有組織的社會生活，金字塔氣象的縱橫，已在紀元前數千年，表證牠偉大的藝術技藝了。但爲甚麼近千數百年間，延至現代，遂歷了黑暗的時代、今日的埃及人，已不能盛誇他遠祖所創造的優美的文明，因爲當他沉淪的千數百年間，埃及已爲許多不同種族參入，改換他原有的社會環境。（七世紀時，阿喇伯人征服埃及，阿喇伯的語言和宗教，便通行於埃及。）經過近千數百年間，爲異族所統治的

期，埃及在幾千年歷史上，原有的文化，已漸墜毀了。到及現代，埃及所謂民族主義運動，雖然自歐戰以後，頗爲活動，但因埃及人口十分之九，是無智無識的農民，他們的文化，在開化的人埃，可算是最低的，現在英國政府，和埃及民衆運動的領袖，以四十年的努力，不能救濟這文盲的趨勢，（人口中男子有百分之九十二不識字，女子有百分之九十九。）可知社會教育的環境不良，和文化是有直接的影響的。美利堅民族在美國文化上的發展，可說是植基於社會環境的陶成；美國在政治上，完成大總統的大業，在美國學校愛國和服從國家的訓練，是甚注重的一，有許多民族，移居於美國領土，因經濟的商業的生活的教育的機構，感到利害之共同意見的一致，成爲同具的一種特性，所以在外國移美許多歸化的美國人中，不致搖動她根本觀念和政治原則，在哲學道德觀念藝術發展文學音樂等，都受得民族文化薰陶的影響（其詳可參閱 A. M. Jou, "The American People" vol. II, P. 22.）。一個民族能維持高級的文明，有一部分是要靠在社會環境的力量。在文化越發達的國家，這種力量，也越發大，如果個人離却社會，或離却高級的文化社會，會變成低下的生活，比斯治 (Schuch) 曾引一段故事說：「一五四〇年 De Sotos 同他幾個同伴航行美國，到南岸上陸不知如何，忽然斷了歐洲本國方面的接濟，他們的馬死了，火鎗因爲沒有火藥，也失了用處，刀劍乃鏽壞了，衣服靴鞋都穿破了，以後有人看見他們，穿着印第安土人的裝束，用印第安土人的武器」。（見商務版譯本社會進化史四〇頁）這些文明人，何以會墮落到野蠻的情

形呢？就是失却原有文明的社會環境的緣故。據此可見社會環境轉移的勢力了。人類精神文化生活可分爲三種。即論理的倫理的與審美的三種，即是科學道德與美術三項，從這三方面中，可以看見各個民族中在文化發展的階段，倘社會進展，這三方面可以完成牠優美的社會環境，以促進各個人在文化上的創造事業。歐美社會的環境，如工商業之發達，都市的繁華，教育之改進，農田水利之改良，彫刻建築之精美，交通機關之發達，科學實驗室圖書館之完備，皆足以喚起個人之好奇與研究心。以促進文化事業之發展。中國文化，向來趨重於哲學倫理文學政治禮教等，故中國社會的環境，所培育人才，多傾向於此，而對於科學的工業的文化，是缺少的。因此，中國近代文化，與現代文化，缺少科學性的工業性的文化，我們知道社會環境，可以由人爲的力量造成之改變之；中國的歷來文化，雖然是缺少歐美科學的工業的文化，但繼今以往，能吸收歐美科學的工業的文化，改造之成爲固有的文化，則中國的文化，自然可以產生科學的工業的文化。中國近代自與歐美交通和貿易以來，可說是對於歐美的文化，覺得有吸收之必要，同時也感覺到自己原有的文化之不如人，有急起直追的傾向。清代末年，以平日守舊如劉坤一張之洞等，也上變法之奏摺，在他們變法事宜疏中，籌議四條，主張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科，獎勵實學；在教育制度中，主張學詳細地圖，精深算法，航海使船法，於天文學物理學化學電學力學光學軍事學機械學醫農工學測量學，皆當精究，同時注重譯書與派遣留學。咸豐中李善蘭，客於上海，

與英人艾約瑟等，譯述重學幾何學等書。同治初，總理衙門，設同文館，並設印書處，以印翻譯的書籍。李鴻章建方言館於上海，教西文西學，以譯書爲學者畢業之證。容闕留美回國時辦了機器回來，李鴻章將原有機器合併，辦成江南製造局，加以學人在上海所立的廣學會，格致書院，又從旁贊助譯述，譯出之書，存在清末所刊的西學大成，富強叢書，格致彙編，格物人門，格致啓蒙，西學啓蒙等叢刊，考之已達二百餘種。這種種，吸收歐美文化運動，可說是風起雲湧；爲什麼到現在中國文化，仍然落後，仍然趕不到歐美的後塵呢？尋覓其中的原因是：（甲）這種文化運動，只是在少數的上流階段回旋，沒有普及到全體的社會去。（乙）這種文化運動，因教育之沒有普及，而阻礙發展的路向。（丙）學習歐美學藝的皮毛，而沒有探到精深的境地。（丁）清代末年，因政治經濟狀況的不良，無力加以推廣。（戊）參加這種文化運動的分子，以歐美學藝爲獵取功名的工具，目的已達，工作停頓。其此數因，所以沒有造成社會環境的普遍勢力，而促進現代文化的發展，和歐美文化作駕齊驅啊。

（九）中國民族的復興運動與現代文化的影響

中國民族，本來是世界，優秀民族之一，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本來也有相當的位置，到及元代清代，因爲經過兩次的大亡國，受異族種姓之壓迫束縛，和原來優異之民族氣質損毀，將

國有優異的文化蹂躪，百年來，加以歐美帝國主義者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侵襲勢力，中國民族，一天危險一天，中國文化一天衰落一天，這種趨勢，不能挽回，中國的隱憂，是不能解除的；我的斷案是：民族復興了，然後文化可以復興，倘使一個民族受其他民族種種的壓迫束縛，民族自身生存的地位，尚不能達到，有甚麼機會，有甚麼力量，可以發展文化呢？意大利民族主義運動，可說是從拿破崙時代發生的，拿破崙帝國失敗之後，奧大利的梅特涅，繼續拿破崙而統治意大利，其後瑪志尼，加里波的等，爲意大利民族統一而運動成功，以後意大利國勢，遂蒸蒸日上，而文化隨之發展。德意志爲拿破崙蹂躪之時，民族散漫，國家沒有統一，及拿破崙推倒之後，經哥德(Goethe)施拉(Schiller)馬申(Lessing)海涅(Heine)康德(Kant)貝塞(Bach)必士芬(Beethoven)等，鼓吹民族之統一一意識，使散漫之德意志，歸於完整，其後德意志的文化，乃發達如日中天。我們看戰前德意志人所提倡的大日耳曼主義之目的，是想聯合散在各國的日耳曼人，在一個共同政府之下，促進日耳曼人，對於民族的感覺，及文化的親切，乃因歐戰的挫敗，把這種運動的企圖妨礙了。戰前之士拉夫民族，爲了士拉夫主義而運動，也是含着這個目的的，但居在俄羅斯外之士拉夫，不願受俄羅斯的指揮。得不到民衆的援助，沒有完成，且因戰後捷克斯洛夫，波蘭，及巨哥斯拉夫等國家的建立，使這個觀感受妨礙了。大英吉利的運動，是主張世界說英語的人聯合起來。這個聯合，是以英美爲本位，以牠的經濟富源和文化之優越地位，支配全世界。一八

九八年五月英國政治家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主張英美聯盟。一九一三年萊佐治（Lloyd George）於美國旅行中，鼓吹英美了解，進而維持世界的和平，其用心何在，可以知了。大拉丁美洲，主張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的親密合作，以恢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拉丁美洲企圖政治的聯邦，成就文化的同盟，這種運動，是對美國的威脅而發的。近百年來有色人種之自覺，表示大亞非利加運動，在世界上約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黑人，差不多受全部白人的統制，黑人提出亞非利加爲亞非利加人之亞非利加口號，鼓吹世界各部的黑人，回到故鄉去，做復興運動，以排斥白人的統制，建立國家的形式與文化，他們覺得在文化上素來沒有根據，所以在一九二四年的年會中，認定上帝是黑種人的理想的創造者，並發見黑人的耶穌畫像，及黑色女人的馬利亞畫像，他們這種運動有成功的希望麼？我以爲黑人如不能先從事於民族復興的運動，排斥白人的統制勢力，或爭到平等地位，這種運動是沒有成功的。在美國西方文化發展最高的白人社會裏，難處了許多文化不同和文化低下的黑人，美國人是不承認黑人的社會是不平等的，常有不准黑人同住旅館，同進一戲院，同坐一火車的事實，在經濟方面，不能加入各種職業組合，不得自由遷居他處，不易覓得相當職業，在這種情勢下，民族不能復興，能達到文化的發展麼？（可參閱美國Raymond L. Buell著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一書。）英國干涉印度之政治組織，始於一八五八年，到一八七六年後，遂改印度爲印度帝國。自後英國遂施以榨取壓的政策，譬如干涉印度人的

結婚，須納重稅，加重各種租稅；又屢次發生屠殺案，自英國統制印度以後，教育雖然萌芽漸興，但印度的教育，是殖民地的教育，印度教育制度，爲馬考尼（Macaulay）所規劃，是想民的教育，是想將印度的思想，爲英人所同化的教育，英人禁止印人學習本國文字，只准研究英文，想藉此消滅印度原有的文化，而消除他們的愛國心。近年來印度民族漸漸覺悟了，他們對於英國的商業政策，教育政策，法律制度，由懷疑而加以反對。在歐洲大戰以後，轟傳世界的不合作運動，也在甘地指導之下而勃發了，接續代表民族運動的自治黨，也應時而起，但到底爲英國之妥協政策所軟化，試問印度以四十五種不同之人種，一百七十種相異之語言，二千四百種之族別，這複雜異常的民族，不完成他復興運動，能夠對於印度原有的文化光大發揚麼？朝鮮於一九〇年李完用簽字後而亡其國，日本併朝鮮，設立總督府，設立軍隊和警察，設警務局，壓迫監視朝鮮人民，爲嚴防朝鮮之反抗，立出許多森嚴的法律，除了警察處罰令八十餘條之外，又有保安規則數十條，以蹂躪朝鮮的人權；有東洋拓殖株式會社，以剝削朝鮮的經濟；朝鮮民族，苦不勝言。還有獨立協會，興國協會，青年敢死團，西北學會，保安會等，以爲民族復興的運動，結果日本用殘暴的勢力壓迫下去；試問朝鮮民族，沒有完成他復興的運動，能夠發展他的文化麼？英人自以武力干涉安南後，至今七十餘年，法人對於安南人，慳吝榨取剝削，關於教育安南人，並無注意，如東京人口約六百萬，其中僅八千人，得有入學機會，安南人口超過五百萬，而受女子小學

教育者 僅二百三十二人，（見劉玄海著近世大國家主義二二十頁），自日俄戰後，安南獨立運動，開始萌芽，如梁玉狷在一九一七年的阮泰起義，一九一三年范鴻泰在廣州沙面謀炸安南總督，一九二五年，西貢兵工廠工人罷工，一九二六年安南革命黨人成立安南民族獨立黨，和法人也極力壓抑安南之革命運動，試問安南民族獨立，沒有成功，他的教育，能够普及，他的文化，能够發達麼？中國陷於次殖民地地位，中國民族受列強的壓迫，至今已到於危險萬分之境，與印度朝鮮安南備受同樣慘狀的國家比較，在百步五十步之間；加以日本強暴之師，西侵中國，民族獨立運動，受極大的打擊，一國具有數千年文化的國家，能否保存他過去光榮的歷史，是在民族之獨立復興運動，能成功與否有斷。倘使中國民族以後沒有將列強壓迫的勢力掃除，沒有對日本侵略的暴力消滅，中國民族一天危險一天，中國文化一天墜落一天，這畢竟一般堅固的定律，不可逃避的，然而中國民族如何復興，是要注意幾個條件：（甲）中國民族本身組織要統一。孫中山先生曾主張以漢族為中心，將滯留回藏，同於漢族，成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以整個中華民族的團結組織力量，保障其生存地位，（見民國十三年二月六日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辦事處演講），假使民族本身，沒有統一的組織，必然沒有共同的政府，共同的理想，而民族同類的自覺心，也當然沒有發達，如此，何以能達到民族復興呢？倘中國民族，常因內部小小問題，自相爭鬥起來，常因區域不同，而劃分種種界限，中國民族，能否成立尚成問題，豈能談到復興文化麼？

(乙)中國民族要有自信的力量。中國民族現在地位，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已成感覺到緊急的關頭，許多人以現在實業之不振，教育之不良，與沒有普及，社會之紀律，人心之渙散，農村生產之破壞，經濟地位之低落，遂感到中國民族復興沒有希望了，這消極的觀念，是無補時艱的；中國民族如要具有自信的力量，不論經何種困苦，都會有復興的希望，在歷史上中國民族經過兩次的亡國，受異族的統治，前後幾及四百年，但到底能够復興起來，現在民族的地位，已有式微的景象了！這種民族的自信力不要失掉才好。瑞士歷史學者 Fustel 有說：「假使中國的種族要想真正的獨立，當然其種族都不應該倚賴，都不應該藉重。」（見中山大學版拙著民族主義與人口問題一書二六頁。）換句來說，中國民族不要失掉自信力，倚賴他人。而發奮自強，然後可達到真正的獨立啊。（丙）中國民族要有戰鬥的力量。民族的戰鬥力量，是民族為正義而自衛的力量，一個民族沒有這種力量的。是很難生存於世界，土耳其大戰以後，是一個很衰弱的國家，一九二〇年與協約國簽訂綏佛爾斯 (Sèvres) 條約，所有土耳其的領土，差不多分割淨盡，在敘利亞駐有法軍，斯密拿駝有希臘軍，米梳波達米亞駐有英軍，土耳其國勢危險萬分，當那時候，有凱末爾將軍，在埃爾斯崙整軍經武，與希臘重苦戰三年之久，遂打败希臘，進駐君士但丁堡之協約軍隊，也同時撤退；土耳其因為有了戰鬥的力量，所以民族能够復興，而努力於文化教育普及。中國民族受帝國主義者的環攻，要有這戰鬥的自衛力量，而後有獨立的希望，文化復興

的可能，日本民族以武士道之精神立國，美國康多莫伯尼（Corodore perry）一八五四年統帶艦隊到日本，強迫牠打開門戶，卒能將美國的勢力掃去，以後恢復王權，整頓內政，最後一代將軍（Shoguns）辭職，藩土（Daimios）也拋棄他們的特別利權，許多有遠大眼光的青年，如伊藤博文等，到歐洲吸收西方的文化，回國後建設他們稱種的新制度。一八九〇年，開第一屆國會於東京，一八九四年，把治外法權廢除，繼此之後，文化遂一天發展一天，可見民族能復興獨立起，然後可以發展文化啊。中國民族，本身要有統一的組織，在民族復興上要有自信力，戰鬥力，然後可完成獨立的事功，而恢復中國原有的文化，發展現代的文化啊。

（十）中國民族今後的文化運動與世界未來的文化

中國民族，必先從事於民族復興，而後現代的文化，有提高和發展的可言。同時民族也要致力於文化的復興運動，而後民族生機，有滋長繁榮的可據，中國現代文化，依原有文化的特質，而參雜於現代西洋文化的特質的。西洋文化有所長，也有所短，吸收西洋優長的文化，而補助中國文化之所短，這是今後中國文化運動的步驟，同時以中國原有的優長的文化，參雜於西洋優長的文化，產生更為優異的新文化，在世界未來的文化史中，為其重要的台柱，這是今後中國文化運動的目的。方今中國雖曾在轉變期中，中國民族，也在轉變期中，由這種轉變，引起中國文化有

標準有目的之運動，以改換中國社會民族衰頹沉靡的動向，而後前途有生活的新希望。美國 H. C. Storing 在其所著社會變動論曾說及：「一個必須善於應變，以使他適合於各著社會階層，因此在變動社會的人中，即引起心理緊張之增加。」我以為不但個人要如此，全民族也要適合這變動的軌軌，致力於正當的共同的目的，而後文化由運動以達到發展的希望。予在海外旅途中，看見英荷國屬的馬來人，南太平洋羣島各埠的土人，檀香山的加拿人，紐絲崙的摩里人，澳洲的土人，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他們的社會民族，已變成靜態的頹廢的現象，受自然力與人爲力的束縛，已動彈不得，試問他們還有甚麼文化運動的生活呢？文化運動，是趨向於一個完美的目的，是繼續一個更大的更長的有機演化，爲那個有機演化的一部分，在靜態的社會裏，還有許多人將所有的精力，都消磨在飲食結婚生育家庭上，想不到文化的運動，（可參閱德國 F. Müller-Lyer 著社會進化史漢譯本三四五頁），文化沒有運動，或運動沒有緊張的趨勢，文化是沒有提高的可言，依德國 F. Müller-Lyer 在社會進化史說：「按工作組織文明國民可分爲以下三類：（甲）低級文明級，如現在中國人，還沒脫出純粹上業的組織；（乙）中級文明級，已到資本組織的初期；（丙）高級文明級，此時資本組織，已大發展，已到了機械時代與女子的分工。」依這國分類，中國現在的文明，是在低級的文明級，那麼中國想提高現代的文化，不經多少努力奮鬥的運動，是不可能的。從各文化時代的年齡比較，我們可以說明現代的文化運動，其發展的趨勢，是爲速率的，哲學家康德

主張文化時代越進越短。每次進步速度越快，進步更引起進步。文化的集結，不是按時間作正比例的，但是集聚的速率，逐漸的繼續增加。這個理論從歷史上證明是不錯的；過去三十年間的進步，比較以前一百年的進步更大，而以前一百年的進步，比以前五百年的進步更大，歷史學者分世界史的年代，也可證明這個理論是不錯的。歷史家所分別的年代如下：（一）古代期間約五千年；（二）中世紀的期間約一千年，（三）新時代的期間約三百五十年，（四）現代的期間約只一百二十年。從這看來，文化的時代越早，它的期間也是越長。（可參閱上書三六五頁。）在日本五十年來的文化進步，其速率也是很快的。中國最好三十年來文化進步，比較以前一百年間的進步更大。文化不是單方面的，是多方面交相錯綜的複合體，文化中有工具衣服房屋美術家庭生活財產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文藝，以及科學知識的進展，凡茲種種，在最近三十年，可說是有進步的，這種運動，隨三十年來革命運動而併進的。中國文化運動的動向，可說是經過文學革命運動而加緊其速率；文學革命運動，最重要的是思想知識，由白話文學的推廣，而普及於一般下層民衆，使知識思想，不爲上流社會的事有物，倘使文化，祇爲少數人或貴族所享受，而沒有普及到一般的民衆，這不是真正的文化。文學爲文化精神的一種表現，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化精神，蘊蓄於國民的思想，國民的思想，多寄托於文學的意識，所以文學意識的改革，也可以促文化運動的緊張。胡適等在文學改革運動上，有相當的努力，他從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觀，以推測中國文

學運動的傾向，文學之採用白話，的確是將文化普及於一般民衆的工具。歐洲各國十六世紀以前寫的讀的，都是拉丁文，後來學問的內容複雜了，文化的範圍擴張了，沒有許多時間來摹仿古人的話，漸漸都用本國文，他們的中學校，本來用希臘文拉丁文，作主要科目的，後來創設了一種中學，不用希臘文，後來又創設了一種中學，不用拉丁文，可見文化的提高，採用容易了解的文字，以普及一般民衆之知識思想，是很重要的。國民思想的改革，同文化運動，也是有關係的，現代歐美主動的文明，傳播中國來，歐美的工業經濟金融的勢力，壓迫中國來，中國受了這外力推進的鼓盪，社會組織，起了變動，倫理基礎有了搖撼，因此，思想解放言論趨新，而各種變動，好像奇花怒放，有新穎光明的現象，而舊來的禮教習俗，乃不復拘束國民的心理，思想經此次解放以後，而新文化乃有瀾漫全國之勢了。五四運動（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為愛國的運動，也可說是文化運動的前驅，因為那時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中國，北京的學生激於愛國的熱忱，舉行示威運動，接着而有一五卅一事件，全國影響，由此運動打破中國沈悶的空氣，喚起一般青年，對於時代思潮的接受，提倡各種新文化的刊物，如雨後春筍，上海出版之星期評論，建設雜誌，少年中國，解放與改造，北京晨報的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時事新報的學燈，對於學術思想，都有頗大的貢獻。同時全國思想界，對於社會改造的思想，旁採兼收，急不暇擇，如：（一）安納其（Anarchism）主義，中國之主張此主義者，以吳稚暉爭石曾為最早，此派

思想。多根據於克魯包特金 (Kropotkin) 布魯東 (Proudhon) 的著作，(二) 基爾特威爾 (Kierkegaard) 和 Socialism) 此派以張東蓀郭夢良爲中堅，對於社會改革，主張漸進，不主張急進；(三) 共產主義，此派信仰馬克斯 (Karl Marx) 學說，表同情於勞農俄國，以李大釗陳獨秀諸人爲首領；(四) 好政府主義，民國十一年五月蔡元培胡適等十餘人，在努力週報，發表所謂好政府主義，好以人加入政治運動，而推進政治，同時主張真正的聯省自治；(五) 三民主義，以民族民權民生爲三個主義，對於民族方面以達到民族的完全獨立爲目的；對於民權方面，以實現五權憲法，劃分職能，達到全民政治爲目的；對於民生方面，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爲原則，達到社會共同福利爲目的。這五派隨新文化運動的奔流，而增其機勢；惟以一二三四派，以不適合於革命的需要，社會的要求，不爲國民所信仰，遂孤立而不能張其軍；惟三民主義，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適合於社會的實際要求與革命的需要，遂隨年來文化運動的高潮而邁進，可是三民主義不能完全實現，則革命運動，不能算完成，革命運動不能完成，不可不緊張文化運動的力量，以促革命運動的完成。緊張文化運動的力量，當採用何種方法呢？(甲) 教育的普及。各國教育，沒有普及大多數的民衆，祇少數的上流階級，享受教育利益，則文化運動，沒有廣遍的勢力。歐美列強的文化發達，完全是教育普及的結果。普法之役，德國打败了法國，是歸功於小學教育。英國自一七八〇年以後，將教育極力普及，國勢更加發達。新興的土耳其，革命後的俄羅斯，也時以全力振興

教育爲要着。中國三十年來提倡教育，但是教育沒有普及一般民衆。所以沒有長足的進步，因此文化運動，不能有多大的效力。今後中國文化運動不可不以實力普及教育，否則以百分之九十文盲的大多數人民，不識不知，何以爲文化運動呢。（乙）學術的提高。中國今後的文化運動，當以學術的提高爲標準，學術的提高，當以科學的精究爲標準。我國文化學術之所以落後者，全在於科學的幼稚，因爲科學幼稚，關於科學的創造發明，甚少貢獻於世界，關於科學的著述，亦甚少見稱於世界。據美國麥美倫調查公司最近出版統計，於一萬六千餘種書籍中，屬於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者，有四千餘種，約佔全數百分之二十五；日本東京出版協會，最近出版統計，於八千餘種書籍中，其屬於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者，有二千餘種，亦約佔全數百分之二十五；我國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統計，在八千餘種書籍中，其屬於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者，約千餘種，佔全數約百分之十二，雖不能以一家出版業代表全國，然亦可以推知梗概。我國出版事業的貧乏，與科學書籍的缺少，足以證我國文化的幼稚，所以今後文化運動，當以提高學術爲標準，而對於出版事業當增加科學的書籍。欲達斯目的，國家宜設立大規模的科學實驗室，大規模之化學工場，博物院，美術院，國家學會，國家學會，國家編譯局，國營印刷局，地質學生物學各種研究會，統由國家負責經營。試問全國之大，有一文化機關，可以比倫敦之博物館，巴黎之美術館，柏林之圖書館沒有呢我國應發展國家原有優良的文化，如歷史館，美術館，文藝館之類，同時也應極力提倡採取西洋

的文化，如科學館研究院之類。從此融會東西洋的文化，而樹立未來新文化的精神與價值。民族主義第四講有說：「說到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二百多年的事，在數百年以前，歐洲還不及中國，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西洋文化之所長，是物質的科學，然而西洋根據物質科學的優長文化，參雜於資本主義的氣質，結成帝國主義的新花樣，遂改變牠的文化精神與價值，何以故呢？因為變態的帝國主義文化，非和平的，非正義的，非人道的，非自由平等的，非博愛的，故牠的文化，不能與世界的進化有關，人類的生存有關，社會的安全幸福有關。牠因為具有戰爭性征服性掠奪性破壞性的變態文化氣質，對於世界人類的貢獻，祇有悲慘的悲傷的殘毀的掠奪的影像，歐洲的大戰，日本的侵擾，就是受這種文化變態的播盪，世界未來大戰的準備，就是受這種文化備眠的朕兆。中國今後的文化運動，是採取西洋又的所長，而放棄西洋文化的所短，換句話說：是採取西洋科學的文化而放棄西洋變態的文化，就是將來世界的文化，於人類共存的基礎上，發揮正義的人道的和平的文化，不然，世界未來的文化，惟有趨毀滅之路，而不可以挽救。中國幾千年來是重王道輕文化，精神的文化，使能加上西洋征服自然的科學文化，放棄其頹廢的文化，將來於世界的新文化，必有偉大的貢獻，而中華民族在未來的歷史上，必能發現光榮的時代，中西文化的融合，必可以滿足人類的慾望，必可以完滿人類的幸福，必可以慰安人類的心性，必可以實現人類進化的期

望。單向前者努力，則不能自立於生存競爭之場，單向後者努力，則人將成為物質的桎梏，必羣斯二者，真正的人間生活始發現其光輝。（可參閱早稻田大學教授北聆吉論東西文化之融合一文民國七年七月官治季刊東西重明根本之異點引證）。予於人生問題文化演進與人生概念篇有說：「欲使今後世界人類文化的價值，得以確定，則其所宜指定之標準有數點如下，（甲）除去非人的文化，創造人本的文化，（乙）排去貴族的文化，實現羣衆的文化。（丙）創造主動的文化，除去被動的文化。」（丁）除去局部不良的文化，創造世界的文化，在（丁）項一節有說：「所謂除去局部不良的文化，而創造世界文化者何耶？局部之文化，一國之一民族的具有之文化也，各局部有其自有之文化，隨其歷史之迹象以遷化，未必同者，然以各局部有不良文化之薰陶，而世界各國軍各民族乃由此而多事矣。世界殺伐怨欲之事所由興，乃各國民衆受其局部不良的文化，而表現其歧異之特性，由此歧異之特性，而爲排斥嫉忌侵掠戰爭之行爲，故欲保障世界各局部良善之文化而不毀滅，宜創造世界的文化。世界的文化，消除東西文化之界限者也，破除人類各民族間之殺伐心者也。世界的文化未有實現，則世界之戰爭侵掠，未有停止；創造世界的文化，即是提倡愛的文化；提倡愛的文化，則凡世界國家之一民族的文化：其與此愛的文化相衝突者宜消除之，一也。提倡美的文化，提倡美的文化，則凡一國家之一民族的文化，其與此美的文化相衝突者宜消除之，二也。提倡真的文化；提倡真的文化，則凡一國家之一民族的文化，其與此真的文化相衝突者宜消除之，三也。」

之，三也。其二設立國際文化院，此國際文化院，網羅世界文化之所長，而創造 世界優美之文化，爲世界各局部文化的標準，使共同努力於人類之幸福，世界的和平，能達斯目的，即世界文化收功之日也。『見泰東版四六六頁』。世界的文化：非國家的文化，是超國家的文化；非戰爭的文化是和平的文化；非對抗的文化，是互助的文化；非卑下的文化，是高尚的文化；非肉慾的文化，是理性的文化；非迷信的文化，是科學的文化；非侵略的文化，是友愛的文化；非寂滅的文化，是生命的文化。今後中國文化運動，當以此爲標準，世界未來的文化，當以此爲歸宿。中國民族能夠達到復興和獨立，而後可從事於世界文化的運動；倘中國民族爲他國民族所侵略而失却他獨立的機能，甚或不得到生存的地位，中國民族，惟有 天消滅一天，中國文化，唯有一天墮落一天，那裏能談到世界文化的創造呢！一九一六年九月八日美德加夫教授（Professor Maynard W. Metcalf）曾在奧柏林（Oberlin）爲中國留美學生會演說科學與現代文明一題。論及中國之將來有說：『設有一民族于世界最終之民族中，能占一大部者，其惟中國人乎？其數量之衆，忍苦之強，愛重和平之切，人格品性之堅，智力之優，與夫應其最高道德觀念之能力，皆足以證其民族至少亦爲最終民族之要素。但彼等究與啓發不來最終民族生息於其下之文明型式，以若何之影響乎？中國其將於智於德有所貢獻於世界，亦如其數量乎，此殆全視彼善導其發育於今古環境之新境遇下之成功何如耳。』中國民族現在雖然處衰弱的環境下，但其本一的潛勢力，是不可侮的；中

國民族，爲其本身之生存獨立，不可不努力于復興運動，同時也不可不努力於文化之復興運動，二者成功而後有所貢獻於世界未來的文化啊。

中國文化，原來在世界上是有位置的，是有許多貢獻的，然而古來尚存優良的文化，能否保存呢？現代的文化能否發展的呢？是在於文化不要停滯，不要靜止，不要衰落以爲斷。換句說：中國的文化要適合於歷史的進化法則啊。適合於歷史的進化法，要注重兩個最重要的條件，一是經濟的條件，一是民族的條件，前者是物質的條件，後者是生理心理的條件，經濟衰落凋殘；民族萎靡不振，危亡之禍迫在目前，又安可復興古來優美的文化，發展現代的文化呢？德國克士爾林 Haymann Keyssling 稱許東方印度的文化，他以爲印度熱帶的生活力，是最豐富的，在青天白日之下，各種植物的生長，特別顯出一種偉大的力量，印度古代婆羅門教的純粹精神的形而上學，深入一切印度民族靈魂的文化尤爲他所讚賞云云。克氏當知印度民族被重重壓迫之下，得不到真正的自治自由，在民困財盡破衣租布生活之下，得不到真正的經濟解放；印度文化，可見稱於世界者，是否真能滿足人類正當的精神的需要呢？所以我們論及中國文化演進動向，是不可不根據這歷史重要的先決條件所謂經濟復興與民族復興啊。

第三章 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

社會的生活，推動社會的文化。同時社會的文化，也推動社會的生活；互相爲因，互相爲果。一般科學的社會思想家以爲社會的上層構造，如宗教法律政治道德文藝，是賴藉於社會的經濟構造。但是經濟的構造，是否如自然的構造，而不加於人爲的意志能力呢？經濟的基礎，是否如自然的堆積，而不加於人力的支配呢？社會的生活，雖然可以決定人類的意識，但是人類的意識，也可以推動人類社會生活，這是我對於社會文化演進的一個斷案。馬克斯關於唯物史觀所據的公式，「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人類的的生活，倒是社會的生活，決定人類的意識。」倘若根據局部的來觀察歷史，是可以如此說法的；若根據全部的來觀察歷史，是不可以如此說法的。何以故呢？人類的社會演進，是自然而然的演進，不加以人爲的力量鼓動麼？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社會的經濟構造，是自然而然，不加以人類意識的推進麼？社會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是自然而然，不加以人類意志能力的發展麼？社會經濟基礎，所生出來的變化，可以使使巨大的上層構造徐徐或急劇地推翻；其變化其推翻，是自然而然，人類竟如木偶，不加以絲毫的力量，以促其變化或推翻麼？假定人類的的生活，人類的社會文化，不是人類的意識思想參

加其中，則人類社會的生活與文化，必由這個決定的已成勢力，成爲板滯的固定的寂靜的現象，則上古時代的文化，必永遠停頓於上古時代的文化中；中古時代的文化，必永遠停頓於中古時代的文化中；假定社會的生活，決定人類的意識，人類的意識，不能推動人類的生活，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占來東洋西洋的社會生活與文化，亦可以同一模型而取其同一的途徑，而不致有所歧分；今日我們所見的機器電話自動機鐵路等等，非古代的人民所能預見，豈這種種物質的文明生活不加以人類的意識思想以探討發明麼？（可參閱Roscoe Lewis Shiley 所著 *Early European Civilization* 緒論）社會的生活和物質經濟的形態，可以影響到人類的意識思想，人類意識思想，受這種種印象，每每不以目前社會的生活及物質經濟形態爲滿足，所以在社會的集團裏，用個人的力量及羣衆的力量改進之。A. Small 在 *Encyclopedia American*. Vol. 25. p. 208; *Origin of Sociology* 曾論及：『人類生活與文化，統於集團環境內以實現其發展』。就是這個意思了。我們知道人類的生活與文化何以能在集團環境內以實現其發展？這就是要靠社會環境各種周遭的事情以刺激人類的意識，同是以人類的意識，以促進社會文化的發展。但社會的生活，是完全決定人類的意識，而不靠人類的意識主動的決定，則人類的文明史文化史，當遠溯於數百萬年以前，蓋數百萬年以前人類的社會生活需要，雖殊數百萬年以後。當知人類的文明史進化史，其開始發展，不過最近的幾千年來的事，這幾千年來文化的繼續發展，是要靠人類不斷的努力與探討。而且

人類的文明史進化史其迅速的發展亦不過最近二三百年來的事，而最近二三百年來人類的智識思想，也比較的進步。但古代的社會尚有許多野鄙不獠的民族，他們仍然徘徊於上古時代的野蠻生活，百年以來，有許多野鄙狂獠的民族他們受優異的民族所征服所統治，仍不能上進與開化優異的民族爲伍，（指文化說）施拉（Schiller）在他所著萬國史裏有說：「航海家的發見，使我們接近了許多民族，環繞我們的這許多民族各有各的等級，有如年紀不等的小孩子，圍住一個大人立着一樣，……人類從前的幼稚情狀，的確，很有可羞可愛的地方，但這些種民族恐怕還不是原始階級，因爲原始的人，比這些還要更不合理」。這些低下的民族，何以不能與開化的民族爲伍，就是他們沒有經過啓導的程序，使他們智識思想開發的緣故。生物學家杜里舒（Driesch）在南開大學演講曾根據生物學的意義說明：「人類之所以進化者，獨智識線而已。」這也可以證明人類的意識，亦可決定或推動人類的社會生活啊。但是不能忘記的，人類的意識，從社會的生活裏造成，社會的意識聚積而成社會的產業由此傳遞於後代世界的一切，凡是人類思想的接觸的希望的事實：無一不達由此傳遞的，集中個人意識，以造成社會的意識又由社會的意識，派生個人的意識，互相爲因，互相爲果，所以社會生活，是決定人類意識的重要原因，而非唯一的原因；換句話說：社會生活，是決定社會文化的重要原因，而非唯一的原因。從人類的言語發展中，也可以說明這個道理，人類智識思想所以高出動物，一部分是由於個人的原因，一部分

是由於社會的原因。由個人的集合而成社會的組織；由個人生活的集合而成社會全體的生活。當社會組織之初，人類所賴以鈎通思想感情者，即是言語，言語能發表意思成爲相互間交通的利益；（甲）傳達觀念意思，互相聯絡，爲社會組織的根原。（乙）個人思想的積集，爲有力的社會智慧的基礎。（丙）人類思想力，因爲有言語可以脫離笨重的想像世界，進而至於活動的想像的抽象思想的世界。（參閱德國 F. Müller-Lyer 社會進化史漢譯本三十三頁），同時人類祖先脫離樹上生活，到了新遭的環境的時候，利用他們的智慧思想及手，以製造工具，又用言語的交通伸展他們的感情，得到一個協作的合力，以造出耨耨之工具與武器。當人類爲着生存競爭之初所依賴的，是這種種工具與武器之發明。特別以戰爭所用的武器爲重要，在其時無論若何強大的民族，假定不能利用武器，必爲用武器的民族所制服，生存戰爭，就移到智識的方面，戰勝而生存者未必是體力最强的，乃是智慧較高，武器較好的，等到人類羣居的生存和生活已得到勝利後的保障，更相率利用個人之智慧能力而創造發明其他利益於生活及娛樂美觀的種種低級文明工具；當人類在石器時代，人類利用他們的才能，在羣居的洞空中，從事于繪畫雕刻油漆，成爲種種之美觀。至少在萬年以前的歲月，而在今日人類之眼光觀之，亦驚異其精力與才技。（可參閱 James Henry Breasted 著 "History of Europe" Chapter P.4.）人類使用語言以增進其智慧思想，確是羣居的社會生活，爲之原因，但是人類沒有了無言語使用言語的意識以爲之前，則人類必不能運用感情的

聯絡和協作的合力，以創造一切適于生活及娛樂美觀的種種低級文明的工具，可知社會生活決定人類的意識，而人類的意識，也決定和推動社會生活的。人類意識的進步要靠腦力的發展，而腦力的發展，是人類進步中不能忘掉的，歷史上各代人類腦力的比較，可以造成一表如下：（1）猿人的腦力容量，僅有三百五十立方厘米（cubic centimetre）；（2）稍後的黑猩猩（*Pithecanthropus*）的腦力容量，則有九百立方厘米特；（3）稍後的奈安得塔人（*Neanderthal*）的腦力容量，則有一千六百二十立方厘米特；（4）近代的腦力容量，有一千六百五十立方厘米特。腦力容量的大小，是以人類意識思想的發達有關係，此外還有腦的重量和質地緻密的深淺，都是與人類的意識思想的發達有關係的。我們若觀察歷代文化的有進無己，也可以知道人類的腦力，是隨時代，在那裏進步不已，腦力的大小，質地的良劣，不但是與思想有關，而且影響到人類生理方面，又從生理方面，影響到社會的物質的方面的，所以馬克斯唯物史觀所據的公式：「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人類的的生活；倒是社會的生活，決定人類的意識」。恐怕不是人類歷史演進的公式呵。人類生存最根本的要素，就是要預備生存所需要的方法，第一是食物，第二是住所，以後是衣服武器工具；不錯，這種種是屬於唯物的方面，社會生活的方面；但誰去找尋食物呢？誰去經營住所呢？誰去製成衣服武器工具呢？是否這種種的物件，不須人類的智慧思想才力以籌維麼？近代產業，建設世界的市場，普及世界的交通，同時也使世界的文化，成了突飛的進步；不錯，這種種是屬於唯物

的方面，社會生活的方面；但誰去建設呢？誰去普及呢？誰去推動牠進步的程序呢，是否這種種的形態，不須人類的智慧思想才力以經營麼？近世科學的發達，乃將世界的狀態改變，社會的生活改變，因而減少人生的痛苦，增益人生的幸福，（可參閱拙著人生問題科學與人生篇一四五頁至一六三頁）科學是用人類精確的思想和完密的方法，以發見世界的真理和新奇的事物，這科學的思想和方法，在古代希臘哲人中頗鼎盛一時，但到中世紀黑暗時代，這科學的精神幾完全消滅，直到中世紀末葉，即西洋文化史上所謂文藝復興時代，這種科學思想方法，才恢復興盛。我們試問中世紀黑暗時代，何以這種科學的精神，幾完全消滅，這是在中世紀黑暗時代歐人的思想智識，爲社會已成的封建勢力傳統思想所壓抑所束縛，而不能得到抬頭的機會，等到文藝復興，人類自我的意識覺醒，思想從而解放，而社會更新的時代，遂迎邇而來，這是一個顯明的例證。文學概論有說：「藝術和生活，同是一種生的力量表現，是我們個人的內部要求的一種表現，若生活完全要受環境的支配，那麼，藝術家的創造，不是幾等於無了麼？在這地方，我們要知道，一個時代和一個社會，若完全沒有支配生活的力量，那麼，人生就不得不漸消滅，同一自旋的陀螺一樣，外力停止的時候，就是人生寂滅的時候了。我們人類社會的所以有進化、所以不寂滅者，都因爲有超越環境的個性內部要求存在在那裏的緣故，偉大的個性，是不能受環境的支配的，改造環境，刷新時代的工作，都是由個人的藝術的衝動演出來的」（見商務版三二頁）社會的環境

和社會的生活，支配個人的勢力，是很大的，受了這支配的勢力，而不敢起絲毫的反抗意志，不敢越雷池一步，是一般庸人的狀態，社會文化所以停滯不進，就是這個原因；偉大的個性與偉大的天才創造，是向人生恆久的路向邁進，是着眼於社會理想的目標及內部的根本要求而不受環境的支配與壓迫的；社會文化所以與時代而進，這是一個原因。倘社會的環境與經濟的背景，而完全控制人類的意志，人類沒有絲毫的意志自由，則人類的文化沒有演進和向上的可能了。社會的種種生活，是文化的表現，有種種的社會生活，就有何種的社會文化。中國的社會有何種文化呢？看他幾千年來的社會生活，是甚麼樣，就可以知道他的大致了。文化的表徵，非是在少數人的生活中可以尋到，要在多數的羣衆生活裏才可以尋到，又要在豐富之物質生活裏和文字藝術科學哲學道德宗教的進步裏尋到（可參閱 *Early European Civilization* P.6.）中國文化、是否達到現在世界的高峯，亦可由以上所說種種生活體驗之。

第一節 從社會家族制度的方面論中國文化

中國的社會基礎，是在家族制度，幾千年來的社會，大概由家族思想家家族主義所支配，他的文化特色，確實浸染了家族主義的薰陶，這家族制度，由於婚姻制度所胎息。中國婚姻制度的維持，由幾種觀念：（甲）基於倫常的觀念。野蠻民族，大概不離雜婚或一種與雜婚相同的混亂的制

，然而在中國家族制度確立之始，已表現倫常的觀念，所以禮記經解說：「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禮記樂記說：「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禮記郊特牲說：「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哀公問上說：「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夫大昏萬世之嗣也」。在這等信條上，確定男女的關係：所以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周易序卦傳）。經解上說：「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故在中國幾千年之文化史上，是視婚姻之禮，為文化的表徵，反乎此者，必視為未有開化的時期。如商君書開塞篇所說：「天地開而民生之，當此之時，民知其母而不知父」。呂氏春秋恃君篇：「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婦男女之別。」由這裏可以證明，在野蠻社會裏就沒有具有禮義的婚姻制度。（乙）基於宗法的觀念。我國幾千年的社會向為宗法社會在宗法社會裏，最重的就是廣繼嗣，廣繼嗣，就是傳宗立後；孟子離婁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郊特牲：「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婚禮將以主社稷之祭祀）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易經：「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在禮記大傳有別子之義，別子就是公子，諸侯的長子是世子，將來繼位諸侯。次子以下無論支子或庶子，都是公子；別於諸長，就叫做別子，別子分受莊園，為卿大夫，成為土地與農民的統治氏族的始祖，所以叫做「別

子爲祖。」別子的嫡長子繼，世世繼承大夫的身分與莊園，叫做大宗。大宗宗子永遠祭祀別子，別子的主位，永遠得享廟祭，這是百世不遷的一義；同一始祖的分族，永奉大宗宗子爲族長，而受他莊園的扶助，這是百世不遷的二義。大宗宗子既承繼始祖的身分和莊園。如果宗子的諸弟，沒有特別受封，則分受耕地而爲士，由此成這塊耕地的地主家族的源，他的長子，承繼他士的身分與耕地，這一系統叫做小宗，小宗宗子收養，同此一源的分支，小宗分支的家族，崇奉小宗宗子，分支的範圍，止於五世。五世以外，就自立小宗，同一分支的宗人，只祭到高祖爲止，高祖以上的祖，在祭祀範圍以外，這便是五世則遷之義。由這宗法的組織，就遞衍而成貴族的組織，而享用封建的財產，分別尊卑的界限，造成封建社會的文化道德，國語楚語觀射父有說：「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宗法的社會是注重秩序與禮義，有違背者，視爲不道，且爲同羣所不齒。潛夫論卷九說：「昔者堯王觀衆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採命歷之去就，省羣后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白虎通卷八：「人所以有姓者，所以崇恩愛，厚親戚，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聚，皆爲重人倫也。」（丙）基於經濟的觀念。中國婚姻制度的存在和組織的嚴密，經濟的維繫，亦是重要的原因，禮記昏義：「婦順者順於舅姑，和于室人，而後當於夫，

以成絳麻布帛之事。『詩國風七月』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染也」我朱孔陽，爲公子裳。『易經』上說：「无攸遂，在中饋。」小雅甫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鄭風上女曰鷦鳴一章，也說到男子在外邊「弋鳬與雁」，可見中國婚姻制度，關於經濟的維繫，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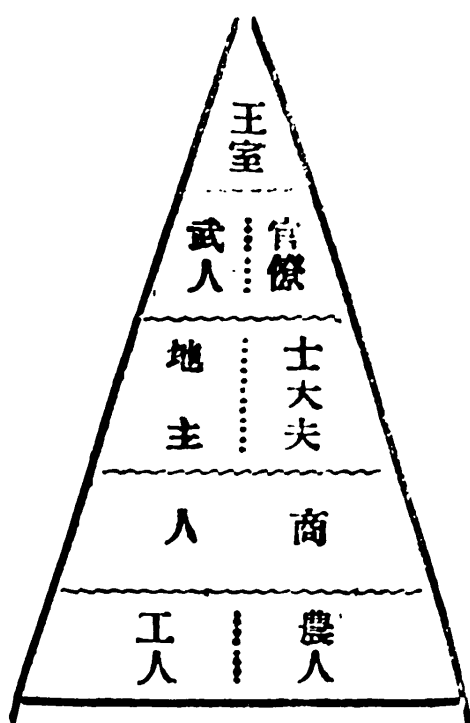
（丁）基於協助觀念。『夫和婦順。夫唱婦隨』是表示夫婦的關係，是維繫婚姻制度的信條，在古代的婚姻，庶人方面多在經濟的關係，而在貴族方面，就有其他的協助，禮記祭祀上說：「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中國婚姻所重的，要互相協助。故重夫婦偕老之義，所以易序卦傳：「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但是中國婚姻向來是注重形式，不注重精神，注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不注重男女對方的情愛，而且以夫爲婦綱，幾千年來扶持夫綱之故，把女子壓抑，剝奪她真正的自由權，祇有女子方面的貞操，而無男子方面的貞操，在女子可以「柏舟自誓之死矢靡他」，而在男子則妻妾盈庭混亂家庭的秩序，根據此點而論，中國的社會文化，是畸形的發展。復次婦女在夫族是宗統宗系的男子的附屬物，所以決定婦女的命運的有三種勢力，第一是宗廟及宗統，第二是舅姑，第三是夫，禮內則：「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大戴本命：「婦人七出：不順父母，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妬，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棄盛也。口多言，爲其離親也。竊盜，爲其反義也。」樹此七出之義，而婦女在

社會上家族上法律上人權的地位，遂從而喪失，幾千年來婦女在這不平等的社會規律制裁，以過她痛苦生活者，真是不少，這種不平等的社會文化，是值得頌揚的麼？由這不平等規律制裁的婚姻制度，影響到男女間的地位。穀梁傳上說：「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入者也。婦人在家稱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隱二）家語：「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禮者也。」曲禮：「公庭不言婦女。」在理論上或男尊女卑之說，在事實方面上，社會注重生男不注重生女，小雅斯干：「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鴼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噍噍，朱芾斯皇，室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權。」內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外，女子設帨于門右。」韓非子六反篇：「父母之於子也，幸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和也。」男女在社會上，已有不平等的地位，因而在法律上，亦弄成不平等，依唐律男家有撤消婚約的特權，有強制解消婚姻的特權，而妻子方面則無之。又男子有繼承父家遺產的特權，而女子方面則無之；男家方面蓄妾為法律上所特許，而妻子方面，有外遇則不能逃刑。關於貞操問題，只問女子的貞操而不問男子的貞操，妻死夫可以再娶，夫死婦不許再嫁，歷史上雖有少數人懷疑，然而都為社會風習所壓抑，不敢明目張胆來主張，掃除這不平等不人道的風習。

中國與歐洲各國商業交通後，社會起了大變遷，資本主義向廣大的中國社會衝進，中國農村瘦敝，農民的耕地日日減少，以前據大耕地而集合的大家庭，遂不能保存，而普通的農家最平常的人口數，是三人至五人爲多，漢以前通常的是八口或五口有百畝，現在卻僅五口十畝，甚至五口五畝爲普通，五口之家，已屬於小規模的家族制，以前的大家族制，適因時代的轉變而不能維持，這大家族制進到小家族制，是社會進化的一個表徵。以前大家族制時代，家長的威權無限，而現在改爲有限了；以前男女失却獨立自主之人格，而現在能在家庭的職能上而表現意志了；以前女子不能與男子同樣的管財產交際婚姻之自由，而現在不致受無理的束縛了；以前女子不能與男子同樣的有繼承權，而現在實系尊親屬沒有歧異了；（見民國二十年一月二十四國民政府公布之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二條）以前男子對於女子有絕對離婚之自由權，而現在採取客觀相對的條件了；以前貞操的觀念，女子獨負，而現在採取相對的責任了；以前視男子爲家族的中心觀念，而現在易爲男女共同維繫的中心觀念了；以前規婚姻爲家庭之擴大與繼續，而現在則視爲新家庭之創立，共負國家社會的責任了；使能保存原有家庭協助以合理的道德觀念，則中國文化，可由這制度的改善而進步啊。

第二節 從社會階級制度的方面論中國文化

中國歷史上有階級制度，而未嘗有甚嚴之階級制度。據梁啟超於所編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說及：「中國人在全世界諸民族中，可謂最愛平等之國民。」從事實觀察，這也不盡然。中國沒有甚嚴的階級制度，如印度拜迦時代四級之遺跡，歐西各國在大革命前貴族僧侶優越的特權，德國在革命前農奴的狀態，美國在南北戰爭前奴隸的待遇；但歷史上階級的歧分是明顯的，把階級的歧分，簡單表示可如下：



三代以前，百姓與民涵義不同，堯典「平章百姓」與「黎民於變時雍」對舉，又以「百姓不親」與「黎民阻飢」對舉是百姓與民顯然分爲兩階級。書呂刑篇：「苗民弗用靈」，鄭玄說：「苗、九黎之君也，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夏會佑據此。因推定古代漢族征服苗族後，自稱其族爲百姓，而稱所征服者爲民，故民之上繫以黎或以苗，因謂百姓與民

爲兩大階級之徽號，這是有等理由。降及春秋，爲我國貴族階級發達的時期，考隱公八年所紀：「夫子建魯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昨土命氏，則被賜氏者必有世功，命氏之後，必得有領土，以爲食邑，食邑之下，有人民，足供驅遣，日久成爲貴族的集團。魯桓二年師服說：「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楚芋尹無宇有說：「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可知春秋時代各國，自諸侯以下，必有許多階級，名分之間，上尊下卑，井然不可混亂。（見予所著社會思想與社會問題 書六二頁附錄二春秋時代之貴族政制篇）。春秋時各國政權，率歸少數貴族之手，例如周之周氏，召氏，祭氏，單氏，劉氏，甘氏，尹氏；魯之仲孫氏（即孟氏），叔孫氏，季孫氏，臧氏，郡氏，展氏；晉之韓氏，趙氏，魏氏，范氏（即士氏），荀氏（後分爲中行氏，知氏），欒氏，卻氏，胥氏，先氏，狐氏；齊之高氏，國氏，慶氏，鮑氏，崔氏，陳氏；宋之華氏，樂氏，皇氏，向氏，鄭之良氏，游氏，國氏，罕氏，駟氏，印氏，豐氏；衛之石氏，甯氏，孫氏，孔氏；……春秋各國二百四十年的史蹟，純由各國若干貴族人物，在政治舞台上的動活所構成。各國貴族之執政者，多由前代親貴蔭襲而來，或由累代之公子派衍而來。晉之貴族，皆獻文兩代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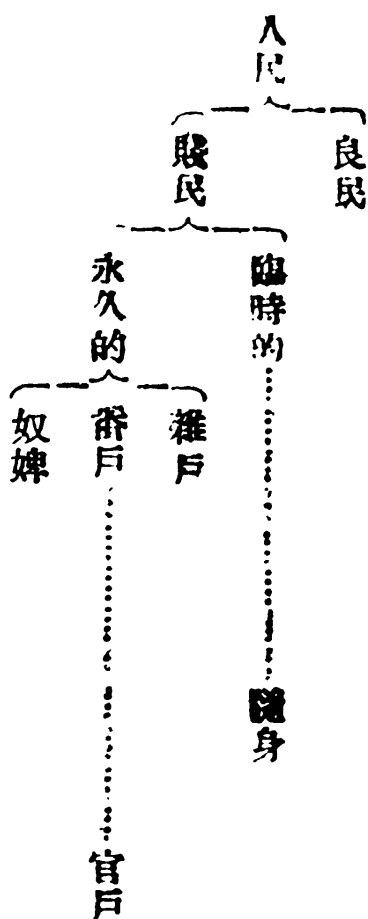
臣子孫；未有公族；有以一族爲諸貴族的領袖，世掌最高政權，例如魯之季孫氏；有豈山政務之一部分專屬某族，例如魯之叔孫氏，世爲行人，專責外交；有以若干貴族輪掌最高政權以年輩取得領袖資格者，例如晉自荀林父以後，士會，卻克，欒黶，韓厥，知罃，荀偃，士匄，趙武，韓起，魏舒，趙鞅等，以次游升；又如鄭之歸生，子良，子罕，子驥，子孔，子展，伯有，子皮，子產等，以兄弟叔姪之次第遞升；在這等制度之上，各貴族皆有取得政權的均等機會。有等由一貴族或數貴族總攬中央政權者，如楚如齊如宋等；有散於各地方，由數貴族分領者，如魯如晉等。春秋時貴族階級的內容，大畧如此。惟貴族平民之分，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故階級懸隔不甚嚴厲，而且因時代轉變的關係，故國滅亡者，踵趾相接，卿大夫多變爲平民，各國內亂的結果，或亡命他國，或在本國失其爵氏，多變爲平民，那末，平民中智識分子日多，抬頭的機會也日多，東周以後，如管仲起於罪隸，甯戚起於牧豎，百里奚起於乞丐，商人的弦高，可以干預軍國大事，白衣可以爲卿相，加以孔子墨子以私人講學，弟子後代學偏天下，百家趨承興起者相望，於是學問之重心，不復爲一階級所專據。至戰國之世，時代則急轉直下，各國因戰亂相繼，而階級的界限更疏，每以人才多少爭強弱，魏以失商鞅見弱於秦，乃卑禮厚幣以招賢者，燕鑄黃金臺以羅致樂毅劇辛之徒，齊則緩下先生，比列卿者以百數；即下至雞鳴狗盜之輩，皆備致敬禮而獲其用。以前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陰陽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

流，出於理官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墨家者流，出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出於雜官，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世官之制，亦因之而掃除。然戰國公卿貴族的階級，雖漸次平夷，而商業勃興，商人機敏趨時，富豪階級，代之而起，如子貢聚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呂不韋居奇貨，操大國君主廢立之柄；同時地主階級，也繼之而起，漢書食貨志：『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衣，而食犬彘之食。同時士大夫階級，也繼之而起。戰國時代因各國錄取才智之士，以補卿相，士人遂得抬頭，而不致抑伏於草野之中，孟荀游過於諸蕃，諸蕃聚集的士人，常至數萬人，或賜列第大夫，不治而議論。（見史記陳完世家）荀子於儒效篇說：『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爲學乎？彼學行之，曰：士也』王制篇說：『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臾廢，元無不待教而誅，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繼；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至漢代士大夫，更有發揚的機會。董仲舒推崇孔子，罷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至是士大夫，因而造成歷史的地位與文化。漢平帝元始五年時，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至京

師者數千人。武帝時，初置五經博士，三國志王朗傳注稱：「西京學官博士七千餘人」。後漢書黨錮傳：「大學諸生三萬餘人，更相褒重，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以之下，莫不畏其貶議。」考試科舉制度，是起於士大夫科名身份的制度，本來是一良好的制度，及至宋流弊造成官僚階級的階梯，漢時始選舉，西漢高帝十一年，詔郡國舉士，他的詔書說：「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東漢以後，賢良制度逐漸廢弛，延康元年，（獻帝年號）尚書陳羣以爲「天朝選用，不盡人才」。（見鄭氏通志卷五十八選舉第六頁）。乃立九品官人之法，於州郡置中正官，本鄉評以區別人物，朝廷則因其銓簡以爲登庸，自晉及南北朝，取士用人，沒有一點制度，可是中正官制仍然存在，當時的中正官，多視門閥資爲愛憎，不以士人賢愚爲區別，由是天下之士，互爭權勢，互相傾軋，所以當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譏諷。隋代確立考試制度，以廢士大夫於科名上遂成一特殊階級。高門寒門之分，據嚴啓超於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論及高門寒門之分，實起自漢末及五胡時民族轉移；至少爲當時構成門第重要原因之一。東晉南渡，中原士夫隨而播遷者，翹然自表異，而孫吳以後故家久在吳會者，亦不肯相下，故江左有僑姓與吳姓對抗。五胡之難，異族侵入偏於河北，士著之氏，欲自表明遺胄，於是有郡姓，郡者是示異於種族部落，魏孝文自代遷洛，盡改漢姓，

於是有代北之國姓；南之「僑」「吳」，北之「郡」「國」，各稱其異族以相援繫，族愈大者，享受特權愈優越。六朝階級界限，亦頗嚴。南史謝朓傳，「晉世名家，身有國風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謂額外之官，）梁書張纘傳：「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趙翼陔餘叢考：「當時風尚，右豪宗而賤寒賤，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請各郡立學，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者爲學生，先儘高門，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貢舉猥濫，乃詔州郡慎所舉，亦曰：門盡州郡之高，才極卿閣之選。」當時階級之懸隔，其主要原因，在不通婚姻。魏太和中（孝文帝年號）肯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南朝曾否有此規定，雖不可考，然以習俗觀之，可得其大概。趙邕龍貴（邕後魏南陽人，太和中給事左右，官終幽州刺史，）欲強婚范陽盧氏，盧母不肯。潁川外家。侯景稱兵犯闕，生殺由己，欲請婚於王謝，梁武帝曰：王謝門高，豈可令此女屈事卑族，景至終不能奪。又魏孝文帝太和九年的詔上有「奴婢依良」的一種事實，則奴婢制度，在南北朝是依然存在的。當時有一種部曲，是屬質任，（質即周禮所謂質劑，任即保證，就是現代所謂甘結）換句話說，就是和主家之間，結有賣身契約的。凡爲部曲，不得隨意破壞契約，有部曲這種人，遂由法律行爲，形成中國社會上一特殊階級。這種部曲（其初屬一種非正式的軍隊，邊將擁兵自重者，別募一種兵如後世所謂家丁者，以爲己心腹而部曲之名立）父子相繼續襲，不能擅自解除，遂成一家的所有物。其後社會情狀日變，部曲遂至全失其軍隊的性質，而

與奴隸同視。唐律疏議調訟二部曲奴婢過失殺主之部說：「部曲奴婢，是爲家僕。」（卷二十二），又同審賊盜一之末說：「奴婢部曲，身繫于主」。（卷十七），但部曲和奴婢是畧有差別的。疏議說：「奴婢賤人，律比畜產。」（卷六）「部曲不同資財，奴婢同資財。」（卷十七）唐律調訟二上規定：「諸部曲毆良人者，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可知部曲雖爲賤民，但比普通奴隸階級還要高些。唐代大體上是有下列的階級：



唐制別賤民於良民中又分三級，最下曰奴婢，次則番戶，次則雜戶，番戶亦稱官戶。部曲身分與官戶同，國有者爲官戶，私有者爲部曲；部曲之女，謂之客女，其身分亦等於官戶；番戶一稱爲官戶，祇屬於本司，在州縣沒有戶籍，有次於雜戶的位置；奴婢乃是下級，是由於相坐沒官而成爲奴婢；所謂隨身，是根據僱傭契約奴隸，（見唐律疏議卷二十五註），其身分祇在契約期間，所謂雜戶，乃是永久賤民中民的最上級，如少戶監所屬的工樂雜戶，及太常寺所屬之太常樂人等

●唐時奴隸，除當時因罪沒官，及前代奴籍相承外，大概是販自南方，即現在的福建兩廣，湖南，貴州，雲南等地販來的，當時稱之爲南口；（見唐會要卷八十六）豪強商賈，以這等奴婢當作財貨看待，或驅使，或買賣，或贈人。此外還有畜養西北邊之突厥奴，吐蕃奴，回鶻奴，而在山東登萊州等處則盛行販賣新羅奴，在社會上層的武人，據優異的地位，分收田賦徭役之外，他們有莊有賜田；做官僚的，且以其勢力，廣佔良田；唐中葉以後，土地兼併的事實，顯爲顯然。

所謂十節度使，如平盧節度使，（駐營州今奉天省），范陽節度使，（駐幽州管轄今直隸省），河東節度使，（駐太原管轄今山西省），朔方節度使，（駐肅州管轄今甯夏），河西節度使，（駐涼州管轄今甘肅北部），隴右節度使，（駐幽州管轄今甘肅等處），西安節度使，（駐龜茲管轄龜茲于闐等地），北庭節度使，（駐庭州管轄今俄領七川州），劍南節度使，（駐益州管轄今成都等地），嶺南節度使，（駐廣州管轄今粵及安南東京等地）。這等節度，手握土地甲兵財賦之權，儼然成爲武人階級。唐以後，遼據中國北部，不久金又代之在這期間，有許多渤海人，高麗人，以至宋人，都成爲俘虜（遼聖宗統和四年，以伐宋所俘生口賜皇族及乳母）金軍南下的時候，漢族成金之俘虜者，變爲奴隸。洪邁容齋初筆卷三說及：『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士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是記實也。元代統治中國，以俘到男女，匹配爲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爲奴婢，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奴

或致富，主人利其財，每藉詞抄佔，有時奴願納財脫免奴籍，主人則執還付之，名爲放良。江南富室養奴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並議增其賦稅。（見續文獻通考卷十四）。明代鑑於宋廢藩鎮致爲胡元所乘，故大封其子弟，如秦王瑋王西安，楚王禎王武昌，甯王權王大甯，魯王檀王堯州，瀋王模王路州，代王桂王大同，等，雖然造成封建的階級勢力。但下層的奴隸，不易以壓迫馴服，甚至主人反爲其所左右。顧炎武於日知錄卷十三奴僕一段敘述明末的奴隸狀態說：「今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士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數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這也可以想見當時奴僕，是想得到抬頭的機會。清代也有奴婢的存在，一種是從來由於賣身契約而成的奴隸；一種是由於犯罪而成的奴隸；一種是滿洲的世僕。（謂包衣服役於宮庭或王公的）。此外還有一種類似奴隸的特殊階級，如山西等省內教坊樂籍，世執賤業，不與平民相伍，浙江紹興府的情民，江南徽州府伴當，甯甯國府的世僕，蘇州府常熟昭文兩縣的丐籍，江浙閩各山縣有棚民，粵閩兩省的艇戶，在雍正年間解放其籍，列爲平民。（參閱商務版拙著中國近代政治史四一頁）但習俗相沿，階級的區別，尙未易廢除。自國民革命的運動，以平等之義號召國人，民國成立，國民團協約法第五條特聲明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舉國風氣，爲一之變。中國文化的開展，是在於除去武人官僚土豪劣紳之種種懸隔，在於法律之下，萬民平等之義，以建設新的社會新的

國家，否則階級制度，雖然掃除，而在國家社會上一般平民，受惠劣勢力的欺侮壓制，則新文化的展望，自不能有許多大的進步啊。

第三節 從社會統治的方面論中國文化

國家是社會發展之最高的形式，或可如希臘亞里士多德說：『國家爲一個最高的社會。』（Aristotle Theopolitics I），社會是人類共同的目的或發展而發生而組織相互關係的集團；爲達到這個標準計，所以有強制的結合。故國家與普通的社會不同。普通的社會，可以自由結合，而國家這個社會，是具有強制結合的性質。人類建立國家的目的，在求生存，求生存不是很容易的事，如何以滿足生存的需要，如何以抵抗生存的危害，如何以防禦侵犯生存的敵人，如何以達到生存共樂共榮的目的，這些，是要社會有統治的力量而後可的。社會之所以進化，文化之所以發展，是要看人類何以滿足生存的需要，何以抵抗生存的危害，何以防禦侵犯生存的敵人，何以達到生存共樂共榮的目的，看社會統治的力量，是否爲適應這個目的而表現？是否爲達到這個標準而存在？就可以明白了。社會統治的力量，分三方面進展：（甲）是養民。中國自古政術注重養民，洪範大政，注重食與貨，孟子說：『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又說：『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養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輒。』

『養民，就是國家之統治者，使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得到相當解決，人民於無歲不能飽，於凶年不能免於死亡，這衣食住行的四大需要，已不能解決了。管子是中國有名之政治家與政治家，他是極注重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而認為國家統治者，須要負責而達到的。』他於五輔篇即：『修政』『勉稼穡』，是為足食而主張的。『衣凍寒』『賑能露』是為足衣而主張的。『利墾宅』『修墾屋』是為發展民居而主張的。『修道路』『導水潦』『慎津梁』是為便利行路而主張的。人觀此說：『觀民產之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這存亡之國，是要統治者負責的。（乙）保民。人民能够施行養民的政策，仍不足以達到生存的目的。所以要用統治的力量保民，孟子也曾說到統治者的責任：『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國家統治者的任務，於養民之外，猶在於保民，不能盡保民之責，則人民咸受湯析離居國破家亡的景象，那裏有什麼方法，發展國家的任務呢？（丙）教民。已然養民保民，猶要盡教民的責任。孟子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傅玄說：『中國所以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失其所教，則同平夷矣。』教民的意義，物質方面，在教導人民以生活技能與生產的方法；在精神方面，要提高社會國家的文化，能盡這個教民責任，則統治者才不負國民的信托。我們知道養民保民教民這三種責任，是統治者所不能脫卸的。從國家的存在和發展而說，統治者不但要注重人民的物質生活，尤要注重人民的精神生活，能够顧到這兩種生活，然後國家的文化可以提高。

。然試問我們國家幾千年來的統治者能否做到呢？對於這三項責任，能做到的有幾人呢？有等少數君若相，祇求面鋪張盛治，當朝代更易，一時雖然取得大平，不多時又陷昏亂殘暴，大多數的人民，深受他的壓迫痛苦，因為幾千年的朝代，陷於一治一亂的循環政治，事實上表面之敷衍建設，不久又隨末代帝王的昏庸淫蕩愚闇奢侈的影響到紛亂而破壞了。易白沙之帝王春秋，描寫中國統治者的罪惡，有人殺，殺殉，弱民，媚外，虛偽，靡奢，愚闇酷刑，嗜好，多妻，多夫（指帝王家屬），悖逆，其旁瞻章有說：「主家日用飲食有不可思議者，焚絲當薪，吃玉以禦水氣；膳食必數百器，陳面積至一方丈之寬，大金龍鳳白磁諸膳器三十萬七千有奇，金銀工官均費五千餘萬。……飲食一端，已得其統計之大概矣。至於宮室，衣服，器物，又百倍於此。明世宗歸江彬家，得黃金七十瓶，白金二千二百瓶，其他珍寶，不可計數。錢錢事，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二千箱，胡椒數千石。滿清時，大學士和坤之私產，值銀二億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兩，尚有一半未估價者；下至知縣小吏，私囊亦往往得銀數十萬兩。洪憲以來，全國武人，各擁巨資，一賭之輸贏，至數十萬元，……政象紊亂，人民日在水深火熱之中，皆供助最少數民賊之犧牲也。」「其次關於多妻。禮記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婦，有嬪，有妾，有妾。」昏義說：古者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史記秦本紀說：「秦每破諸侯。……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之。」楊漢書陳蕃傳說：「比年收歛，十傷五

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卿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資計，鄙語曰：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且不御，必生憂愁之感。」晉書胡貴嬪傳：「武帝多內寵，掖庭殆將萬人，而并寵者其衆，帝莫知所適。」唐書宦者列傳說：「開元天寶中，宦嬪大率至四萬。宦官衣黃衣以上三千人，衣朱紫千餘人。」宋元明清各朝代的統治者，亦莫不如是。賭博至唐代而更甚，上自天子，下及庶人，不以爲諱，武后竟自置九勝博局，令文武官分朋爲此戲。（見肥遯潤海，）玄宗時楊國忠（貴妃兄）乃以善擲筭得入供奉，當時博戲，王公大人，莫不耽耽，至於廢慶弔，忘寢食；（見李肇國史補），明末時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爲，至「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這可以說描寫統治社會的賭博情狀。宦官在中國歷史上成了播亂朝政的污點，二十二史札記卷五論宦官之害民有說：「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奄寺，先害國而及於民，東漢則先害民而及於國。……蓋其時，入仕之途，唯徵辟察舉二事，宦官既據權要，則徵辟察舉者，無不望風迎附，非其子弟即其親知，並有賂宦官以輾轉干請者，……天下仕宦，無一非宦官之兄弟姻戚，窮極暴虐，莫敢誰何」。這也可說描寫中國歷史上政治社會文明之污點。中國的官僚，大多數不是以養民教民爲目的，而以奉君求祿爲目的，新民叢報官制議有說：「天官之庶司百職，乃無治國事民事之人，合比庶司百職，皆以奉一君，甚且六卿中六大六少之職，皆以奉君奉神爲主，其餘百官之事

爲君事者尙多。自是古所謂設官以治民者，則皆爲設官以事君矣」。中國歷史上統治階級方面，前上列數事，均可以證明實際上未能盡養民保民教民之責任，甚或弄成愚民害民虐民的行動。統治者以遏扶專制的行爲，對付人民，其影響國家社會文化的發展甚大。往昔政府之任務，做到對外禦侮對內治安，已算了不少的事，假定盡了對外禦侮對內治安的保民任務，也不外盡了消極的目的；而積極的目的，即養民教民的目的，許多是不能克盡的。教民是現在國家政府的重要任務，即所謂文化的目的；這文化的目的不能達到，而養民保民之目的，也從而不能達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所以教養的任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國數千年來之統治者，是忽畧這教養的任務，國家社會的文化目的，不能順序發展，所以中國文化雖開展於幾千年前，而幾千年來，徘徊於政治上一治一亂的循環圈套，不能邁進，這是很重要的原因，而爲自來文化史家，所忽視的一點。

第四節 從社會法律的方面論中國文化

法律，乃社會個人羣體間生活的反影，又可說是社會風俗習慣的反影。社會風俗習慣，是胎原於人類相互的生活；人類的生活，是根因於人類的基本生活。人類的基本生活，如經濟生活和兩性生活，是其他一切社會生活的基础，而法律就是維持經濟生活兩性生活的安全者。我們看歷史的民法和刑法，大概是爲保護私有財產維持婚姻制度而設的。又查各國的犯罪統計，犯罪原

四。多半是由於財產爭執和兩性的糾葛，人類的基本目的，是維持自己的生存，與繁殖自己的種族；想達前者的目的，則有財產制度；想達後者的目的，則有家族制度；今日私法，就是以這兩種制度，爲其趨向的歸宿。法律現象發生變遷，是由於人類基本生活的要求，也可說是適應於人類社會生活的工具，然而就古今來的法律的變遷，就可知道一社會的文野程度。文化沒有達高深的國家，牠的法律當然沒有達到高度的進程；文化低落的國家，牠的法律自然有許多是不公平的，不人道的，不與社會理想相適合的。反之文化高度的國家，牠的法律的創制與設施，自然適合於公平的，人道的，與社會理想相適合的。古代埃及的法律和道德，由希臘羅馬的媒介，而影響到歐洲的法律文化，也家稱埃及的文化，多帶有原始的文化痕跡，尤其是法律文化幾合於近世的思想。埃及對於保護經濟之地位者起見，採取無限利息的立法，對於女子地位和男子相同，對於奴隸的待遇，沒有非人道的行爲，猶大的法律生活以宗教思想爲基礎，摩西(Moses)的立法，根據神的啓示，其內容可以看出猶太人特有之宗教感情；在牠的法律中，也可以看出牠文化特徵。希臘古代實際的法律生活，亦富於近代的色彩，立法雖沒有統一的大法典，在社會生活上，市民各有很大的自由，但是奴隸與外國人，不許有市民法律的地位，這理可以看出她文化的特徵。羅馬人以他們法律上的文化，影響於近世者，是何等的偉大；當羅馬建國之初，羅馬人大體是農民，他們的法律多爲農民的。缺乏倫理的色彩，以嚴格的法律，維持社會秩序和實踐的精神，這裏

可看出牠的文化特徵。中國的文化有牠的文化特徵：在法律生活中很可以體證到的；中國的法律特質；是以家族爲本位的，我國自古以來，皆尚宗法，故視家族物重，訛及法律，則家族與個人發生衝突時，必屈個人以伸家族。是對權本位的，以反抗君主爲大逆不道，視爲不可赦，亦株連親族。是階級本位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官民犯法，罪各不相同。我們看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執行刑律監禁罪囚司法裁判，是否根據正義，就可以知道牠的文化程度了。我國古代的法律多重禮教道德，故尚德不尚刑；但是君權制度確立以後，幾千年來多是注重嚴酷的刑罰，秦代有車裂，梟首，戮尸，誅族，生埋之刑；漢代有東頸，棄市，腐宮，磔市，腰斬，絞首，族誅之刑；王莽主政且有燒殺，鑊烹之刑；三國有剝面，鑿眼則足，車裂，鋸頭，族誅之刑；晉代有梟首，斬首棄市，族誅之刑；南北朝有洞髑，斷食輾裂斬，殊死，棄市，絞死之刑；隋代有梟首，輾裂，罪及九族之刑。唐代法律，被稱完備；而腰不良的如謀反大逆本人斬首之外，牽涉到子年十六歲以上皆絞，十五歲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都典資財田宅並沒官，這豈是重明的法律麼？五代有粗枷大棒，強相壓抑以致死者，而謀反大逆，誅殺骨肉，籍沒家產，與前代無別。宋代有杖脊，杖臀，杖腿之分，斬平有先斷四肢然後移斬首之別，甚至州縣官訊囚，有禁柴，夾幫，腦箍，超棍等，種種名目。遼金有車輶，肢解，梟首，坐墮，鬼射箭，飽擲，投崖等慘刑。元代有當會不赴而私宴者斬，諸公事非當官而言，四犯至論死之刑；私商越境，越界販馬，不買

其麼重大之罪，而竟至於處死。明代有磨骨釘，寸寸緊夾棍，立枷，帶根板，牛樹槐，腦箍，竹篾，斷脊，墮指，剝皮，剜心，刺心等非刑。清代有割腳筋，穿耳鼻，囚木籠，腦箍，大鎖，短夾棍，大枷，格殺勿論之刑。文明法律，是維護人民利益與幸福者；野蠻法律，是摧殘人民利益與幸福者；犯罪者，當加以制裁。當加以治罪，以保障社會的秩序與公安，這是一定的道理；但是輕彈的，而法律竟治以重刑，審訊而竟施以殘酷之非刑；不尙感化主義以對付囚徒，而輒加以誅戮方法對付犯罪者，以求一時的相安，沒有能達立法的目的。法律是社會生活之反映，法律之良與不良，可以表見文化程度之如何。中國的唐律，從優良的方面看去，是值得稱許的。近人董康著科學的唐律一書，對於唐律官之恭評，可見唐律價值，肅千餘年而仍光燄萬丈。（此數句見中國法制史一二二頁）。唐律嚴密之處，若何謂故意，何謂過失，何謂自首，何謂累犯，何謂併合論罪，何謂共犯，以及如何免于處罰，如何得以減等，如何加重其刑，均有相當的規定，其所定之刑罰，雖未免偏重事實主義，然未嘗不於事實主義之中，兼及于人格主義，且脫離報復主義而漸入於目的主義。我國法制之有唐律，在文化史上，固足以自豪也。（見予所著中國法律史大綱中大鉛印本八九頁，）中國今日之刑法，多取自暫行新刑律，而草訂暫行新刑律者，則多斟酌於唐律。中國現行法律，又多採取歐美法制，使能準據公正的人道的平等的民意以修訂，則國家文化的目的，自然可以漸次達到。

· 結論

文化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總表現，從社會家族制度的方面，社會階級制度的方面，社會統治的方面，社會法律的方面來說，中國文化自然有所相應，然在其他的方面，維繫中國幾千年社會組織忠孝（忠於社會的忠非忠君的忠）、仁愛信義之信條，與及表現人類感情之文學，表現人類思想智識之歷史哲學藝術等（指中國原有的）也有牠的長處，是值得保存的。一個民族本身使全種文化或值得保存的文化可言，則這個民族只有隨天演的淘汰與亡國奴隸而已。我們知道保存是保存良好的文化，與復古絕對不同，復古是凡古的東西都要復，是要不得的。保存要謀發展，要謀吸收新異的優良的文化以謀擴充。中國文化之改進與發展，要民族之復興，經濟的復興，以爲基礎，而後言發展的可言啊。

跋

自東北淪陷以還。國人恍於夏聲之慨。夷患之日深，外交軍政之無能，民族文教之衰微，乃羣焉震訝失步，知求民族復興之不可以須臾緩。念一年秋，予歸自歐洲，觀察大勢，知欲救國家危亡，必先求民族之復興，而求民族之復興，必先求文化之復興。以爲藉西方科學藝術之識，以理董吾國五千年之歷史文化，去其糟粕而存其精英，取他人之長以補自我之短。異邦新學，則培植蕃滋，故國英華，則發揚光大；以此成其文化革新之業，比於歐土近代史中之文藝復興。使中國民族，得此新精神之淬厲驅策，重闢其活潑銳進之新生命，於世界人道進化史中，得建一再生時代之偉業。卽民族復興之功告成，而以革新庶政，捍禦外患，建立自由平等之現代國家，於排國難乎何有？於爲政乎何有？吾友陳仲甫先生安仁於民族文化相關之故。嘗爲專門之探討，近爲中國文化演進史觀一書，於中夏文教源流，風土習尚，博採精研，窮本極末，使人瞭然於故國文化演進之程，適求所以革新發揚之道；則於今後建立民族文化復興之業，世書實爲導其先路。著者屬藁之初，嘗命序厥原情，率於人事，卒卒鮮暇。今國難日深，夷氛日迫，而此書排板告成，勉書數語，附於書末，粗明民族文化復興大業之不容以已。庶必覽者考文教源流，知民族興衰所自，而有以懼惕惕厲，而求今後完成革命建設之業，則其有當於此書著述之微旨也與！詩曰，

知其有之，是以似之，著者之惠顧行事，校以是書，知其必有以似之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國曆五月五日，吳康收軒設於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時東北淪於夷狄，歲年矣。